

中国现代史上册

第一编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节 “五四”前夜的中国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古代的中国，它的经济和文化，在很长时间内，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它才一步一步地落后了。一八四〇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英、法、俄、德、美、日、意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原来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二者结合在一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其中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它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前后坚持了十四年，革命势力扩大到十几个省，建立了号称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但是，这次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一九〇一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反帝爱国的高度热情和伟大力量。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所扑灭。一九一一年由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三民主义是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是，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之下。

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七十多年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使得帝国主义始终不能灭亡中国。但是，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来说，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又都失败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外反动势力扶植起来的大独裁者袁世凯取代清朝，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篡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残酷镇压革命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统治。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为总统。随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废除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一九一五年，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登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十二月，他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预定在一九一六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袁世凯的丑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袁风暴，他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同年六月六日，这个反动的政治怪物，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绝望地死去。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寻找和扶植一派军阀，充当自己的工具。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军事头目，也各个拥兵自固，扩张地盘，成为地方军阀。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这样又增加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政的机会。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势力最大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段是安徽合肥人，安徽简称皖）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因冯是直隶今河北河间人）。皖系军阀长时间地掌握北京政府（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并一再利用北京中央政权排斥异己，扩张地盘。直系军阀主要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经常联合反皖势力，同皖系争斗。另一个大的派系是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割据了东北三省。直系军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奉系军阀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外，还有盘踞江苏徐州一带的张勋等。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有盘踞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西南，最大的军阀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前者盘踞云贵，后者占有两广。二者都接近直系，并与英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因为各派军阀无休止地争斗，它们控制的地盘常常变动，势力此消彼长。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则操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一九一七年初，日本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以便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借参战名义，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武力，消灭异己，所以极力主张参战。背后有英美势力的黎元洪因害怕段派势力过于扩张，于己不利，反对参战，并解除了段的国务总理职务。六、七月间段暗中支持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接着，段又实行“讨逆”，驱逐了张勋。由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仍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大权。段对内不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对外于八月十四日对德宣战。

为了扩充实力，段祺瑞在宣战之后，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大量借款，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仅一年时间，段向日本借款即达五亿日元。一九一八年五月，日、段以反对苏俄为名，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及战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大批日军以“共同防敌”为名开入“满蒙”。同年九月，段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的卖国文书上，对日本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

南方的军阀为了抗拒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先后宣

布暂行“自主”。

在讨袁战争爆发后，一直逗留上海的孙中山，看到“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假共和易真复辟”，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一九一七年七月上旬，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随后，受孙中山影响而脱离北京政府的海军也南下广州。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宣布“自主”的军阀进行护法活动。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九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任元帅。

对南方护法军政府，段祺瑞主张“讨伐”。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南方的军队也开入湖南对抗。但直系军阀则勾通南方军阀，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以排斥段祺瑞。十一月，段被迫辞职。但皖系势力仍然很大。同时南方政局也发生了变化。滇桂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本意是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巩固自己的势力。直系主和之议一起，滇桂军阀便企图与直系妥协，排挤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并组织了以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并勾结奉系军阀入关声援，迫使冯国璋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又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段复职前，冯国璋已命令曹锟等进攻湖南。曹锟、吴佩孚取得了胜利，但段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吴对此极端不满，便停止军事进攻。八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和，南方军政府表示赞成。同月，冯国璋因受皖系排斥，以总统任期已满为理由，自行辞职。九月，国会选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十月，钱能训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但北京政府实际上仍由段系把持。南方军政府初则反对北京的选举，接着也主张和平。一九一九年二月，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和平会议，但随后就陷于破裂。

在军阀统治下，广大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更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正酝酿着新的革命风暴。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六年间，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三百七十九家。以棉纺织业而言，一九一五年有工厂十二家，纱锭五十四万四千余枚。一九一九年工厂增加到二十九家，纱锭六十五万九千余枚。一九二〇年的本国棉纱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三倍以上。再以面粉业而言，一九一四年以前，面粉每年都入超，从一九一五年起变为出超，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全国面粉厂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由四十多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有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一九二〇年的面粉产量比一九一二年增长四倍以上。其它如缫丝、火柴、造纸、卷烟、肥皂、制革等轻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重工业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得到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一九一七年上海成立了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九年扬子机器公司在汉口设立炼铁

厂。中国机械采煤量（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各矿产量除外），一九一三年为五十四万多吨，一九一九年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万多吨。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第一，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第二，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仍然大大超过本国资本。第三，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绝对优势。另外，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了它在华的经济势力。除了增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以外，日本垄断资本还在中国增设了许多新的企业。日本在华的企业投资，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加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的压力和障碍。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产业工人在一九一三年只有六十多万人，到“五四”之前，达到了二百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很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都集中了十万至数十万的工人，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都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中。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使它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为坚决和彻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后，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工人的斗争日益增长。据统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一百零八次。特别是从一九一六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即达十九次。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罢工，成为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斗争锋芒往往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如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日资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六年上海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船员的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八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一九一五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的罢工和武装反抗，一九一六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封建军阀的性质。一九一五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一九一六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在这一时期，工人在罢工中已开始互相支援，举行同盟罢工，并开始成

立近代工会组织，这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进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工人已经开始组织了一些比较原始的工会，但不久都被破坏了。一九一六年后，又重新成立了一些工会。在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中，工会组织还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复工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资本家不得干涉工会的活动。

以上所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它的肩上。虽然，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准备了阶级基础，为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一九一五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抵制日货运动。而一部分努力探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一九一六年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指出，中国欲图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李大钊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发表的题为《青春》的文章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大力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合理的信仰”。

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五卷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九一六年九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连续发表文章，予严厉驳斥。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是势不两立的，将“孔教”列入宪法，就是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一九一八年四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个方面对旧社会、旧礼教发动了攻击，尖锐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和遗老遗少们。吴虞等人也参加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向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文学及“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时代的主流。在这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洋文化一切都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在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巨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初期新文化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

五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上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一九一八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

《述俄国过激派领袖列宁》，《东方杂志》十五卷三号，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李宁即列宁——编者。

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

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一九一八年三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十一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一九年初发表的《除三害》一文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害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每周评论》的某些文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一九一八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文前的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材料。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使更多一些的中国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初步的了解。

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一四六页。

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五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真真费解的‘国民大会’》，《每周评论》第六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五卷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四八页。

第二节 五四运动

一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七个国家，但会议实际由英、美、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强国操纵。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作为战胜国之一，由南北政府派出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南方军政府代表）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和会在讨论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时，中国的山东问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对此，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

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收回山东的主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和恃强恫吓，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蛮横，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呼吁国民“发抒义愤，以为外交后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向和会送交了对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提出“希望条件”七项，即：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

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拥有多种特权和利益，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便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英、美、法、日、意五国间进行。日本既已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又以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理由，坚持霸占山东。中国代表曾吁请英、美、法等国予以支持，但终因他们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而拒绝了中国的请求。最后，由英、美、法三国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所造成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二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镇压

巴黎和会开幕之后，全国都注视着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国外交处于不利情况的消息传来时，即有不少地方集会发通电，表示抗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全国愤慨至极，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便爆发了。

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

转引自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一二一页。

败的经过和当前形势，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痛陈亡国惨祸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决定办法四条：（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星期日（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的大示威。

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校学生三千多人，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讲演后，学生们出发游行示威。一路散发传单，做爱国宣传。《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队伍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外国巡捕无理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乃在悲愤的口号声中走向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曹宅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起火来。大批警察和宪兵赶到后，逮捕了三十二人。五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进行爱国活动和营救被捕同学。六日，正式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向前发展。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上海、天津等地以团体和个人名义要求释放学生者每日数十起。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军阀政府十分震惊。四日晚，由国务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的办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发电报。五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有不守约束者“立予开除”。六日，大总统徐世昌训斥军警镇压不力，下令加强弹压，对不服弹压者即“逮捕惩办”。七日，又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但同时，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于七日释放被捕学生，企图熄灭群众的怒火。

但是，革命的怒火已经压制不住了。“五四”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学生带动下，都陆续行动起来。七日，上海六十多个团体两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通电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及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之后还由大会发起团体组成上海国民大会事务所，负责商讨各项事宜。五月九日，上海各学校全体停课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十一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以及留日学生，都有集会、游行等活动。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发展。

北京政府在被迫释放捕去的学生以后，看到各校已经复课，便对学生继续进行镇压。五月八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检察厅传学生预审。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接着徐世昌又命令北京军警机关和各省督军、省长镇压学生运动。

面对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北京学生继续坚持斗争。学生们强烈抗议军

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援，扩大爱国斗争的联合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去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宣传联络。同时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致电上海等七个城市的学生联合会，提议组织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五月十一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五月十三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将全体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在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仍然不肯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妄图分化教职员和学生的联合，压服学生的爱国运动。一方面明令挽留蔡元培，一方面又发布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对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请求辞职”表示慰留，并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于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北京学生再次全体罢课。罢课以后，学生们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讲演活动。除在城区外，还分赴昌平、南口、长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同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出版了《五七日刊》等刊物，扩大爱国宣传。还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

学生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驻华公使，联合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更直接向外交部发出警告，催促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一日，徐世昌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并令学生即日一律上课。军警更疯狂逮捕学生。三日，学生被捕一百多人。四日，学生更大规模地出动讲演，又被捕去八百多人。五日，学生出动数千人，怒涛汹涌，军警已无法拘捕。

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进行示威、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到运动中来。全国报界联合会要求“严惩四凶”（曹陆章和徐树铮）。上海日报公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陆章。无锡报界要求“收回青岛”。济南律师公会要求对曹陆章诸贼“提起公诉”，“以正国法”。至此，群众运动已扩展到了全国。

以上是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运动以北京为中心，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广大学生群众的英勇斗争，震动了封建军阀的统治。他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但这时，运动存在着很大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工人市民参加，因而缺乏雄厚的群众基础。

三 工人阶级举行政治大罢工拒签和约的胜利

“六三”、“六四”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工人阶级首先行动起来，举行了政治大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并成为运动的主力，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斗争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在同日罢工。六日至八日，罢工继续扩大。罢工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

“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上海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使反动派十分害怕。北京军阀政府司法部急令对工人进行镇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宣布戒严，并和英、美、德、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镇压罢工。淞沪警察厅长出示布告威胁工人，说什么“同盟罢工是大犯法律的”，对参加的工人“是要究办的”。

上海工人用扩大罢工斗争来回答反动派的镇压。六月九日，罢工规模更加扩大，十日达到最高潮。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同时电车工人、汽车司机和轮船水手的罢工也扩大了，上海的主要水陆交通断绝，自六月五日到十一日，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五十多个，工人有六、七万人，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除坚持罢工外，还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六月八日，华资电车公司工人高举“罢工救国”的旗帜游行。九日，又有工人队伍在南京路示威。十日，沪东工人不顾租界武装巡捕的阻挠破坏，举行万人大示威。十一日，一万多工人在南京路召开大会。随着上海工人罢工的开展，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

“六三”以后，北京的学生仍在坚持斗争。但学生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学联一面发出急电为北京学生呼吁，一面发动学生上街演讲，并挨户动员商人罢市。

在学生的积极推动联络下，上海的商人举行罢市。六月五日，全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民族资产阶级由参加抵制日货进到实行罢市，并在罢市中和反动军警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但是在运动中也显示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是在学生的痛切要求、鼓动和店员的积极支持下，才同意罢市的。罢市以后，他们又摇摆不定，不少人企图违背协议，提前开市。由于店员的斗争，才使罢市坚持下去。在罢市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曾发表宣言，声明罢市“纯系爱国热情，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希望帝国主义“主持公道，弗生误会”。

上述情况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上海罢市以后，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地相继罢市。

上海三罢斗争开始后，在学联推动下，六日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作为各界的联络机构。在三罢斗争中，上海学生同中外反动派的镇压逮捕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格斗。他们坚决拒绝上海反动当局的欺骗和“劝告”，反对开课开市，并向北京、天津、南京、松江、宁波、厦门等地的商会，告知上海坚持罢市的主张，推动各地的罢市斗争。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的努力下，六月初在上海发起筹备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在三罢斗争中首先成立了全国学联筹备处事务所。筹备处曾通电各地学联，暑假期间仍要坚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另外还致电巴黎和会，申明中国工商学界誓死反对和约签字。上海学生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罢课进一步

发展。“六三”以后，镇江、南昌、九江、南通、徐州等地学生也陆续罢课。

这样，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二十二个省的一百五十多个城市，成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六月七日，北京总商会向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说：“市面惶恐，岌岌可危”。同日，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也说：“危机已现，迫切万分”。淞沪护军使会同沪海道尹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运动，势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十日，天津总商会再次发出急电，指出：“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他们都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安定大局。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在六月十日免去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十一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

三个卖国贼的免职和国务总理的辞职，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胜利。六月十二日，上海和各地商人先后开市，工人亦陆续复工。此后，运动的目标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全国人民展开了拒签和约的斗争。

当北京政府电令专使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六月十九日，全国学联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誓不承认和约签字。二十日，山东各团体代表到新华门请愿，要求拒签和约。二十五日，全国学联发出紧急宣言，号召全国不承认和约。二十七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代表再次请愿。二十八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又一次请愿。各省请愿代表也纷纷来到北京。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发表拒签和约通电。通电中一致警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据华北《明星报》统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先后接到这类通电达七千份。六月二十八日为和约签字之日，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住所，不准他们前往签字。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对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结合的必要性，因而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四一八页。

同上，第四一九页。

同上，第四一七页。

同上，第四一九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九——六六六页。

四 爱国反军阀斗争的继续

从“五四”开始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取得拒签和约的胜利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反帝斗争与反军阀斗争结合在一起，一浪接着一浪。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媚日军阀、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以“结党扰乱治安”为名，逮捕山东爱国团体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人。二十五日山东实行戒严。八月三日逮捕从事爱国活动的学生代表十六人。八月五日杀害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人。马良的横暴举动，在山东和全国激起强烈反抗。八月二十三日，山东、天津、北京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和惩办马良。徐拒不接见，反动军警将代表全数逮捕关押。八月二十六日，津京学生三千余人发动第二次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和释放被捕学生。二十八日反动政府调集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在全国一致声讨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八月三十日将两次捕去的代表全部释放。十月一日，上海、南京、天津和山东、河南等省代表三十余人又进行第三次请愿。这次请愿除要求惩办马良外，同时要求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取消二十一条。结果，请愿代表又全数被捕，一个月后被释放。持续几个月的反马良的斗争，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福州惨案。这一天，日本暴徒百余人对正在进行抵制日货宣传的福州学生进行围殴，重伤学生六人、警察一人。随后，日本政府增派军舰来闽。惨案发生后，举国震惊，爱国运动再次掀起热潮。福州全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各省纷纷召开国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支援福建人民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也在全国广泛展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湖南爆发“驱张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从一九一八年上半年统治湖南以后，给湖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湖南人民把张敬尧称作张毒，把张氏兄弟四人称作“虎豹豺狼”。五四运动中，张敬尧肆意镇压湖南的爱国斗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二十多所学校再行组织学联，继续进行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并酝酿驱张斗争。十二月二日，湖南学联举行焚烧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派人镇压，殴打侮辱学生。于是，驱张运动正式爆发。从十二月六日起，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陆续罢课。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一万三千学生发布驱张宣言，声明“张毒一日不除，学生一日不返校”。接着组成驱张代表团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另一方面争取利用吴佩孚等同张敬尧的矛盾，把张驱走。一九二〇年五月下旬，爆发湘军驱张战争。六月张敬尧逃离长沙。

一九二〇年一月，天津学生开展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和抵制日货运动。警察厅长杨以德对爱国运动进行严酷的镇压，逮捕天津各界代表二十四人，同时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于是天津学生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三千多学生在周恩来等指挥下，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要求拒绝青岛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尽快办理闽案。学生的斗争又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五十多人被打伤，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代表被捕。事件发生后，京沪杭等地群众团体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天津学生。经过严重斗争，反动当局释放了

捕去的学生代表。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展开了反对鲁案直接交涉的斗争。在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后不久，亲日派官僚徐树铮公然提出更换代表，补行签字的主张。由于全国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北京政府未敢采纳。随后，日本政府派员来华活动，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提出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以实现其攫取山东权益的目的。对此，全国各阶层人民奋起反对。四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发表宣言，上海南京学生全体罢课，都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上海学生并进一步提出“推倒南北两政府，驱逐武人官僚政客”、“组织平民政府”等主张。北京学生也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没有敢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

以上这些斗争，表明五四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在继续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一 新思潮的澎湃和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个。“五四”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后的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觉悟》等等。这四百多种刊物，绝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想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的。

“五四”以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五四”后的一年中这类社团也在各地大量涌现，约有三、四百个之多，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社等等。

这些社团和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它们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后青年学生热烈追求新思想，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许多人开始改变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观念、旧思想，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到几篇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认为它“对于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为剴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争先恐后的欢迎。消除我们往日的‘三灾八难’”。

但是，当时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内容极其庞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其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中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潘蒂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由于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还在讨论、比较和选择，因此把名目纷繁的各种标榜社会主义的流派都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来介绍和宣传。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在一九二二年时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当时，所谓的新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庞杂的概念。不仅包括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同时也包括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提出的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真、善、美等等。尤其是“民主”（“德谟克拉西”）是青年学生们珍惜的思想武器和追求的理想。不过，“五四”以后，“德谟克拉西”这个词的实际内容，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少数人仍旧把它当作建立所谓

《随感录》，《星期日》第三十四号，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二三页。

“完全纯粹的民主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外，不少人对它作了某种新的解释。《新社会》的主张，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也有的人，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德谟克拉西”，就必须把它同社会主义理想联在一起。

伴随着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流传，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许多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日益在中国广泛地扩散开来，其中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以及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学说。

总之，“五四”以后，人们思想大解放，但摆在青年面前的是五颜六色的新思想。青年们富于理想，又缺乏经验。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极端愤慨，急于获得真理来改造这个社会。因此，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都感到兴趣。他们探索、比较、争辩。他们想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从各色各样的新思想中提取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因素，构成新社会的“理想王国”。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里，提出了自己构制的新社会的蓝图。它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追求进步的人们认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一切阶级、最善、最合理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有的青年还动手实践，建立小小的集合体作新社会“理想王国”的试验。在北京就出现了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思潮中，以无限的生命力开拓着自己的前程，它逐渐为更多的青年所接受，成为他们的行动的指导。其中，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九年七、八月，他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的联合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一九二〇年三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他说：他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他也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久，他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

《发刊词》，《新社会》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本志宣言》，《新青年》七卷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觉悟《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新民学会资料》，第六四页。

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里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继这期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新青年》逐步成为一个倾向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每周评论》在“五四”以后，也不断地刊登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它曾介绍了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当时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从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月，刊载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国民》杂志从一九一九年十月后也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曾经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史》。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发行的报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或介绍主要有：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商品生产的性质》、《马克思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维埃》（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等等。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讲台上占了一定的地位。如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除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国外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外，李大钊写的文章起了主要的作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他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可分为三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部分理论，是不可分的。“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夹杂着一些错误，但在基本观点上是正确的，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很大功绩的。李大钊还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侧重宣传唯物史观。这些文章说明李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 杜威来华和对实用主义的宣扬“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作为知识分子右翼的代表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发表《实验主义》一文，全面地介绍实用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实用主义是胡适派政治改良主义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五四”前夕，杜威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二个月，到过十一个省。他在所到之处，都作过讲演。他的部分讲演稿在《新青年》上发表后，

全国很多报纸转载。讲演录的汇集再版过十几次。《新青年》杂志出了杜威专号。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

杜威说：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他既反对“极端的理想派”，也反对“极端的唯物派”。关于后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然后加以反对。关于如何对待现行制度问题，他既批评了“保持现制派”，也批评了“根本解决派”。对于后者，他批评说：“他们的学说全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这两派一个太偏于保守，一个太偏于激进。因此需要“第三种哲学”，即实用主义。

这个第三派哲学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注重实验，拿应用的结果来证明学理的功效。（二）注重个体的研究，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设”。（三）注意随时补救的知识。

杜威把科学分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两种。纯粹科学“只能拿旁观的态度来研究事实”。应用科学则“要拿主观的兴趣来研究他，不能纯取旁观的态度”。“社会科学都是应用科学”。对于社会科学，“是要他怎样便怎样，不能随他怎样便怎样”。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理应该可以帮助人生行为，指导人生方向，使达到人生希望的目的。这便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这里完全没有“科学精神”，有的只是唯心主义。

杜威卖力地鼓吹庸俗进化论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并用它来反对当时盛行的“根本改造”论。他认为“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他说，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处下手？“我的答案，必说应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

五四运动后，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仅引起军阀官僚的极端仇视，也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

胡适认为当前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对主张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极尽嘲笑攻击之能事。他提出谈主义的所谓三个“教训”：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说，不去研究具体问题而去谈论什么“根本解决”，这是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李大钊在看到胡适的文章以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发表在八月十七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他批驳了胡适的说法。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做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

实际的可能性。”胡适所说的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所有的，是空谈的人给他的。李大钊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指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唯一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李大钊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停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看法，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构造”，经济的构造是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法律政治伦理等都跟着变动。所以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这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有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就是说要进行“根本解决”，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关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政治问题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分裂的开始。在这次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论战，一步一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四 “五四”后的思想逆流和对封建思想的进一步批判

“五四”以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对某些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五四运动中，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尊孔复古的封建顽固势力。

“五四”以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新思想的潮流汹涌澎湃。但是因为经济上政治上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封建复古思想还在顽固地同革命潮流相对抗。

一九一九年十月，总统徐世昌举行秋丁祀孔，北京政府下令各机关团体于孔丘生日放假庆祝。一九二一年三月，北京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发起组织经史学社，目的是抵制“异说”之传播。这一年徐世昌组织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五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修正《褒扬条例施行细则》，经总统批准公布。该细则规定“义夫”、“义仆”、“节妇烈女”、“夫亡殉节者”，均在褒扬之列，竭力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

大量事实说明，“五四”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宣扬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还大有人在。但是简单的照老样子宣传封建纲常伦理，已很难发生效力了。因此中国反动势力需要一种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旧思想，来担任反对新思想维护旧制度的任务。五四时期中西文化问题受到深切的注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地主资产阶级攻击革命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保守的复古的封建主义者极力攻击抵制新思想。中西文化问题就在实际上产生了。这就是中学（旧学）西学（新学）之争。大约在清末民初，有人明确

地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问题。前期的《新青年》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宗旨，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因此被攻击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发出了西方文明破产和用中国文化挽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呼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乘机大唱中国文化优越论，用它作为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在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到欧洲游历了一趟，听到不少关于欧洲文明破产的说法。回国以后，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长文《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点，是“调剂”西方文化的良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用它去解救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中国人的责任。他说，要使中西文化“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用这个“新文化系统”去“超拔”破产的西方文明。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的责任不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发扬光大（当然也要加进一些西方文化），去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这样，输入西方进步文化就完全是多此一举了，在文化思想方面反封建的任务也就被否定了。

东方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按梁漱溟的说法，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条，即人类生活有三条路向：一是向前面要求，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而是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无入而不自得。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从根本上把问题取消。“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孔子的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双、调和、平衡、中，“一切之存在，都是如此”。这是“孔家的根本思想”。他推测世界未来文化要由第一个路向转变为第二个路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的路”就是“孔家的路”。他断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旧道德。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仍是一项严重而艰巨的任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李大钊在《新潮》二卷二号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道德变动与物质变动的关系。他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道德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的，因此“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有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一九二二年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又发表《由经济上解

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他指出：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文化思想也就不一样。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延续的是一种封建的经济制度，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而孔子学说则正是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表层构造”，其内容必然适应着“基础构造”的需要。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经济以至大家族制度便发生了动摇，而这就必然要引起思想、文化、道德的改变。他认为：“孔子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

李大钊的文章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却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并且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起点。“五四”以后，工人的罢工和政治斗争继续进行着。同时，广大知识分子在“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中逐渐改变着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不少先进分子主动接近工人，到工矿去了解工人生活和劳动的状况，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经过一年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较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

一九二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表现了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结合的新的努力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觉醒。这一年的五一节，在全国许多城市举行了集会讲演或游行示威。北京的纪念活动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主持进行，召开了有五百多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会。工读互助团出动两辆汽车上街宣传。平民教育讲演团分组到街头讲演。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了《五一历史》等大批传单。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分子举行了纪念会。在上海也召开了庆祝会，到会者千余人。在广州、长沙、九江、唐山、汕头，漳州、哈尔滨等地，也有工人的集会和散发传单等活动。

各种报刊参加这一年的纪念活动是空前的。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的情况，或发表纪念文章。《新青年》、《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上述情况表明这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经开始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成为包括有工人在内的活动了。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表现。

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广泛了。一九二二年八月《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相继出版，科学社会主义的迅速传播，对走在探索道路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帮助，促进他们抛弃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一九二二年夏秋。陈独秀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编辑了《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还为该号写了《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热情支持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他还积极参加纪念劳动节的活动。同年九月，他写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温和的社会主义。他宣布：“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这表现他已经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转变，对推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到一九二二年夏秋，既信仰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众多了。这就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

立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二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威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威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一九二二年八月正式建立。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发起，推陈独秀为书记。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它的机关刊物。十一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成员先后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人。

一九二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举行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左右，王尽美与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部分骨干，秘密建立了山东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

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在陈独秀帮助下建立的。最早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

一九二二年，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进行了建党活动。一九二二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了进一步接触。到一九二二年他已经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二年四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七月，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八月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社会主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法国更多地接触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会员中进行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些也都为建党作了准备。

一九二一年初，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成。蔡和森曾打算在法国建立共产党。在日本也有共产党的成员，他们是在国内参加建党酝酿活动后去日本的。

上述早期共产党组织，名称不一，但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前进了一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都积极进行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二 罗素来华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更扩大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学者邀请罗素来华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张东荪、梁启超等借助于罗素讲学之机，宣扬社会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因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他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到中国，次年七月离开。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作过多次讲演。他的一些著作也在这前后被译成中文出版。罗素的学说是作为新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新青年》为了迎接他来华，在第八卷第二、三号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学说。为了研究罗素的学说，在北京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的来华和资产阶级学者对罗素的宣扬，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基尔特是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以采取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为特征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它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的英国，是世界改良主义思潮的一种。它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现劳动的解放。

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张东荪等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张回上海后于十一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说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不是宣传什么主义，当然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实际上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论调刚一发表，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的反对。《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过发展实业，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开发实业，什么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认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实业，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所以应该提倡社会主义。

以后，张东荪等又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月刊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中，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张东荪的《现在与将来》和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有代表性的两篇。张东荪等认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工厂很少，“真正的劳动者”几乎没有。在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产与劳动两阶级，是没有多少冲突的。在中国，工人的痛苦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由于得不到工作。在“无劳动阶级”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不能兴起。工人阶级政党也当然不能成立。在这样的中国，“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害民”的“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他们虽然虚伪地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而实际上则一面宣扬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的“阶段说”，一面则把社会改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大加鼓吹。

针对上述谬论，《新青年》、《共产党》和《民国日报》等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批判。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毛泽东在长沙听了罗素关于发展实业与教育的讲演后，同新民学会会员进行讨论，加以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中国与欧美“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这就驳斥了中国现时不能发展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工人运动的谬说。他们批驳了张梁的阶级调和论，指出工人在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他们揭露了张梁的社会改良主义，说：“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供他的御用罢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的核心问题就是“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就是“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

这次论战进行了一年多，它的规模是空前的。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五四”以后的短时间内，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一下子同时广泛流行，所以辨清真假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历史前进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辩论，先进人物更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取得了胜利。这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是建党的决定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因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批倒张梁的谬说，战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非难。但是决不能因此忽视这次论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一大步骤。

三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二十世纪初，它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传到了中国。“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并扩散到工人之中。当时先后成立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如晦鸣学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心社、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二年，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或侧重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约有七十多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反封建来说，有革命的一面，因此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但它又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如不批判这种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产生。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许多派别。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所谓正统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代表性刊物是《进化》。他们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等社会现象，则是由于国家、政治、法律和私有制毁坏这种本能的结果。他们把作为阶级斗争必然产物的国家，看作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年二月），《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

他们表示，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而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从反对一切国家出发，他们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诽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府。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现所谓“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可见，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

从一九二一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先后发表了批判文章。他们首先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国家的性质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剥削阶级利用国家压迫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压迫，求得彻底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的。因此，对于贵族资产阶级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并且把它们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则不仅不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加以巩固。因为只有巩固它，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使他们“不至死灰复燃”。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他们尖锐地指出，若是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的出现；……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的谬论。他们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把生产资料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将生产资料收回国有，实行集中的有计划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混乱或停顿状态，

《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第二号，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版。

《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八卷三号，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出版。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九卷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

而把社会拉向后退。他们还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水平而主张立即实现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还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此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也还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

《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成绩是很大的。通过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明了中国应该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这次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体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没有这场斗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四 新民学会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的讨论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蔡和森和一部分有志救国的进步青年，在湖南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会章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一九一八年六月，学会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认为组织会员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思潮比较便利的法国去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于是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李维汉、罗学瓚、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及萧子升等一批会员相继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不但推动了会员本身的思想的变化，而且对学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中，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成为当地群众运动的骨干。五四运动后，会员们一面投身革命运动，一面探讨革命思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批会员开始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会员思想的变化，关于学会的宗旨、任务等问题日益为会员所关心，并经常进行讨论。一九二二年七月六日到十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召开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决定会务进行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在讨论改造的方法时，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蔡和森等“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而”。

会后，争论各方均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二月一日写信给在法诸会友，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对改造的方法，他不同意萧子升等人的意见，而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且

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二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新民学会资料》，第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新民学会资料》，第一三七页。

阐明了自己赞成“马克思式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由。蒙达尔尼会议关于学会方针任务的讨论，在国内新民学会会员中引起很大反响。

一九二一年一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举行新年大会，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问题。关于共同目的，大多数会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关于方法，会员们各抒己见，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在讨论时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最后表决，多数会员赞成布尔什维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如何着手”问题，提出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等方面均可进行。这次会议提出了“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的建议，并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上多数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这就使新民学会这个革命团体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民学会会员在通信中和会议上曾讨论组织共产党问题。特别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通信中深入地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有了党，革命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和蔡和森对建党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思想准备之一。

五 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组织的发展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一九二二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 and 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道理；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打倒资本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是工人群众自己的责任，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打倒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由工农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劳动界》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工人称它是自己的“喉舌”。它是当时工人们学习社会主义基础知识的良好读本。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它的中心内容是反映当时工人的悲惨生活，报道工人的罢工斗争。它特别强调要使刊物“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成为他们“阶级战争的工具”。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和《劳动与妇女》。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新民学会资料》，第一四四页。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第二三页。

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办工人补习学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把长辛店作为进行工人运动的重点。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主持人是邓中夏。稍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等办了类似的识字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曾到济南机车修理厂进行工作。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联系了起来，一方面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得到进一步的改造，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

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之后，迫切要求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一九二一年十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他们把“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作为成立该工会的宗旨。上海机器工会于十一月正式成立，会员有三百七十多人，并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这是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工会。同年十二月，在上海改组成立印刷工会，会员达到一千三百多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长辛店工人一千余人在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不久，便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济南的理发工人、印刷工人，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武汉的人力车工人，都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领导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口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湖南的共产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中进行工作，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时，长沙数千工人举行游行，提出“改善待遇”、“加强团结”的口号。当地各行业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

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这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经过与会代表同意，大会的议程包括：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会议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情况。二十五、二十六日休会两天，起草会议文件。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集中讨论会议文件草稿。在讨论中，既有一致的认识，也有激烈的争论。最后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联合第三国际。凡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的人，经党员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但是在入党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以及严格的纪律。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开展工人运动。在对待其它党派的态度上，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场上，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七月三十一日大会闭幕。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鸦片战争以后，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实现自己的纲领，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四五一页。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九 页。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九七页。

第二章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协同”侵略 军阀的混战和政治争斗

一 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争夺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大战结束时，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四国借款团，由该团包揽对中国政治的和经济的借款。美国的目的是压制日本的在华势力和由它来控制中国。经过一番斗争，新四国银行团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纽约正式成立，美国在银行团中占着优势。美国公使在致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新银行团“应得预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帐之权”。这就是说美国企图成为军阀政府的太上皇。

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新四国银行团。上海和北京各界及学生团体等，纷纷发出函电，反对银行团对中国投资，反对北京政府向银行团借款。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同时由于四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当时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势力比较大，使银行团无法进行工作，美国未能达到预期的侵略目的。但是，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在美国建议下，召开了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美国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依然是企图压制日本和进一步控制中国。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拆散了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条约在一九二一年期满后没有续订），又联合英国强迫日本接受美、英、日海军吨位为五、五、三的比率。这些是对日本的打击。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一方面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一方面又声称完全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中国代表还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美国因为二十一条侵害了它在中国的权益，因此逼迫日本让步。由于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斗争和美国的压力，日本不得不表示可以放弃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条约有：《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是由中日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的。这个条约虽然规定日本将侵占的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是又规定中国必须将该区域全部化为商埠，准许外人在这里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职业。关于日本侵占的胶济铁路，条约规定应由中国用五千三百四十万金马克赎回。在路价未偿清以前，中国政府应任用一日人为车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在此条约的附约中，还规定了许多对日人和外国侨民的特殊权利。因此，所谓交还胶州和胶济铁路，只是把胶州由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改变为各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商埠；而胶济铁路则仍然为日本控制。华盛顿会议并未使中国真正收回山东的主权。

关税条约规定：中国进口货税率一律为值百抽五；废除厘金，代以值百

抽二点五的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额可稍加提高，但不得超过值百抽五。这是继续侵害中国关税主权的条约。

九国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公约又规定：要切实“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为此，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九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图谋扩张在华侵略势力的一个胜利，由此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了几个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局势。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形势的重大变化。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对外关系同这种形势是分不开的。

对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损害中国权益的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媚外行为，中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留美学生曾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杭州、上海、济南、北京、汉口、天津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都曾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反对中日会外交涉，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侵略性质，指出：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采用“门户开放”政策，“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由历来受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中国人民必须起来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回到中国市场。特别是日、美、英等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世界大战一结束，中国进口贸易总值立即大增。以一九一三年进口总值为一百，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一十四，一九二三年激增至一百六十二。因此，入超比战前更为严重。一九二二年入超为二亿二千万海关两，已达一九一三年水平，一九二一年更高达三亿海关两以上。各国在华商船航行吨位，一九一三年为七千三百四十三万吨，一九二二年达到七千六百六十一万吨。中国各商埠的外侨和外商，一九一三年分别为十六万三千余人和三千八百零五家，到一九二二年各增至三十五万二千余人和七千三百七十五家。

作为财政资本在中国统治中枢的外国银行，在大战中和战后，迅速增多起来。一九一四年以前，日本以外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共计十六行七十一处（连同分支机构），而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十三年间，各国在华新增设的银行即几乎相当于过去六、七十年间开设银行的总和，达十六行五十处，其中大多数是一九一七年以后设立的。重要的有：英国的大英银行，美国的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友华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意大利的华义银行等。日本在华银行中资本总额在五千万至一亿日元的住友、三井、三菱等银行，都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开设的。外国银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使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工业资本成为它们的附属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战后也空前地加多了。据统计，已查明设立年代的外国工业企业，一九一一年以前为三十八家，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二年为二十八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二年为五十四家，显然是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战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投资，更重视运用“中外合资”的办法。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间，纯日资企业的资本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四，中日“合资”

企业中的日方资本竟增加了百分之六百五十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所谓“中外合资”企业，事实上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

此外，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垄断组织，在战后又把它们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在中国增设了许多分支机构。一九一九年设立的有瑞士的汽巴公司；一九二一年设立的有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法国的永兴洋行；一九二一年设立的有英国的邓禄普橡皮公司；一九二四年设立的有德国的德孚洋行。日本各财阀的企业，战后在中国更加活跃。各国在中国的公司商店数目，在战后大大增加了。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同时帝国主义尽力用经济力量控制中国的政治，使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成为自己的工具。

二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和曹锟贿选

从皖、直、奉三派军阀势力分立以后，彼此间不断进行混战和政治争斗。一九一八年九月，老官僚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段祺瑞为缓和皖直矛盾，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但他仍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则依靠手中的军事大权，企图武力统一西南，并排挤直系军阀，夺取他们的地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冯国璋死后，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兼直隶总督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但有实力的人物是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他们为了和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从各方面进行倒皖活动。经过广泛的联络，从一九一九年秋冬到一九二一年初，形成了直、苏、鄂、赣、豫五省和东北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被北京政府派到湖南同西南军阀作战的吴佩孚，也和湘桂军阀订立了停战协定，结成反皖同盟。

与此同时，吴佩孚不断发表通电，主张拒签巴黎和约，反对安福系头目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从南北战争前线撤兵等等，从政治上打击皖系军阀，并骗取舆论的支持。

一九一九年冬，段祺瑞准备对直系的长江三省督军采取行动，直皖的矛盾尖锐化。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八省反皖同盟两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解散安福系，直军撤防北归。五月，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的阻拦，撤军北归，六月上旬抵郑州。与此同时，段祺瑞也举行秘密会议，调兵遣将，积极进行作战准备。七月四日，在直系奉系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重要分子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于是，皖系决定发动对直战争。七月八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七月十一日，张作霖通告派兵入关。

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爆发。直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在河北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开始皖军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随后吴佩孚突袭皖军前敌指挥部得胜，同时奉军在东路协助直军作战，皖军遂全线崩溃。十八日，段祺瑞向直军求和，并通电辞职。接着直奉联军开到北京。战争以皖系失败而结束。

战争结束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祸首，解散安福俱乐部，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和西北边防军等。

但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是不能长久共处的。

战争一结束，两派军阀就展开激烈的争夺。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当上了两湖巡阅使，直系又取得了江苏督军的地位，并连续获得对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军事胜利。奉系虽然夺得大批皖军的辎重财物，但未抢到很多地盘，于是就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广州的孙中山，结成反直的三角同盟。

直奉争夺的中心是北京政权。一九二二年八月组成靳云鹏内阁。靳内阁开始亲奉，以后被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随后张作霖到北京，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推倒靳内阁，推荐以奉系为后台的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梁内阁上台后，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战犯，任亲日派曹汝霖等以要职，又打算和日本举行山东问题的秘密谈判，以换取日本的借款。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机机会，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接二连三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各种丑行，逼迫梁士诒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由颜惠庆暂时组阁。这时奉军连续开进关内备战。直系也调动军队，准备和奉军决战。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战争一开始，直军一度后退。五月四日，原系冯国璋部下的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牵动整个西线奉军瓦解，全部被歼。东线奉军也被打败。随后，张作霖逃回滦州，梁士诒等逃往日本。直奉战争结束。北京政府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下令通缉奉军祸首。但是，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于六月四日自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并派兵在秦皇岛附近和直军继续作战，先胜后败。接着，由英美教士调停，奉直签订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

直奉战争以后，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制造“合法”的假象，直系军阀曾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当他们自认为统治已经稳定时，就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由曹锟直接上台。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内阁成员在曹锟指使下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但事后直系军人反咬总统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阁制。接着直系军阀导演了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黎下台。黎元洪不得不出走天津。到十月，曹锟便上演了贿选的丑剧。

曹锟为了把自己“选”为总统，采取了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的手段。他以四十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又以每张选票五千到一万元的价钱（选前给支票，选后兑现）贿买了五百多个议员。同时对反直派进行镇压，还逮捕记者，封锁舆论。十月五日选举的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警戒。通过这样的“选举”，曹锟坐上了总统宝座。十月十日，曹锟就职。同日，颁布一部反动的《中华民国宪法》。

曹锟的贿选和“制宪”，是对民元《约法》和由约法规定的国会制度的极大讽刺。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把《约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并企图用它来维护革命的成果。但是，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曹锟和吴佩孚，却都把《约法》和国会作为玩弄政治阴谋和争夺权势的招牌。经过曹锟的贿选和“制宪”，辛亥革命留下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连影子也没有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宪法和国会不过是军阀官僚手中的玩物。曹锟的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

反对。

三 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和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

直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高唱“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是北洋军阀中力量较大的一派吞并异己、实现专制独裁统一的传统政策，袁世凯、段祺瑞都曾推行这个政策。直系头目吴佩孚在和段祺瑞争斗时，“爱国”是他的口头禅，一再通电谴责武力统一，主张南北和谈，甚至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寔，实现“和平统一”。这些谎言曾起过一些欺骗作用。在直系夺得北京政权以后，吴佩孚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企图通过黎元洪和王宠惠内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野心。但是由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当总统，直系内部发生保、洛分化，使吴的计划落空。于是吴佩孚便以洛阳为大本营，开始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一九二三年三月，吴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他凭借河南、湖北、直隶、陕西的广大地盘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一面准备对东北的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粤军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指挥和策动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攻掠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

当势力强大的中央军阀大唱“武力统一”的时候，各省军阀为了抵制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侵占自己的地盘，达到自保的目的，则大唱“省自治”或“联省自治”。

湖南省的军阀是省自治、联省自治最早的鼓吹者。一九二二年七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湖南人赶走张敬尧之后，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十一月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同月，谭去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省议会选举了省长，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一月公布了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

一九二一年内有许多省的军阀宣布自治和联省自治。一月，四川军阀刘湘通电宣告“川省完全自治”。二月，在自治的名义下，川军赶走了在川的滇军。四月，贵州军阀卢焘通电主张“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失败后，在五月宣布东北三省自治。奉系是国内最大的军阀之一，它本来是积极向外扩张的，但在战争失败之后暂时采用自治的口号以图自保。六月，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法，实行地方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这个通电发出后，大受联治派的欣赏。湖南的赵恒惕、贵州的卢焘、广东的陈炯明、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顾品珍都响应卢的主张。广西省议会、湖北省议长、山东省议会都通电响应。陕西成立了“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了制定省宪案。在湖南省公布了省宪法以后，浙江、广西、四川等省都公布了省宪法。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对军阀来说，不过是纵横捭阖的一种手段，谁也不想给人民一点民主权利，也不是真正的保境安民。军阀之间的战争和政治争斗是十分激烈的，势力的消长和地盘的得失变化很快很大。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是不能实现的。这种论调在喧嚣了两三年之后，就沉寂下去了。

四 国民经济发展的迟滞 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在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和军阀不断混战的情况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迟滞的状态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中国民族工业的个别部门和企业，继续有所发展，但就民族工业的整体来说，却迅速由繁荣转入萧条。大战期间发展较快的棉纱业，战后险象环生。民族资本的纱锭数，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而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数，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大大超过华厂的增长数。由于外资的竞争和排挤，原料和市场都十分紧张，形成“棉贵纱贱”的状况。加上苛捐杂税、运输困难等原因，华资纱厂屡屡发生亏本现象。一九二二年每生产十六支纱一包就要亏银十二两以上。这样，一些准备扩充的纱厂，都改变原来的计划。新建的纱厂往往开工不久就告停业。还有一些新厂，维持不下去，只好出租或出售。一些历史较久的老厂，也是奄奄一息，时开时停。一九二二年八月，华资纱厂联合会曾召集上海各纱厂开会，公定最小限价，以维持生产，但纱价仍然下跌。十二月，又作出停工四分之一的决议，但是这也没有使纱市情况好转。到一九二三年，有的厂就只好全部停工或仅作日工，或乘年关时节，提早停工。华资纱厂停工减产，外资纱厂就乘机积极扩张势力和占领市场，因此许多华厂倒闭或被外资并吞。

中国的面粉业，自一九一五年起出超。战后各国的生产逐渐恢复，排斥中国面粉入口，使中国面粉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同时，日、美、澳洲、加拿大的面粉大量输入中国，充斥市场。一九二二年面粉入超合银一千一百多万两，一九二三年增至二千多万两。因此上海面粉厂倒闭停工的很多。

战后由于铁价暴跌，铁厂纷纷停工。从一九二一年起，本溪湖铁矿和铁厂、汉阳钢厂、扬子机器工厂、汉阳铁厂等先后停工。此后钢铁工业一蹶不振。

再如丝织业，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被称为上海丝织业的“危险时期”，很多丝绸厂倒闭。

以上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变化的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农村经济起了极大的分解作用，加深了农村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收原料的市场。

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其中绝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而主要销售对象则是广大农民。以一九二一年为例，消费品占进口商品的百分之七十一。帝国主义向农村倾销商品的结果，打击了农村的手工业，促使广大农民更加依赖于市场，而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直接消费者。这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并且迫使农民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以便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这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国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三分之一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低于这个比例，交通不便的地区更低，华东地区则偏高。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世界市场。如：棉花，一九二三年全国产棉共六百多万担，日本在华纱厂用棉与运往日本者，占总额的将近二分之一。大豆，一九二三年东北大豆总产为一千二百万吨，其中只有十分之一供当地

消费，其余绝大部分以原豆或制成豆饼、豆油，输往国外市场。这是中国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一种表现。

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排挤了粮食生产，使谷物生产缩减。这又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倾销商品粮的市场，使中国的农业陷入更深的危机中。

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制，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虽然农民不断分化，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富农手里，但是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相应地发展资本主义，相反却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愈多，其出租亩数占总亩数的百分比也愈高，也就是说，从事商品生产的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大农场，而是贫苦农民所经营的小农经济。因此，农村中农业生产商品化的问题，主要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商品化。小农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量很低。但是，他们为了交租、还债，为了用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从市场上换回最低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在收获时尽快贱价出卖自己的产品。结果是，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残酷压榨，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造成农村经济的凋敝。

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的加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痛苦。

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直接剥削中国工人。战后民族资本主义为了和外资竞争，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的榨取。工矿企业几乎没有劳动保险，伤亡人数很多。本溪湖煤铁矿，一九一九年死亡二千六百五十七人。开滦煤矿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次瓦斯爆炸，工人死亡五、六百人，伤者不计其数。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一九二二年上海等地工厂工人的日工作时间一般是十二小时，多的十四、五小时。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上海纺织行业男工的日工资约在二角二分至五角之间，女工约在一角五分至三角一分之间，童工约在一角至二角之间。工人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

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的残酷压榨下，既要交租付息，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有的地方还有几年至几十年的田赋预征，如四川某些地方，在一九二六年竟预征田赋到一九五七年。经济榨取之外，农民还被抽丁、拉夫。在军阀连年混战当中，更不断遭到烧杀淫掠之害。战祸之外，天灾不断。一九二二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达两三千万人，死亡五十多万人。在人祸天灾交迫之下，农村凋敝，田地荒芜。广大农民遭受着无穷无尽的灾难。

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大量破产，境况一天不如一天。知识分子则受着失业的威胁，过着困苦的生活。

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明，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迅速广阔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

一 “好政府”主义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不满现状而又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谋求中国的出路。改良思潮一时广为传播。

所谓“好政府”主义就是这个时期改良思潮的一种。

一九二二年五月，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认为，“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的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及“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败坏，“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组织“好政府”，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主张是：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克期实行分期裁兵，不准召募新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采用直接选举制；财政公开等等。

一九二二年九月，在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入阁，王宠惠为国务总理。他们都属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因此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它实际是听命于吴佩孚的“洛派”政府，而为“保派”直系军阀所反对。它仅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于十一月下旬被赶下了台。“好人政府”很快成了历史的陈迹。

二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在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国家。以后陆续有人提出这类主张。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间，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要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浪潮。当时鼓吹“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地方的军阀政客，一种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前者是把这种主张作为同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争斗的工具，后者是企图通过自治、联治和制定宪法的办法，改良腐败的政治，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一九二二年七月谭延闿提出湖南自治以后，得到湖南不少人士的赞同。十月五日，长沙有三百七十七人联名发表建议书，主张由谭延闿的“革命政府”联合各团体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起草与公布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湖南的正式议会和各级自治政府。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认为：“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引起军阀争夺总统、总理的职位所致。救治的办法是：各省人民，自制省宪法，文

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省长处省城，督军居安塞，军民两政，互不相牵。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如此，“自无争位攘权之事”，“内乱庶其弭矣”。他认为这个“联省自治虚置政府”的办法，“中国所宜，无过于此”。

一九二二年以后，各地成立不少自治运动的团体。如北京成立有江苏、安徽等十三省市自治联合会和直隶、山东等十四省自治运动同志会。天津成立有直隶、河南等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四川成立有全川自治联合会。此外，许多群众组织也都纷纷要求自治。在这些团体中，固然有不少军阀代理人 and 官僚政客参加，但多数是各阶层的改良派人士。这些团体为实行“自治”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提出“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的主张。他的意见是：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权限所以很大，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权限。他断言反抗联省自治这面“旗帜”的，一定要失败。

一九二三年七月《太平洋》杂志四卷二号发表的《时局之根本的解决》一文，是宣传省自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中国时局纷乱的主要原因是“武人挟其武力，割据自雄，而操持一拥空名无权力之所谓中央政府以号令国民”。消除这种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实行“省自治”。其理由是：“以中国之大，决不是可依中央集权政策，以一中央政府支配全国政治而能善其事的”；而且“对于割据之武人，欲摧破其势力，惟有依省民自决主义，以民众之势力抵抗之，较为有效”。作者认为只要国中民主分子、各省有力人士一致努力，“自治运动收效之期益当不远”。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作为一种改良思潮，一度十分流行。但是人民不可能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实现民主自治，军阀则有的公开反对，有的口头赞成实际反对。这种思潮在喧嚷了两三年之后，也就消沉下去了。

三 制宪救国

制定一部民主宪法，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救国治国的目的，这是二十年代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的报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东方杂志》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了两期《宪法研究号》。制宪和省自治两种政治主张，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主张自治的人大多要求制定一部省宪法，进而制定国家宪法，而主张制宪的人中又有很多人主张在宪法中规定省自治或联邦制的条文。

中国是一个买办封建军事专政的国家，大小军阀掌握中央和地方的政权，人民毫无民主自由。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没有制定宪法。因此当前的急务，就是制定宪法。有人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十一年了，在此期间，“兵连祸结，扰攘至今，根本大法，迄未公布”。“吾国今后唯一要图，无过于急速制宪以立国本”。有人说：“吾以为今后国民之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报》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日出版。

李三无：《宪法问题与中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重任，惟促成宪法之制定，俾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

要制定的宪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人们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人主张中国的宪法应明文规定：（一）各地方今后绝对不许有所谓督军巡阅使及其他类似制度之存在。（二）全国兵士总额，各地分配之最高额，及全国每年度军费之最高额。（三）保障全国教育独立及教育经费独立。（四）赋予各省以广大之自治权，使含有联邦之性质。（五）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及法律上地位与待遇平等。（六）扶助国民之经济生活，确立救贫事业。有人提出所谓“三个最大的问题”，要求宪法作出明文规定，即采用普通选举、规定劳动法典，承认妇女参政。有人主张“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条文是：“中华民国之国民，得依生存权，请求国家或地方团体，保障其生存上所需之最低生活资料之权利”。

在制宪活动高潮中，一些省和人民团体还制定了几种宪法。《浙江省宪法》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公布。《湖南省宪法》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公布。广东省也公布了一个宪法。国是会议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这些省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军阀并不想实行，那些宪法只是一纸空文。

制宪救国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活动，它本来就具有抵制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主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性质。有的文章更明确地说出了抵制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思想。例如有人提出所以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是因为这样作可以“缓和阶级之斗争”，“图社会之健全发达”，“渐减贫富悬殊之害”。这种主张明显地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之思潮，磅礴大地”的恐惧。

从清末以来，制宪问题是中国政治上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一九二二年前后两三年中制宪活动是一个高潮。由于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活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四 废督裁兵

辛亥革命后，军阀拥有重兵，长期进行混战，这是国家极大的祸害。因此在二十年代初期，废督裁兵之说，高唱入云。《改造》杂志曾发表长篇的《裁兵计划书》，提出了详尽的裁兵方案。起先主张“省宪运动”的梁启超，随后又主张“裁兵或废兵”。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作讲演，认为“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但是“万不可有”“法律外的行动”。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的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合发表《废督裁兵宣言》，并组织裁兵促进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筑路养兵意见书》。在北京有国民裁兵促进会的成立。安徽召开了废督裁兵大会。湖北成立了去兵运动团。苏皖召开了全国裁兵大会。湖

史维焕：《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同上。

李三无：《宪法问题与中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邓飞黄：《我对于国宪的三个建议》，同上。

史维焕：《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同上。

史维焕：《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平民教育》第四十六号，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南各公团发出裁兵通电，学生们散发裁兵传单。

上海各团体的《废督裁兵宣言》呼吁军阀应“顺从民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呼吁全国官吏和国会议员“彻底觉悟，各凭良心，首先办到裁兵一件大事”。这是极端软弱的呼喊。《孤军》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的《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一文，提出了促进和实行裁兵的具体办法。“促进”的办法是：由各省有志裁兵的人组成中华裁兵救国期成会，作为裁兵的常设机关。裁兵机关要进行裁兵宣传，并筹办民团以养成真正国民军的基础。如果军阀拒绝裁兵，就采取拒税、罢课、罢市、罢工等行动。“实行”的办法是：以人民和政府为主体组织裁兵救国实行委员会，筹集裁兵基金，分期裁撤现有军队。退伍官兵一部分安置在警察民团中，其余安排到筑路、浚河、农、林、渔、牧等事业中去。裁兵以后的兵制采取征兵制。

在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是裁兵的积极倡议者。他主张用裁兵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他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到次年二月先后发表了《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化兵为工和平统一》、《裁兵宣言》等文告和讲演。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表示愿意“调节”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的“利害”，使他们归于“一致”，以实现“和平统一”。怎样实现和平统一呢？他认为“和平之要，首在裁兵”。“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裁兵办法的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当时的《东方杂志》称赞这篇宣言提出了“调和实力派的计划和实行裁兵的方法”。

上述所有关于裁兵的宣言、计划、办法，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它们同前面所举各种改良思潮一样，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这就说明一条真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确定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的奋斗目标。但是“一大”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缺乏认识，没能制定出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一纲领的制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过“二大”完成的。

一九二二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列宁在会前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还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提纲和印度人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列宁的提纲和报告，阐明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列宁指出：必须把世界各民族明确区分为少数的压迫民族和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这是共产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第一步任务，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即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且从一开始就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要支持农民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压迫的斗争，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同时要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各国共产党都要直接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推翻整个国际资本；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列宁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对抗华盛顿会议，动员远东各国人民投入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会。中国有代表团参加，代表团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新闻记者等各方面代表，共三十多人。会议着重研究了“中国问题”。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华盛顿会议使帝国主义“结成了他们图吸血者的同盟”，给远东各国人民“以新的锁链，新的恐怖，和更新的虐待”。号召远东各国人民“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不得胜利，誓不休止！”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和这个革命的反帝反军阀的任务。

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首次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问题。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解决中国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接着，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召开。到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蔡和森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九十五人。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决议案，通过了党章，通过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正式公布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宣言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形势以及华盛顿会议后各帝国主义“协同”侵略中国的局面，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

宣言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宣言说：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八十年的侵略，“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无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配。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在政治上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总之，“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工人阶级具有“伟大势力”，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无已”，将会成为“革命领袖军”。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降服于资产阶级，这是结束封建制度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民主革命成功后，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这时无产阶级便要“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是党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宣言同时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和中国无产阶级现状下，“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但是，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议决案提出，要同国民党互商联合战线的进行办法，要组织民主主义的左派议员联盟，要在各城市集合群众团体成立“民主主义大同盟”。

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向导》

周报在上海创刊，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销处，公开发行。它在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批判各种错误政治主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

大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关。选出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邓中夏、向警予二人。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这以前，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八十多年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然而没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能够真正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提出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的重大标志，表明了共产党对中国情况了解的加深。没有党的最低纲领就不可能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如果不是在党成立仅仅一年之后，及时地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不可能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党的“二大”的功绩是伟大的。

二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及对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和军阀谬论的批判

“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向全国人民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政治主张和军阀的反动谬论，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迅速深入人心。

一九二二年九月出版的《向导》第二期上，发表了陈独秀的《造国论》一文，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扼要的解释和发挥。他说：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状况之下，“还在‘造国’时代”。什么恢复法统、速制宪法、地方分权、整理财政、澄清选举等等主张，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他使用了“国民革命”的口号。认为：“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国民革命成功了，民主的统一政府实现了，中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随后就要进行“经济上的创造”，就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政治的和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创造真正民国的的工作才算完成。陈独秀为什么使用“国民革命”这个口号？后来他解释说：“我们以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

不久之后，“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成了各革命阶级阶层共同的口号。

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后，胡适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反对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攻击“二大”宣言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各支持一派中

国的军阀进行混战的正确分析，说这一分析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把“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同“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混为一谈，完全否认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军阀混战的事实。他还说什么由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远东局面的变化，“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现在无论是哪一国——日本、美国或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来建设本国的统一国家”。由此他提出：“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哪怕国际侵略的噩梦”，“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驳斥了胡适替帝国主义辩护的谬论，大力宣传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导》上的文章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几十年来国际侵略者加给中国人民的“极大痛苦和耻辱”，以及英美如何扶植直系军阀、日本如何扶植皖系奉系军阀来扩张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指出了外国投资者所希望中国的“安宁与统一”，只是要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凭他们榨取而不加反抗，这同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安宁与统一”是根本不同的；并且由于各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愿望相互冲突，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是做不到的。文章还列举事实驳斥胡适所谓中国已没有国际侵略危险的谬论，指出：大战后的远东局面的确发生了变迁，倒了俄德两个强盗，却“来了一个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美国强盗”。远东变成了英、美、日三国侵略的局面。总之，“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非急速打倒他不可”。

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军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案和反动主张，反复宣传了非打倒军阀不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理。

《向导》揭露了封建军阀穷兵黩武、兵连祸结、卖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指出军阀的专政和割据，是中国政治的乱源。辛亥革命以来，民主与封建之争所以不能结束，“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现在“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种情形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向导》尖锐揭露了军阀所叫嚷的“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实质，指出这不过是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玩弄的一种手段。“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制、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向导》报道了不少号称“联省自治模范省”的湖南的情况，用军阀赵恒惕在“省宪”、“自治”招牌下惨杀劳工、勒封报馆、剥夺人民书信集会结社自由、贿买选举、向商人勒捐、向农民提征田赋、勾

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

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二期，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二期，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结吴佩孚肖耀南等种种罪恶事实，揭露联省自治的骗局。

《向导》批判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制定宪法”、“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指出：“革命彻底成功，方有彻底的民主的宪法”。在军阀统治之下，连开一个国民大会还不可能，那会让我们制宪？就是我们制成了宪法，也等于一纸空文。企图靠制成一部成文宪法来做金刚符咒，降伏军阀这般鬼怪妖魔，不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便是有意助长军阀的专横。“用和平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想以‘好人努力’的方法将政治整理向宰制势力利益的反面，这不是呆小子的梦想，便是骗子手的谎诺”。王宠惠等曾发表“好人奋斗”的政治主张，但是等到上台后，“除了进行卖国借款，帮军阀忙军饷，替军阀任免官吏以外，连一个治安警察条例都不能取消”。象这样一个“好人政府”，也仅存数月即倒台。“好人政府”的完全破产说明，“武人政治下，任何改良主义都无实现之可能”。

党通过《向导》还大力宣传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强大的敌人，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联合战线才有可能。为了推动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坚决走向革命的道路，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批评。当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来到上海的时候，一时孙吴（佩孚）携手之说甚嚣尘上。《向导》针对孙中山企图利用直系军阀来完成全国统一的错误想法，指出：政治上的统一，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革命党应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通电后，《向导》批评了他的“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倡言与军阀妥协裁兵，已是损伤了革命精神；因裁兵而主张邀请外国帝国主义者干与内政，更是引导国民运动脱离正当轨道。“幸望中山先生迅速改变这次宣言与各派军阀妥协与外国帝国主义合作的有害政策”。

通过这一时期的宣传和斗争，“国民革命”这个总口号和民主革命纲领很快为广大的革命人民所接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呼声响彻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

三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巨缘：《国会选举制宪统一的噩梦》，《向导》第三十四期，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和森：《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向导》第十八期，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君宇：《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向导》第五期，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田诚：《真不愧好人奋斗》，《向导》第九期，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向导》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

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十九期，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共产党组织就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机关。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书记部发表宣言，号召各地劳动团体共同进行劳动组合。同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不久又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济南、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分部，加强了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国民党势力控制的广东，允许劳动运动的存在，废除了北京政府刑律中罢工治罪的条文，这有利于广州和香港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十三个月内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两万多名海员由于资本家拒绝增加工人工资等要求，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更激起中国工人的反抗。二月底香港全体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达十万人。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当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路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制造了死六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更加激烈。这次罢工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政府和全国工人的支援。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北京、汉口之间。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封闭工会的命令，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斗争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工人的斗志。以此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适应工人运动高涨形势的需要，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的一百多个工会，三十多万会员。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决定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这次大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包括江西安源地区）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到一九二二年秋，湖南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万余人，先后举行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长沙工人、常宁水口山矿工人等十余次罢工斗争。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在上述十余次罢工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安源路矿工人的大罢工。

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有一万七千多工人。一九二一年秋和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情况，布置工作。李立三等人受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的派遣于一九二一年冬来到安源。他们在安源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团结了工人，为罢工作了准备。罢工前夕，共产党又把刘少奇派来安源，加强了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一万多工人冲出矿井和厂房，举行了大罢工。罢工爆发后，路矿当局勾结反动军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九

月十八日，终于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十三项协议，罢工取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了开滦五矿（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工人的大罢工。开滦煤矿最初由官僚资本创办，后被英帝国主义强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多次派人来开展工作，成立了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一九二二年掀起的全国罢工高潮，增强了矿山工人的斗争勇气。十月十六日，矿局拒绝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六条要求。十月二十三日，五万多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支援开滦矿工。唐山铁路、纱厂、水泥厂工人和交通大学学生，都对矿山工人进行了援助。英国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对工人进行了武力镇压。曹锟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三千保安队，再加一个联队的英军，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共达一万余人。由于反动派的镇压，同时也由于矿局最后不得不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罢工于十一月十六日宣告结束。

这次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最高峰，是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的北方区委，利用军阀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旗号和吴派交通总长与梁士诒交通系的矛盾，迅速扩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的工人工作。其中尤以京汉路工会工作的成绩最为显著。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全路已有十六个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达三万多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一九二三年初决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当十六个分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计数百人齐赴郑州后，吴佩孚却强令禁止开会。二月一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进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又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为了反抗军阀的压迫，总工会决定于二月四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罢工命令下达后，二月四日十二时，全路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二月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结果有四十四人惨死，三百多人受伤，六十余人被捕入狱，一千多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林祥谦在敌人屠刀面前威武不屈，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开”，英勇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

二七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二七罢工。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中国工人罢工的宣言。

“二七”大屠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认识到：政权和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要打倒他们，“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如此“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同时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因为“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

二七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对工人阶级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提高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

全国的政治威望，也扩大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一九二一年九月，在萧山衙前村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取消地主苛例等斗争。年底，农会势力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八十余处。最后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当局镇压下去。

接着兴起农民运动的地区是广东。一九二二年，彭湃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七月底成立赤山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成立海丰总农会。接着又有陆丰、归善两县农会的成立。到五月，三县农会会员达到二十万人。于是彭湃将三县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广东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各县设分会。后来农会又发展到紫金、惠来等县。农会组织的发展，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提供了重要条件。

湖南也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毛泽东在领导城市工人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农民问题。他在自修大学补习班（一九二二年九月设立）的国文课中，曾详细分析过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三年初，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人到衡山岳北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白果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土地集中在赵恒惕等几家大地主手里，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残酷。九月，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一万多人。不久，会员猛增到十余万人，其中妇女占一半，不少妇女成为农工会的骨干。在农工会的领导下，农民开展平粜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斗争，同时还开始酝酿减租减息。年底，赵恒惕两次派兵镇压，对农民进行野蛮的烧杀。但是，湖南农民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

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也很重视发展青年运动。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的。

一九二二年八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建立了青年团。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中也建立了团组织。这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了。

但是，它在成立之初，没有一个正式的统一领导机构，也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团员的成份很复杂，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的。因此，思想不统一，行动更无法一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只得宣告解散。

建团过程的曲折教育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恢复起来，“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办《先驱》半月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青年团恢复后，发展很快，不到六个月，全国有十七个地方建立了组织，团员五千多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等。大会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纲

领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选举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青年团是共产党团结教育青年的纽带和核心，是党的有力助手。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二十日，青年团发表宣言，表示对党关于时局问题的主张完全赞成，号召全国人民铲除封建军阀，并对“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主张进行了批判。十月，团中央号召青年恢复五四运动的精神，参加民权运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援助京汉路及各处被封工会的恢复并促进其组织的巩固”，“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十月，各地青年和学生积极投入反对曹锟贿选运动。上海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国贼曹锟僭窃大位，国人当群起攻之”等口号，并分发传单。贵州省留沪学生会发出通电，提出“取消议员资格”、“没收其财产”等惩戒“猪仔议员”的办法。杭州、芜湖的学生除集会示威外，并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的家宅。杭州的学生组织了国民讨贼军，发出杀贼的誓言。

在此期间，学生组织有了发展。五四运动后各地成立许多学生联合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湖南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决学生会的方针是：“团结学生，领导民众，谋学生本身的利益；并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政治的压迫，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筑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这是学生运动的正确方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很注意妇女工作的开展。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党支持具有进步倾向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妇女刊物《妇女声》，宣传革命思想，提倡妇女解放。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党开办平民女校。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一九二二年七月共产党的“二大”专门作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为“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二大”决定在党中央设立妇女工作部，向警予担任了第一任部长。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妇女运动得到迅速开展。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日美在华企业的增多，大批妇女走进纱厂、丝厂、烟厂，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动妇女运动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据统计，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全国女工罢工的工厂共六十多家，罢工人数共三万多，罢工次数共十八次。罢工原因大都是为了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承认工会。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上海日华纱厂女工的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取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八、九月份上海四十四家丝厂女工二万余人举行大罢工，结果失败。十一月，湖北英美烟厂男女工人三千余人举行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厂方承认工会的胜利。一九二三年，上海丝厂女工再次展开斗争，又遭失败。这几次罢工，特别是二万多名丝厂女工的大罢工，在中国劳动运动、妇女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除工人妇女运动外，当时还有女权及女子参政运动。这主要是资产阶级

《湖南学生的大觉悟》，《先驱》第十四期，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出版。

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前锋》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的运动。其基本主张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女子与男子完全平等和女子有参政权。一九二一年广东起草省宪法时，广东的女界领袖为要求妇女的参政权，于三月二十九日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有五、六百人参加。同年秋，湖南的妇女有人被选上省议员。浙江和四川的省宪法，规定妇女有投票权。一九二二年八月，北京几个高等学校学生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数月间，这两个组织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

第四节 国共合作的酝酿

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

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被西南军阀排挤出广东，护法宣告失败。这次护法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孙中山救国的决心，他表示“此后救国宗旨，决无变更”。同时他开始认识到，在构成中国最大祸患的“武人之争雄”中，“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是如何救国呢？他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恢复旧国会上面，认为“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孙中山以很大启示。他从五四运动在很短期间“收绝伦之巨果”中，体会到“结合者即强”的道理。他发表演说指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即掘掉旧官僚、武人和政客这三种“地底陈土”。他开始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并于一九一九年十月把他在一九一四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但这时的孙中山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〇年八月，爆发粤桂战争，驻闽南的粤军陈炯明部回粤逐桂，十月占领广东，把桂军逐回广西。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十一月，孙中山由上海重抵广州，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重组军政府。一九二一年四月，孙中山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积极策划北伐，但却遭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身兼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三要职，握有广东的实权。他开始时打着“保境息民”的旗号，并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密通，反对孙中山入湘北伐；接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更公然发动武装政变，派兵围攻总统府，背叛了孙中山。孙不得不避难到永丰舰上，八月到达上海。这是孙中山依靠军阀反对军阀路线的又一次失败。

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写的《致国民党员书》中，沉痛地讲道，他为民国奋斗，经过多次失败，但“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通过这次事件，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是国民党的状况怎样呢？孙中山完全了解国民党的严重弱点。他说：“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此亟需整顿和改组。

在孙中山的奋斗历史中，曾多次向帝国主义国家呼吁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因北伐感到财政困难，希望美国给予援助，但从美国那里没有得到一文贷款。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率领舰队停泊在白鹅潭，英国粤海关税务司竟以白鹅潭接近沙面租界，“恐牵涉外国兵舰”为由，要求孙中山“离粤”。这既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又是明显的援陈反孙。对此，孙中山严词拒绝。

陈炯明的叛变，并没有使孙中山丧失革命的信心，他坚信“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但是怎样“努力”呢？他不能不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从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和苏俄政府之间就有了电信联系。此后，共产

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威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成员达林等相继与孙中山举行过会晤，建议他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陈炯明事件的发生，推进了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向达林表示，他已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坚持革命民主派立场的正确方面给以充分肯定，对其幻想帝国主义帮助、几次与军阀谋妥协的错误方面给以恰当的批评，并且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同月，马林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一同来华。八月下旬，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建议。孙中山很快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时，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也多次与孙中山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答应李大钊“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便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表明了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对孙中山的友谊，也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宣言说：“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苏俄代表重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标志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宣言发表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到日本热海温泉同越飞就中苏联合反帝的具体事项进行详细商谈。

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方针的正式确定

中共“二大”在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通过了一项《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一议决案与中共“一大”做出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决议相比，是一个重要的改变。但这时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是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二大”召开前，一九二二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在荷属殖民地爪哇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在中国南方同国民党广泛接触的情况，曾提出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这个建议为中共中央所拒绝，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在“二大”召开后不久，八月下旬，当马林再次来华到达上海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杭州（西

〔苏〕达林：《中国回忆录》，第一二六页。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李大钊：《狱中自述》。

《政治周报》第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月出版。

《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湖)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全体中央委员五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马林和张太雷。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又一个重要转变。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这个决议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行。但是,它过分肯定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估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对陈独秀发生了重要影响。马林还曾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右倾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它使党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因而加快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步伐。

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发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提出:在中国进行反帝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要反对国民党“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些指示是对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补充和某些错误观点的纠正。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等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余人。大会主要议程是进一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此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是要不要加入,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会议最后肯定了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

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决议还指出:在实现国共合作和党员加入国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六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四二、四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四二、四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八——八十页。

国民党以后，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大规模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宣传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真正拥护劳动阶级的利益。必须防止国民党政治上的妥协倾向。要从工人团体中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以扩大党的组织。要建立在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的全国总工会，竭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

大会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纲党章，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议决案。会议改选了中央委员会，新选出中央委员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五人，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从而促进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迎接革命的大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但是，这次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以及革命军队问题，没有提出或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一方面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但又错误地认为：“中国处于现实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大会批评了国民党“依赖外力”等错误观念；但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注意了政权问题，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但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政权的问题。大会认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但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办法。大会批判了国民党专力军事，忽视民众运动的错误观念，认为“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但是没有注意革命军队问题，更没有提出共产党要抓军事的问题。这些都是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

“三大”的正确决定和不足之处，都对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二大”，通过了与中共“三大”相应的决议，决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

三 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

从一九二二年九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九月四日，孙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会议，随后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再次召集会议审查改进案全文，并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国民党宣言。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强调“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同时，孙中山重新指定了党本部各部部长、副部长及参议等人选，其中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任参议）等。

恰在这时，孙中山又得到重回广东的机会。由于孙中山的策动，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各部及桂军刘震寰部联合发动了向陈炯明的进攻，一九二三年一月将陈逐出广州。二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孙中山回到广州，继续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八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并有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十月，苏联政府派出的代表鲍罗庭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此后，大批苏联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协助工作。

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九人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决定来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在此期间，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派李大钊在北京进行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在广州重新登记党员，着手组织市、区党部和区分部。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之邀到达广州，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遇到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势力的反对。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邓泽如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诬蔑攻击共产党，反对改组国民党。他们指责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反帝反军阀的纲领，是使国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孙中山对邓泽如等的信件批示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没有因右派势力的反对而动摇。

第五节 新文艺的成就和文化思想上的争论

一 新文学社团的涌现和新文学主张的提出

五四运动开创了我国文学史的新时代。“五四”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新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据统计，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文艺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艺刊物五十二种。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是由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圣陶）等十二人发起的，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出版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月刊等。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学团体，没有确定的纲领，成员的文艺思想也不一致。它的发起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共同的态度。他们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该会主要代表人物沈雁冰等人，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大力倡导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文坛上的复古派、颓废派、唯美派等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沈雁冰在一九二

年以后发表了许多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文章。他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他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创造社是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的。一九二二年五月出版《创造》季刊，次年又出版《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初期的创造社成员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他们提倡灵感和天才，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文学家要“把住时代”，有意识地以文艺来表现时代。对于“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认为打破虚伪的、罪孽与丑恶充斥的、使生命窒息的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上述两种思想在创造社同时并存。他们的浪漫主义是富于反抗和叛逆精神的积极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一七五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二—四页。

郎损（沈雁冰）：《社会背景与创作》，同上，第一八二页。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同上，第一八六页。

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同上，第一九五页。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同上，第二—三页。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同上，第二—三——二—四页。

的文学新运动》，是这时期发生很大影响的重要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悲惨境遇，认为在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文学事业也“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他大声疾呼：“我们要如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打破这毒龙的魔宫”。郭沫若的文章，虽然在思想上仍属激进的民主主义，一些口号也嫌不够明确，但无疑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的前奏。

一九二三年左右，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文学的文章，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新诗人的棒喝》等文章中，批判了不问社会、脱离革命斗争、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指出文学应当成为“唤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最有效用的工具”。文学家应当：第一，必须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八股？》等文章中，强调新文学必须“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他又指出，只有具有革命的思想感情，才能写出革命的文学。做一个革命的文学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此外，《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提出文学家应该抛去“锦绣之笔”，离开“诗人之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到“煤窿里”，“黑暗的隧道中”，把工人的生活描写出来。它认为“现在还没有进煤窿的文学家”，是“文学家的耻辱”。

上述文艺主张尽管还很不成熟，但这些主张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力图引导文艺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这对于当时文学的发展和以后“革命文学”的提倡，都有深刻的影响。

二 小说、诗、戏剧的成就

这个时期的文学，不仅在理论和组织活动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文艺创作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于新时代的影响，产生了许多描写人民苦难生活、反映人民革命要求和斗争精神的优秀作品。这时期文学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的革新，白话文取得了正宗的地位，作品的语言、结构、表现方法也都有所提高。

鲁迅的小说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呐喊》收集了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所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四篇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和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们的高度成就使鲁迅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也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有名的世界文学大师之一。

在鲁迅的小说中，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阿Q正传》，是闻名世

界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典型形象。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小村镇上的流浪雇农。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他以自尊自卑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来排解被压迫的痛苦，聊以满足一下反抗报复的心理。然而这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屈辱。尽管如此，毕竟阿Q在精神上并未屈服。当革命起来时，阿Q也燃起了自发的革命热情，要求革命。但是“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最后阿Q被把总和举人老爷投入监牢，判处死刑。《阿Q正传》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面貌，反映了当时农村对立的阶级关系，反映了辛亥革命的真实情况及其失败原因。阿Q相或阿Q精神、阿Q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产物。

在这个时期，叶绍钧出版有小说集《隔膜》（一九二二年）、《火灾》（一九二三年）等。这些小说反映了中国下层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不幸遭遇和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憎恶，同时也描写了他们本身的灰暗面。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家还有郁达夫、王统照、许地山（落华生）、庐隐、鲁彦等。

白话新诗，是这个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获得显著成绩的一个领域。它冲破了多年来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为我国的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道路。

最早创作白话诗的是胡适。他于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尝试集》是我国第一部新诗集。他的新诗做了形式上的诗体解放，思想内容方面可取之处不多。

最杰出的白话新诗的创作者是郭沫若。他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诗集《女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诗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女神》充满了改造社会的磅礴的气势，充满了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叛逆反抗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热烈感情，集中地体现了诗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当然，在新旧交替的革命时期出现的《女神》，它的思想内容是复杂和矛盾的。在这里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诗人宣布他“是个无产阶级者”，他“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并在诗句中歌颂了革命领袖，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工农群众。早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冲破旧体诗的束缚，使诗歌创作获得新的生命。然而只是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现以后，才给新诗带来了冲决罗网的精神和创造历史的激情，正式宣告了新一代诗风的开始。

刘大白是最早反映工农生活的诗人。他在《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五一运动歌》、《卖布谣》、《田主来》等诗中，歌颂了“拿锤儿的”和“拿锄儿的”工人农民创造世界的功劳，描绘了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榨下的痛苦和不满。闻一多写新诗开始于一九二二年。他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当时污浊社会的愤慨，并且形式整齐、音节和谐、结构谨严。代表作有《洗衣歌》（一九二二年）等。这个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刘半农、朱自清、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

这时期的戏剧创作，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和戏剧团体与刊物的增多，也逐渐发展起来。洪深、欧阳予倩、田汉，是这时期有较大贡献的剧作家。洪深的以反对军阀内战为主题的剧本《赵阎王》（一九二二年冬），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剧中的主要人物赵阎王，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在军阀威逼而当兵以后，逐渐地被腐蚀而成了无恶不作的人。虽然剧中人物的塑造不尽成功，剧情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但是它暴露了军阀的罪恶。欧阳予倩的《泼妇》（一九二二年），大胆歌颂了一个被封建势力称之为“泼妇”的妇女愤

而离家的反抗精神。田汉的《获虎之夜》（一九二四年初），是他早期创作的较好作品。剧本通过由于贫富悬殊而造成的一对青年人的恋爱悲剧，表现了阶级的对立。

三 “整理国故”、考辨古史和“新红学”

五四运动后，胡适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接连发表《井田辨》、《论国故学》等文章，在学术上打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号，并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办了提倡整理国故的《读书杂志》、《国学季刊》。一时间，研究国故的风气盛行起来。

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考据的方法从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去整理古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有政治目的的。首先，是引导青年躲进“国故”的蜗庐里，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他高唱“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就是要把青年完全引进故纸堆中。第二，是借整理国故来宣传他的实用主义。胡适说，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学理”，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就是要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实用主义的“学理”，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后来他曾毫不掩饰地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学术界发表的整理国故的文章，最多的是古史辨伪。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汇印成《古史辨》。疑古辨伪是当时史学界盛行的学术风气。疑古的口号本来是钱玄同所积极提倡的。这种疑古精神具有反封建的积极一面。它怀疑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儒家经典和封建道统所依据的古史，这在当时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方面。古史辨派考证古史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历史观是错误的，这就使疑古精神和辨伪工作走上了歧途。胡适否定《诗经》以外的古文献，否定东周以上关于古史的有关记载与传说。顾颉刚在研究古史中提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说尧、舜、禹等人和他们的历史本来都是没有的，西周以后的人一步一步地造出这些人他们的历史来，越说越周密。所以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照这样，流传下来的传说就没有一件能保存原来的真相，这必然要导向历史抹煞论。顾颉刚研究古史的结论之一是，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一条爬虫。“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精密

胡适：《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卷四。

胡适：《介绍我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

《古史辨》第一册，第六三页。

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

胡适派整理国故的反动政治作用，受到了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抨击。一九二四年一月，鲁迅在一篇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中，揭露了胡适用整理国故抵制革命，引导青年脱离现实的谬误。指出：“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指出：“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宣传：“你们快来学我！快来学我！””他还指出，这种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也以“五四”为界而有了新旧之分。

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考证小说，在一九二一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随后俞平伯写了一本《红楼梦辨》。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新红学”这一名词。此后人们便把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称作“新红学”。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索隐派旧红学的穿凿附会。他认为“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经过考证，胡适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著的。著书的年代大概在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去。《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部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是由高鹗补写的。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说，新红学比旧红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新红学也暴露了它的唯心论的性质。胡适断定《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这就抹煞了这部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内容，否定了它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和书中主要人物的典型性。

四 西方教育学的输入和教育改革

五四运动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风行一时，影响很大。杜威在中国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宣扬他的教育思想。

杜威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他认为，平民主义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的趋向怎样，教育的趋向也要怎样，共和的国家是实行平民主义的国家，

同上，第三五页。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三三二——三三四页。

必须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要“每个人受教育”，“把教育普及到大多数平民身上去”。杜威如此提倡平民主义教育，是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调和阶级矛盾，抵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他说：“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风起云涌，这是什么缘故呢？寻根究底，就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在增加工资，也不在减短作工时间，实在普及平民教育”。由此他联系到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如果受高等教育的人知道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采取措施，使将来工人有发展心思、知识的机会，“也许可以免掉现在欧美扰乱不安的现状。”

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认为儿童、社会、学校和学科是教育的三个要点。儿童，是教育的根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学校和学科，是儿童与社会中间一条过渡的桥。教育者要根据社会需要，选择几种主要的社会生活，安排在学校里，“使学生的生活就是最精采的社会生活；使儿童做这种活动时，就可以不知不觉的预备将来了解应付社会国家的种种需要，种种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就是要求儿童从自身的社会活动中学，利用儿童的本能和生活做基础，通过游戏、有组织的运动、演戏和“工作”，输入有用的知识，使学生学的东西与人生日用联贯起来。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只能是训练学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他反对贵族教育，提倡平民主义教育；反对“养成知识贵族”、“养成服从古训”的封建旧式教育，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个性的教育”；提倡学生自治。这些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学生们热烈地讨论教育上的“自动主义”或“自律辅导主义”。他们有人主张必须“扫除学生之束缚”，提倡“自动教育”，“将学校一切应有之规则，一任学生自己维持之”。有人认为教育上的干涉主义和绝对放任主义都有弊病，应当提倡“自律辅导主义”。五四运动过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了学监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这一天，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教育家杜威，都来参加。蔡元培在讲话中说：“成立这个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关系是重大的很”。学生的自治是个先导，由学生传给国民，“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以后各校都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对后来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五四运动使妇女得到很大的解放。“五四”后，女子应和男子享有同样受教育权的呼声很高。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很多人要求大学“开放女禁”。

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当代名人新演讲集》，第三二、三三页，上海广文书局一九二二年三月再版。

《杜威五大讲演》（上），《教育哲学》，第一一二页。

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当代名人新演讲集》，第一七页。

《自动教育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六十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自律辅导主义与中学校训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六十一号，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出版。

新潮社编辑《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下册，第四四三、四四四页。

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破例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等也先后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以后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也开始招女生。一九二二年颁布的新学制，取消了男女中学之间的差别。至此，在教育制度上，妇女争得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一九二一年十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一个仿效美国的《学制系统草案》。一九二二年九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又提出一个《学校系统改革案》。参酌两案，北京政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这个改革案规定了中国的学制：小学六年，其中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中学一般为六年，初高级各三年。大学四至六年，专门学校三年以上，大学可附设专修科。另外还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当时美国教育家孟禄到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直接参与了这次学制改革。此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即由抄袭日本改为仿效美国。

五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

自《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以后，又经过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此在思想界公开反对科学的人是很少了。在“五四”以后，梁启超发出了“科学破产”的叫喊。他说：唯物派的哲学家，崇尚科学，“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自由，使人对善恶不负责任，因而“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造成军阀财阀的争夺，结果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受到极大的祸害。这说明了科学的破产。他认为，这科学的破产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生观的破产。人生观受“必然法则”支配的思想，造成了思想界的危机。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勱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他并没有提出他所主张的人生观，而是集中反对科学法则支配人生观，认为只能用玄学解释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总之，人生观“无客观标准”，“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认为科学可以说明自然现象，而人类的精神现象则科学管不着。这是反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思想，是“五四”精神的反动。

四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勱的《人生观》。此后，除了张丁二人反复争论以外，还有不少人参加辩论。这就是人生观问题的论战，或叫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十一、十二月，陈独秀、胡适为讨论集《科学与人生观》作了序，同时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这场讨论基本结束。

丁文江说，玄学鬼附在张君勱身上，要打这个玄学鬼。张君勱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丁则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伦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丁还认为科学方法不但是求真理所必需，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他引胡适在一篇文章中的话作他的结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在争论中吴稚晖提出了“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他说：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在“宇宙大剧场”上演戏。如此看人生，便是人生观。明白地说，他的人生观包括：“（甲）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乙）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丙）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他把前二者又叫做“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依他的人生观看来，“食的性，色的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性，并没有什么善恶”。“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不见得同道德有多少的冲突”。吴稚晖是一个无耻的文人和政客，惯于用玩世的庸俗的态度和文字，谈论重大的严肃的问题。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宣扬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人生观。该文虽曾轰动一时，但对这场讨论只有消极作用。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 序》中自称为“信仰科学的人”。他提出了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把它说成“科学的人生观”或“新人生观”。“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这种人生观认为：在自然主义的宇宙里，人是极其渺小的。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生存竞争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但他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驭天行。因果律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生存竞争的观念也不见得使他成为一个冷酷的畜生。在这个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但是在实用主义者胡适看来，人生观是一个假设，这就否认了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当然更否定了它的阶级性。他更不能正确解释自然法则和人的行为的相互关系。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 序》中说：时代不同人生观也就不同。人生观是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玄学可以说明的。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的客观因果所支配，不是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他的结论是：“只有客观的物质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在讨论中陈独秀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他抓住了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同，自然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而在人类社会里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抱有一定目的的人。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人的意志若不根据因果律，则没有自由。但是，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受必然规律的支配，并不是说人类是纯消极的因素，“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瞿秋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确说明了人生观的基本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玄学派的张君勱公开主张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否认精神现象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科学派”的胡适、丁文江坚持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把人生观看做由知识和经验而得出的一种“假设”。他们的看法，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不能正确地说明人生观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场争论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科学思想的深入发展。这场争论表明，科学不仅能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还要求说明人类精神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玄学的

无用和实用主义的无能为力，却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第二编 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章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掀起

第一节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和革命运动开始高涨

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六十五人，一部分是由孙中山指派的，一部分是由各地党员推举产生的。其中有廖仲恺、邓泽如、冯自由、谭延闿、戴传贤（季陶）、于右任、孙科、何香凝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守常（大钊）、毛泽东、林祖涵（伯渠）、谭平山、罗迈（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也是大会代表，但没有出席。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有人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意在反对共产党员的“跨党”。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辩驳，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不能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脱离共产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以团体加入的。共产党员的“跨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廖仲恺等支持李大钊的发言。会议否决了国民党员不得跨党的意见。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庭起草的。

宣言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它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指出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宣言的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这部分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之增添了新的内容。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国家当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要“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指出：国民党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要“以全力助其开展”。

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和对内政策十

五条。其中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政府所借外债；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均权主义，各省自定宪法、自举省长，县为自治单位，实行不以资产为标准的普通选举制，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制定劳工法，帮助女权的发展等。

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就宣言的宗旨作了演说。他总结了国民党过去“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使革命“不免于失败”的教训，说明此次宣言的通过，“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联合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当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和新三民主义的政纲还是有原则区别的，特别是二者的指导思想即宇宙观和对领导权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这次大会制定了新的国民党章程。这个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即：全国设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设省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各区设区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为基层组织，设区分部党员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党章关于国民党的总理作了专章规定。它规定孙中山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不要经过选举；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些规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和一般欧美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也不相同。

经孙中山提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胡汉民、汪兆铭（精卫）、廖仲恺、戴传贤、林森、邹鲁、谭延闿、于右任、叶楚伦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四十一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十名。选出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敬恒（稚晖）等五人，候补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等五人。会后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戴传贤三人。确定各部部长，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后更换数人），宣传部长先后为戴传贤和汪兆铭，工人部长廖仲恺，妇女部长先后为廖冰筠和何香凝，青年部长邹鲁，海外部长林森。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仍有不少地主买办分子留在党内。国共合作的建立，对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一大”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一页。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三三五页。

四川等五处设立中央执行部，分别领导各该地区的党务工作。同时向各省区派出筹备专员，负责筹组各省区党部。到一九二六年，全国建立正式国民党省党部十二处，临时省党部九处，特别市党部四处。全国除云南、新疆、贵州等少数省份外，绝大部分省区都有了国民党组织。在一九二六年初，党员人数（包括海外）约有五十万，正式登记在册的有二十万。

二 孙中山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有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孙中山在他的晚年，对三民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孙中山开始讲演三民主义。此后每周一次，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讲完四讲后，因准备北伐而停顿。同年，这些讲演整理成书，在广州和上海出版。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列举了帝国主义用“政治力”和“经济力”侵略中国的事实，指出中国已处在比“完全殖民地”还要低一级的“次殖民地”的地位，并且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召唤人们认清这种危险，振起民族精神，团结起“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他认为要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强盛地位，必须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学习“欧美的长处”，即欧美的科学，如此“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孙中山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孙中山主张对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就是中国将来强盛了，也仍然要“扶倾济弱”，“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

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贯穿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联合社会主义苏联、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光辉思想。但他对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道德，无批判地作为优秀遗产加以赞扬，则是不正确的。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民权主义讲演和《五权宪法》等著作中，对民权主义作了完整的说明。其中包括自由平等观和“权能分开”、“直接民权”、“五权宪法”、“革命程序”等一整套理论和具体方案。

孙中山把法国革命时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同他的三民主义相对照，认为法国的自由口号，大体上和他的民族主义相同（但不是争个人自由，而是争国家自由）；平等口号和民权主义相同；博爱口号和民生主义相通。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虽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但“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流弊甚多。因此中国“不可完全仿效欧美”，而要采用“一种新方法”。什么新方法呢？就是“把权与能来分开”。“权”即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内”，使人民“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人民权。“能”即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权与能分开，就可以使政府既成为“万能政府”，又“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一个基本点。政权和治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孙中山规定：人民应该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即选举和罢免官吏，制订和修改法律的权利。“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中央政权要依据“五权宪法”的原则组织起

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五权分立，互相制约。孙中山还规定，革命建国要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依次进行。

孙中山所拟定的民权方案，充满着民主主义精神。他的出发点是避免专制独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流弊，真正做到“主权在民”。但是他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他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部分，甚至把全国四万万人都说成是“庸愚的”阿斗。所以，国家大权应该交给有“能”的人去管理。孙中山实际上主张的是“先知先觉”治国论。“革命程序”中要有一个“训政时期”，就是以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做基础的。孙中山民权思想中的这种消极方面，后来被蒋介石集团加以发挥利用。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这是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在讲演中，孙中山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所以有这种调和，又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因此，他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企图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寻求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成份；但他所说的“民生问题”是抽象的，是没有社会内容的，他实际是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为人们求生存的欲望，同时他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把它看作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所以他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孙中山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并一再说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因为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而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他断言马克思的学说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以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正是拿这些观点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工具。

孙中山在讲演中发展了他早期的民生主义思想，把解决民生问题同解除帝国主义压迫联系起来，而且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说：“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保护民族工业。“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

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的同时，又写定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一大”宣言、《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讲演，构成了孙中山政治学说的完整体系。

三 革命武装的建立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平定商团暴乱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般简称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三月改称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

军校第一期学生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入学，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至一九二六年春，共招收学生五期，总计七千四百人。

军校设总理(孙中山兼任)、校长和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后增设教育长、军法处、参谋部。

党代表和政治部是学习苏联红军的制度而设立的，是使军校成为新型军事学校的最重要保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是第一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等都曾任军校教官。共产党选派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如第一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就有五、六十人，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后任教育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依靠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学校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等。共产党利用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

但是，军校的许多实权掌握在蒋介石一派人手里。蒋介石本人因早年学过军事，又装成“总理的忠实信徒”，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担任了校长职务。何应钦任总教官，王柏龄任教授部主任。蒋介石口头上虽然经常挂着革命词句，本质上却在对军校极力施行封建控制。他利用军校培养了一批亲信骨干，并用他们控制军队，成为他以后叛变革命的主要资本。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月，以军校毕业的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教导团。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国民党代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成立第三团，并扩充成师。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是当时广东各军的中坚力量。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经过孙中山同意，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一个独立团。全团约两千人，叶挺为团长。团设共产党支部，营设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黄埔军校成立后，滇军设干部学校，湘军设讲武堂，粤军设讲习所，桂军设军官学校，为改造旧的军队做了一些工作。

到一九二四年，二七惨案后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摧残而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

安源工会由于工作基础好，善于斗争，没有受到摧残。安源工人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五一节，各举行了万人示威游行。在这期间，工人工资有了提高，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因此，当时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军阀统治区的各铁路，如京汉路各主要车站、粤汉、正太、株萍、京奉等路和唐山站，只能保存秘密工会，获得小的发展。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三五一页。

在一九二四年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秘密地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国共合作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用国民党的名义，在军阀统治区上海的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在杨树浦成立“工人进德会”，在小沙渡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在广东，工会是合法的。一九二四年五月，广州工人召开代表会，决定建立工团军。七月，党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的罢工。这是一次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自由的政治罢工。在广州革命政权支持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轰动了广东和香港，大大推动了这些地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月，发生了北京政变。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工人运动的压迫比较放松。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很快恢复了铁路工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二月二七惨案两周年纪念日，召开了有十二路代表到会的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胶济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北京、武汉、广东、唐山、沈阳等地连续爆发了许多次罢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便利了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四年六月底，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农讲所共举办五届。五届主任分别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农讲所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和廖仲恺曾到所讲演。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其中三分之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三分之二回原籍，从事各地的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五年一年中，广东省三十七县有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广东省举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几个月之内，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许许多个乡农民协会。年底，一批农讲所学员回湖南后，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在这一年里，江西、广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都开始有了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平定了商团叛乱。

广东商团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原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副团长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这支反动武装得到在广州的军阀的支持。英帝国主义鼓动陈廉伯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商团军开枪射击游行群众，当场打死打伤二、三十人。接着，他们张贴“打倒孙政府”的布告，胁迫商人罢市，准备与军阀陈炯明配合，夺取广州的政权。英帝国主义开来军舰为商团助威。商团叛乱使广州的革命政权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十月十四日，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决定对商团实行镇压。黄埔学生军、一部分革命军和工团军，一起向商团军进攻。十五日，商团军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四 中俄协定的签订和废除 不平等条约运动

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国共合作成立后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

重要表现。它发端于中苏协定的签订。

一九二三年九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申明苏联政府仍将以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二年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愿意实行“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经过谈判，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时签订《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协定规定：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两国政府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苏联政府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划定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中东路除商业性质以外的一切事务概由中国政府管理，铁路业务由两国共同经营，中国方面将出资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外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协定。

中俄协定的签订，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上海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在庆祝中俄邦交恢复的通电中说：“我们当此中俄邦交恢复之时，一面固然要一致的庆祝中俄万岁；一面也要一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之条约”。这时，外国使团无视中国主权，拒绝交出中俄复交前被他们“代管”的俄国使馆，其根据是《辛丑条约》中关于使馆区“独由使馆管理”的规定。这件事使中国人民更深地感到不平等条约之害。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由此兴起。

六月末，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人类永久和平之关键安在？》一文，提出“和约即为永久平和之障碍，欲求世界之永久平和，非推翻一切不平之和约不可。……如东方之《辛丑和约》及中日之二十一条，西方之《凡尔赛和约》等等，即系人类永久平和之公敌，可作全人类向上运动之目标”。这篇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号召的作用。

七月十三日，参众两院、北京学生联合会、华侨实业协进会等五十余团体的代表及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开会，决定成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这个联盟提出的任务是：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扑灭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但同时这个联盟又声明：它“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以外，其余任何事务，概不与闻。”七月十八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废约宣言，主张“举凡对我一切不平等待遇，彻底撤销，另本相互平等的原则，重新构成国际关系，使我民族亦得享受人类应有之权利”。同时他们又表示要领导国民“以和平友谊的手段”，进行“此种合理合法的运动”。

此后，上海、武汉、湖南、山东、天津各地各界人士，纷纷组织反帝同盟，展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九月三日至九日，由反帝大同盟发起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帝宣传。

这次运动中，有不少上层分子参加，这反映了反帝斗争的广泛性。但是这些上层分子在运动中也表现了反帝的软弱性和只反帝不反封建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努力把这次运动引导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轨道上来。共产党人指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只反对一个而不反对另一个，是

错误的。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废约，必百般顽抗，必指使他们的傀儡中国军阀“摧残对外运动”。因此“民族独立运动不是向列强和平请愿可以成功的”。号召“被压迫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商人、学生，快快起来作举国一致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始终要到达驱逐任何帝国主义于中国领土之外”。

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高潮中，各地群众还发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以教育和教会为工具对中国进行侵略。

五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是江浙战争。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并将其势力伸张到长江流域。曹錕的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孙中山率先通电全国宣布讨曹。同时，孙中山又同奉系张作霖、皖系浙督卢永祥相联系，结成反直的三角同盟。迷恋于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企图以孙传芳从福建进攻广东，并以陈炯明作内应，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以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自己则秣马厉兵，直接对付张作霖。这时，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卢不但据有浙江，而且控制着上海（卢的部属何丰林继卢之后任淞沪护军使）。齐身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久想夺取上海，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苏军向浙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张作霖、段祺瑞通电援卢，张并派兵入关。九月中旬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卢永祥不得不放弃浙江转赴上海，并于十月十二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夏超（原卢永祥部属，江浙战争中投孙）被任命为浙江省长，齐燮元把势力扩张到上海。

江浙战争开始后十余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把奉军编为六个军，于九月十五日向山海关和热河进发。十七日，吴佩孚由洛阳赶往北京，十八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直奉两军在朝阳和山海关等地交战。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奋力作战，吴佩孚也赶往滦州亲自督战。

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

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战后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冯督豫不到半年，就被调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所部第十一师移驻北京南苑。同时，孙中山对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工作。这样，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除直系外部的反直三角同盟外，在直系内部又有冯玉祥、胡景翼（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孙岳（十五混成旅长）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击奉军；胡景翼被任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被任为北京警备副司令。

《向导》第七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向导》第七十六期，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向导》第八十期，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冯受命后故意行动迟缓，并与张作霖、段祺瑞暗中联系。十月二十二日夜，冯军鹿钟麟部返抵北京，包围了总统府，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同时，孙岳部由冀南开来南苑，胡景翼部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二十三日冯胡孙通电呼吁“和平”。二十四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冯军监禁了总统曹锟。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对全国特别是北方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

政变后，冯玉祥等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十月二十六日，冯胡孙发出拥护段祺瑞的电报。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政变的消息后，抽兵回救北京。十月底、十一月初，奉军大败直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冯军亦在杨村、北仓一带打败吴军。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三日，吴佩孚率残军二千余人由塘沽乘舰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打了近五十天，至此结束。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十一月五日，摄政内阁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行政府职权。二十四日，段在就职宣言中声称“外崇国信”，即执行媚外亲帝的外交政策，因而段政府立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西方帝国主义也表示愿意帮助它解决困难。在这个政府中，国民军、奉军、皖系势力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明争暗斗。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有第二次江浙战争的爆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张宗昌带领奉军进到浦口、南京一带。齐表面服从命令，暗中加紧备战。一九二五年一月，齐燮元、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派来上海的淞沪护军使张允明部，获得胜利。接着又与南下奉军交战于无锡附近。但孙传芳忽将所部撤回，齐军失败。一月二十八日齐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

六 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于十月二十五日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二十七日，孙分别致电冯、段，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十一月十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先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代表等组成的预备会议。这里所说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议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主张。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广州。为了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孙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十二月四日抵天津，三十一日至北京。

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次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决定北上，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九期上发表文章，表示了这种态度。他们认为“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

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甚至断言，孙中山“若上午入北京”，“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但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策略，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段祺瑞提议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按：指1923年6月曹锟逼使黎元洪下台出京事件）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对这个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八小时工作制，增加海关进口税等。许多共产党员，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在上海的恽代英、向警予，在天津的邓颖超，在江西的方志敏，都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国民会议运动。

在国共两党大力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济南、南京、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上海、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市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由一百四十三个团体组成。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等，都号召工人积极投入运动。上海、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军阀政府极力用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善后会议由四种人员组成：一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为“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为“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根据这样的规定和段政府所发出的邀请名单，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官僚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且段政府还规定：善后会议是“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统一”。这同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它的目的是继续维护军阀的反动统治。善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开场，四月二十一日闭幕。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反对善后会议。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团结已派军阀”“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为了同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抗，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代表成份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共二百余人。他们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讨论了不平等条约及外人特权、外国驻兵、军阀军队与内乱、人民自由、工人、农民、妇女等重大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在国际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

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中，一再申述了打倒军阀的主张。这是一次空前的人民集会。大会各项决议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具体化。这些决议当然不会为军阀政府所采纳。但这次大会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当国民会议代表大会进行的时候，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些都是他的丰功伟绩。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加倍努力，一方面继续进行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清除横在革命面前的障碍。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第二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

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从南到北不断高涨的一年。工农群众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这一切表明中国革命正处在巨大高涨的前夜。为了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谭平山、项英、彭述之等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和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议决案，通过了党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宣言。

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中国正“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的时期”。在这种军阀势力动摇和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加剧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运动已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的开始。同时，随着国民运动的高涨，“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议决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议决案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议决案阐明了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批评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左”倾错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这种错误是不知道无产阶级要能联合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才能免得处在孤立地位。当时右倾错误“更危险”“更普遍”。这种错误是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全力做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既然作国民运动，就不便鼓动阶级斗争；应当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应当助长左右派的分裂。这种错误就在于：参加了民族运动就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阶级革命的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就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不易挽救的大害。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内扩大左派，指责右派的反革命事实，批评中派的游移态度。

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在民族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党应该特别注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工人阶级必须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可使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应当参加进去，取得指导权。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加强政治教育，加紧发展党的组织。

关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批评了农民“不能成一个革命的要素”的观点，指出农民问题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地教育和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党要引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拒交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乡村自治、成立农民自卫军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九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五人。大会后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李大钊、谭平山等分驻各地。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

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规定了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指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决定扩大党的组织和加强宣传工作。这次大会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比“三大”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次大会推动了党的工作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中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准备。

二 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加强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全国革命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以“养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愤而罢工。罢工的工厂很快发展到二十二个，罢工工人四万余人。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邓中夏指导这次罢工，并命令上海的百余名党员全部投入斗争。罢工取得部分胜利。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一千人发展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五月上旬，由于日本资本家决定取缔工会，工人又连续发动罢工。在青岛，四月间日本纱厂一万多工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取得一定的胜利。五月二十五日，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又举行第二次大罢工。上海、青岛的罢工斗争是五卅运动的序幕。

在五卅革命高潮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多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同时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联合会议，一致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决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等二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后执委会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加强了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革命运动。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日本纱厂二万多工人立即罢工。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募捐，救济死难工人家属。帝国主义者竟野蛮地逮捕学生，妄加“扰乱治安”的罪名，准备于五月三十日审讯。帝国主义还决定于六月二日实行“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等“四提案”，以进行威胁。五月二十八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的中国工人八人，重伤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

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发表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反对“四提案”的讲演。下午，帝国主义巡捕大肆捕人。到十五时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押学生一百多人。这时聚集在捕房外的万余群众，异常激愤，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灭绝人性的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打死十三人，打伤几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三十一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总工会宣布于六月一日实行总同盟罢工。次日罢工实现，到十八日罢工人数达二十余万。自六月一日起，五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绝大部分商人举行了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半数以上实行罢岗。七日，党通过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小商人）等，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十一日，在该会的主持下，举行了二十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永远撤退驻华之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惩凶，赔偿，撤销“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这些交涉条件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精神和人民革命外交的气魄。

上海工人的总罢工，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上海租界区域内，电车停驶，电灯失明，电话无人接线，工厂停工，轮船无法行驶，帝国主义报纸被迫停刊。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日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九次枪杀中国人民，杀死六十余人，重伤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帝国主义的屠杀所吓倒，继续进行英勇斗争。帝国主义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了欺骗分化政策。特别是用威胁利诱的办法使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虞洽卿为了左右这次运动，组织了所谓“五卅委员会”。他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修改为十三项，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帝国主义一方面提出进行“司法调查”和召开“关税会议”来诱惑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停止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提出“友谊协商”、“缩小范围”，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于六月二

十三日开市。民族资产阶级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接受了上述的意见。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

资产阶级停止罢市不久，因暑假到来，学生纷纷离校。上海学生联合会力量大为减弱。这时工人阶级孤立了。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争得一定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的政治要求，决定改总罢工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策略。八、九月，罢工工人先后复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革命风暴迅速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六月二日，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及工人、农民、军队等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大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十七日，广东省工农商学兵各界一百二十余团体召开援助沪案代表会，议决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并议决了援助沪案办法。六月三日，北京百余学校共五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受阻，学生愤极，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后齐赴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请工界罢工、商界罢市，发起组织北京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实行经济绝交以及向驻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等。六月十四日，长辛店五千工人在天安门开会，会后游行至执政府及外交部请愿，要求惩办沪案祸首、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各界又在天安门举行追悼被害同胞大会，参加团体达四百余个，三十余万人，人们手执小旗，臂缠黑纱，沿途高呼口号，市民和之，极为悲壮。六月三日，南京各界开市民外交大会，反对上海西捕惨杀同胞，到三万余人，各校一致罢课，游行示威，继以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吁请国人“努力奋起，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四日，南京各界两万余人继续游行，并沿途分组演讲，听者多为之泣下，全城各通衢僻巷遍贴传单及惨案图说，观者莫不悲忿。同日，汉口五十余校学生二万二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上海西捕枪杀我国同胞。六月五日，天津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及各团体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演说并散发传单，唤起国人一致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六月十四日，天津开市民大会，追悼五卅被害同胞，到会十余万人。除上述各地之外，其它如杭州、长沙、郑州、济南、太原、徐州、西安、成都、苏州、扬州、无锡、嘉兴、南通、镇江、绍兴、宁波、温州、芜湖、安庆、福州、厦门、汕头、开封、洛阳、九江、南昌、青岛、唐山、张家口等大中小城市的人民群众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罢课、罢市。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工人都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五卅运动是规模空前的反帝运动，经过这次斗争中国人民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随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做了总结：第一，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一支有力军队，是世界革命的一支有力军队；第二，对于帝国主义的凶恶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第三，在工人阶级起而参加和领导反帝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因阶级利益会离开统一战线；第四，农民是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广东农民的表现是显然的事实）；第五，在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只有苏联和世界的工人阶级。

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大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

程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这次运动把一九二四年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是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三 省港罢工

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发生的罢工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

这次罢工是为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帝斗争，为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地举行的。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派苏兆征、邓中夏等到香港发动罢工。六月十九日，首先由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罢工，继之洋务、装卸、煤炭、机器、船坞等工人加入罢工。罢工工人发展向帝国主义展开决战的宣言，表示坚决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宣言中提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条件；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和居住自由。

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了罢工。二十三日，广州的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等十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帝国主义竟开枪扫射示威的群众，当场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造成了沙基惨案。这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香港罢工工人激增到二十五万，并有十三万人陆续回广州。

共产党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具有政权性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纠察队协同广大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厉行抵制英货。这些革命措施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使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封锁香港期间，省港罢工委员会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接来广州”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使广东商人保持中立，而且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集中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由于实行了这个政策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省港罢工得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才宣告结束。

这次大罢工是世界无产阶级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成功的范例之一。这次大罢工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估计的：“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可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见加厚。”

四 革命势力统一广东 国民政府的成立

广东革命政府在镇压了商团叛乱后，得到初步巩固。但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陈炯明及滇桂军阀等反动势力，时刻企图推翻这个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还需要用大力去完成。

陈炯明自一九二二年冬退据东江一带以后，一直和广东政府相对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他依仗英帝国主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又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相勾结，妄图推倒广东革命政府，恢复他在广东的统治。

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第一次东征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初至三月下旬进行。主力是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军校第二期学生和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三千人和粤军许崇智部，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指导学生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参与东征的领导。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东征中起了骨干作用。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成为全军的榜样。海陆丰农民在彭湃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带路和运输等工作。在东江农民的支援下，革命军勇猛前进，不到两个月，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三万多人，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陈军退到江西和闽南。

当时，广东政府所属的滇、桂、湘、粤各军，都是旧军阀的部队。其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是打着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暗藏在广东内部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一次东征时，本以杨希闵部为左路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他们暗中勾结陈炯明，按兵不动，让担任右路军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孤军作战，欲陷革命军于绝境。五月，杨刘在香港与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陈炯明等的代表商讨了联合进攻革命的计划。杨从香港返回广州后，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占领了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地。广州局势陷入严重危机。面对杨刘的叛乱，胡汉民、汪精卫等企图妥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主张讨伐。广州的工人群众也坚决表示以全力为革命政府作后盾。六月六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军。广九、粤汉各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拒绝为叛军运兵运械。在广州工人和广州市郊农民的积极配合下，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等于六月十二日向广州附近的滇桂军同时发动攻击，全歼滇桂军两万余人，迅速平定了叛乱，为广东革命政府清除了一大祸患。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的胜利，以及省港大罢工的举行，大大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其唯一职责即在履行先大元帅遗嘱；当前任务是着手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七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八月，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新练的军队加入一部分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谭延闿所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滇军为第三军；在江西的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随后，李福林所部福军编为第五军；程潜所部援鄂军、吴铁城部一个师和一些零星部队合编为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各军中设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由于当时共产党对直接掌握政权和军队缺乏必要的认识，既没有派党员去参加政府，也没有去争取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一些国民党右派和两面投机人物却取得了政府和军队的很大权力。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

进攻广州。与此同时，粤南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于十月一日开始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是蒋介石。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十月十四日攻克惠州，歼灭了敌军主力。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有力配合下，十一月初，东征军完全收复了东江，全歼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到一九二六年二月，歼灭了海南岛上的邓军残部。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军所统一。三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了统一。

随着军事的统一，国民政府开始进行行政和财政的整顿，统一行政管理，统一全省财政收支。广东全省的财政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不仅为革命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更重要的是，革命的胜利增强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这些就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五 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把握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

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和十二月先后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看法。陈独秀认为：“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做三部分：一是

“革命的资产阶级”，如“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或叫“官僚的资产阶级”，他们“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小工商业家”，他们“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又把资产阶级分做“官僚资产阶级”和“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两部分。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认为它只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陈独秀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他所说的“知识阶级”的状况，认为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国民革命中起着“连锁”各阶级的作用，具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基于上述的分析，陈独秀得出结论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

主革命”。“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陈独秀的上述看法有的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根本不注意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陈独秀上述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提出的当时，就在党内受到反对和抵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曾提出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问题，并就这个问题与陈独秀等进行过争论。“三大”进行期间，六月十五日，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这篇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而资产阶级则“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九月，瞿秋白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又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因此，工人阶级“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以上认识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作用问题的最早阐述。以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连续发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等文章，提出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他说：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的地位，……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他批评了“许多社会运动家”在“二七”惨案后对工人力量和工人运动丧失信心的右倾思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邓又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以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批评了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的观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他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分析了各阶级的状况得出结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虽然邓中夏的文章也有片面性，他不知道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估计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的革命的一面，因而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但从共产党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缺点不是主要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上，有巨大的进步。这次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发动农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议决案指出：农民“天然地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发动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四大”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工业资

产阶级两部分，认为前者“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后者也“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

“四大”以后，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瞿秋白、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后都有论述各阶级的文章发表，其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重要的一篇。

毛泽东的文章首先提出了正确区分敌友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就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细致的分析。

毛泽东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抱“矛盾的态度”。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他们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种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把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即右翼、中间、左翼三派，认为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革命高潮到来时，三部分人都可参加或附和革命。毛泽东指出：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其中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人员集中，经济地位低下，“特别能战斗”，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乡村雇农，在农民运动中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中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出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 张冯吴孙各派势力的演变 反奉倒段斗争和三一八惨案

一 吴佩孚再起 孙传芳控制东南五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吴佩孚兵败南下。十一月中到达汉口后，他以直系各省军阀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组织护宪军政府，由这个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但直系各将领并不赞成吴的这个主张，因此所谓护宪军政府并未组织起来。一九二五年内，吴佩孚逐渐控制了湖北，并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汉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立为总司令。他在武汉搜刮财富，招兵买马，并取得若干军阀的支持，又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吴佩孚的“讨贼”本意是要联奉反冯反段，但握有实力的直系将领孙传芳、萧耀南等则主张反奉联冯拥段，吴只得把“讨贼”的矛头首先指向奉张。

在吴佩孚组织十四省讨贼联军的同时，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源源开往上海，这引起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和直系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并且促成了孙传芳与冯玉祥的联合。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十六日孙军占领上海，十九日占领南京，二十三日占领蚌埠，十一月八日占领徐州。奉军退至山东境内。孙传芳任命了苏、浙、闽、皖、赣五省的文武官员。这五省本列名于吴佩孚十四省联军之内，至此已为孙传芳所控制。孙也不再听命于吴，而独树一帜了。

二 郭松龄的倒戈和失败 吴张的结合

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奉军精锐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战后郭受张委托组织第三方面军，任第十军军长，并在张不在时可全权指挥整个第三方面军。奉军内部原存在新老两派的对立，新派中又分土洋两派。出身于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土派）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洋派）矛盾甚深。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对张作霖派奉军大举入关抢夺地盘，积极准备进攻国民军，十分不满。他曾提出罢兵息争，退兵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建议，未被张作霖采纳。又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等皆得一省地盘，而在战争中出力甚大的郭松龄，却一无所得。于是郭决心推倒张作霖，清除杨宇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郭松龄与冯玉祥逐渐结合起来，十一月订立郭冯密约。再加李景林，形成反对张作霖的“三角同盟”。

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松龄宣布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查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二十五日，郭率所部七万余人由滦州向山海关进发。二十七日占领山海关。十二月六日攻占锦州。奉军全线溃败。十二月二十日郭军占领新民，只距沈阳一百余华里。这时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李景林的中途变卦重新归张，郭军最后遭到了失败。十二月下旬经巨流河一战，郭军大败。郭本人被杀。

郭松龄事件后，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冯玉祥国民军在郭松龄举兵后进占热河，同时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关援郭的

要求，李不允。冯军继续进兵，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攻占天津。李军退往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冯玉祥有意联吴制奉，但吴佩孚不忘旧仇，拒绝联合。郭松龄失败后，吴口中的“贼”便由张作霖转为冯玉祥。他打电报给张作霖，表示愿与张联合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初，张复电表示谅解。于是形成奉直两系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形势。冯玉祥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下野，随后把军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去考察。吴张共同决定：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指西北）；奉张助吴军饷二百万元；北京政局将来由吴主持。接着，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动了进攻。

三 反奉倒段斗争和“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与张作霖结合，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向帝国主义屈辱妥协，同全国人民的矛盾极其尖锐。

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承认了争执几年的金法郎案，答应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对法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的办法，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金法郎案遭到全国一致反对。

一九二五年十月爆发的孙传芳与奉系的战争，是军阀间的混战。但是反奉却是全国的普遍要求。中国共产党决定趁机将反奉倒段斗争推向高潮。十月二十日，共产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全国爱国的民众“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宣言提出反奉战争的目的是“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也发表号召民众参加反奉战争的《对时局宣言》。

十月二十六日，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缓和“五卅”以来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派代表参加了由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允许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段祺瑞政府也根本无意力争关税自主，只是希望提高一点税率，以减轻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会议，掀起了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十一月十日，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在北京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筹备会组织了示威运动，电令段祺瑞“下野出京”。二十二日，北京各界举行关税自主民众大会，到数万人，群众高呼“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各地商会也纷纷通电反对关税会议。

关税自主运动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反奉倒段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这个运动。郭松龄事件后，北方区委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推倒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也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压迫段祺瑞辞职，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首都革命”的斗争高潮由此掀起。

在五卅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就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学生军，以作为“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以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二十八日下午，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广大群众共五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示威大会。会后，群众高喊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

“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后又捣毁了章士钊、梁鸿志等人住宅和《晨报》馆。由于运动的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缺乏经验，反动政府事先已有防备，原已联系好的国民军没有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打倒段政府的斗争没有成功。这次斗争是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的尝试。

次日（二十九日），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大会通过了包括“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内容的决议案。连续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形成“五四”以来北京革命斗争的一次高潮。

以北京的斗争为起点，上海、开封、汉口、广州等全国各地，都发动了要求打倒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斗争。

四 三一八惨案 国民军退往西北

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向进步势力进攻的局面。一方面，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一方面段祺瑞政府对北方人民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一月中旬，奉军入关进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滦州。同月，直鲁军向进入鲁西的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和新附冯玉祥的方振武部发起攻击。方部退往大名，岳部退回河南。二月，直鲁军由山东攻入直隶，直军与国民军大战于河南。月底，直军占开封，三月间占郑州、洛阳、信阳等地。河南的国民军一部溃散，一部为吴佩孚收编，一部退入陕西。同时，陕西刘镇华、山西阎锡山配合吴佩孚的攻势，分别出兵占领潼关、石家庄。形势对国民军十分不利。

三月八日，奉军兵舰由大沽口袭北塘，被国民军击退。国民军为阻止直鲁军继续用军舰运兵运械，封锁了大沽口，规定任何舰只不许开入，外国船舰亦须白天行驶和经过严密检查。但日本帝国主义在十二日继续用驱逐舰掩护奉舰两艘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奋起反击，将日舰逐走。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奉国两军即刻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国民军完全撤除海上水雷等五项要求，限十八日正午以前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群集大沽口。很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恫吓，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的具体行动。

大沽口事件和帝国主义的通牒激怒了中国人民。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发起召开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五条：严正驳覆通牒、不许日舰携带奉舰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十八日，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准时召开。与会者三万余人，徐谦、李大钊等为大会主席。李大钊在演说中号召群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大会通过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撤退在津及各地的外兵外舰，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等。会后组织两千多人的请愿团，由李大钊等带领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请愿队伍到后不久，府院卫队即奉命展开大屠杀。一时间，枪弹、铁棍、大刀一齐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袭来。群众死者四十七人，伤一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反诬群众的爱国举动是共产党“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下令通

缉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徐谦等。段政府从此人心丧尽。

三一八惨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政府的罪恶。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段是“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上海、天津、广州、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的群众以及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纷纷举行各种活动，声讨卖国政府，声援北京人民，形成一次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

三一八惨案后，国奉战争继续进行。三月间，奉军攻占滦州、唐山，直鲁军进占天津、丰台。四月，奉军汤玉麟部占领热河，国民军宋哲元部退往张家口。四月十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驱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政府，同时恢复了曹锟的自由。鹿欲联吴抗奉，但为吴所拒绝。四月十五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下旬，直鲁军进入北京。后国民军又放弃南口、张家口，向西退到绥远、甘肃。在奉直两系的镇压下，北方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第四节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 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一 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分化 廖仲恺被刺

国民党自改组以后，由于许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加入，组织有很大发展，力量有很大加强。但是，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仍然保留有地主、买办分子和军阀、政客，他们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对者。这时国民党的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既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又有经济政治利益相冲突的一面。既然“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分化，《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及共产党的会议文件中，曾多次论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基础》一文，分析了左中右三派的阶级属性：“左派是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一部分小商人与知识阶级。这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业者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是妥协派。右派则代表一部分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大商人——如华侨、地主、军人、政客、洋行买办等。这完全是反革命派”。这种划分基本是正确的。但把华侨和军人笼统地归入右派是错误的。同时三派中的分子也是有变动的，一些被视作中派甚至左派的人物，后不久就变成了新右派。

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两个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一般左右派的分歧以外，还突出地存在着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尖锐。

一九二四年夏，发生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的争论。六月，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弹劾”的理由，就是发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九二四年四月印发的团刊第七号。这两份材料包含有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和青年团的相应决议等文件。这些文件中写有青年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团要接受共产党的“种种指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各种工作要做“一致努力”；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同时，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当然不能停止”等内容。据此，他们便认定共产党“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是“党中有党”，是“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对国民党的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从速严肃处理”。他们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下“共产党招牌”，否则“不如分道扬镳”。这是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恫吓，是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破坏。

邓泽如等人的进攻，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反击。陈独秀、恽代英等著文逐点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指出这场争论“实在是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

陈潭秋：《国民党底分析》，《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庭问答纪要》，见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一九四八年版。

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国民党中央也否定了他们的弹劾案。国民党中央先是在七月发表《关于党务宣言》，接着在八月一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指出：“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这场争论，虽然是围绕所谓“党团”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是要不要国共合作的斗争。张继、谢持一些人不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不久就走向公开的分裂。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尖锐斗争中，一九二五年八月发生廖仲恺被刺事件。

廖仲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改组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因此他就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集中仇恨的目标。从一九二五年七月初起，一些右派分子多次召开会议，密谋反对廖仲恺。八月二十日，廖被刺牺牲。

刺杀廖仲恺，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廖仲恺遇刺，指出反革命派刺廖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唁电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廖被刺后，设立了审理廖案特别法庭，逮捕了廖案嫌疑人犯。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一方面打击了右派势力，但另一方面却让蒋介石乘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实权。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应付时局。八月二十四日，蒋担任广州卫戍司令。二十六日，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蒋又担任了第一军军长。同时，他利用革命派对右派的愤恨情绪，借追查廖案的机会，把与廖案有牵连的地位比他高的胡汉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和许崇智（军政部长兼粤军司令）排挤出广州。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二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戴季陶是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理论家。他对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开始就表示反对，曾同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争论累日”。国民党“一大”后，他狂妄地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孙中山逝世后，他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一九二五年三、四月间，他在北京、广州到处讲演，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前夕，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极力主

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戴季陶致蒋介石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戴季陶文存》，第三册。

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的风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这就更加引起一切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忌恨和仇视。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一九二五年六、七月份，戴季陶相继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这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戴季陶用儒家的所谓“仁爱”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说中国“没有显明的强大的阶级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治者阶级、资本阶级、地主阶级“觉悟了”，就可以为被治者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来革命”。因此“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戴季陶还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对立起来，用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他攻击共产党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

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否则，“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鼓吹团体的“排拒性”，召唤“真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很勇猛精进的团结起来”，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发挥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

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的面孔出现。他说三民主义是一种“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泛系主义（按即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他的信徒所说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但实际上他攻击的真正对象是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曾广泛传播，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篡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的进攻，给了严厉的回击。

共产党人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指出：共产党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的民族斗争非常需要。但是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煞阶级斗争的需要，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煞了阶级的利益，而且会使民族斗争之进行受极大的损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

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¹

共产党人揭露了戴季陶关于仁爱的骗人说教，指出它完全是欺骗工农的鬼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佃农有仁爱之心的。戴季陶的这种谬论，“是要想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

共产党人批判了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指出：戴季陶所说的团体有“排拒性”，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而已。戴的所谓“共信不立”，也是站不住脚的。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是有共信的，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当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中国国民党既非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

总之，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另一条路是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²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戴自己所供认的，他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但共产党人，而且许多国民党人，都一致对他的小册子“下总攻击”。在批判的攻势下，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革命舆论压倒了反革命叫嚣。

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十分尖锐的一个地方是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秋广州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第一期部分学生，联合驻广州的湘粤桂等各军校学生，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都是共产党员）等。为加强国共合作，该会规定凡是黄埔军校学生，都是该会会员。它还在驻广东的各军中发展组织，出版《中国军人》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等刊物。联合会确定从事三方面的工作：发动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攻；深入士兵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努力同工农群众结合，结成严密的统一战线。联合会是当时广东有名的革命组织，会员曾发展到二万多人，在平定杨刘、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阻挡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一九二五年初，黄埔军校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开始酝酿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年底正式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六大以前》，第三三八、三四四，三四五页。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重刊序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

成立。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为主要活动地点，以戴季陶所解释的孙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他们专门监视军校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活动，甚至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常常借故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寻衅。他们出版刊物《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进行反动宣传。它虽然也打着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反动团体。除广州外，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也出现过名称和宗旨相同的孙文主义学会组织。

一九二六年春，蒋介石利用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发动了中山舰反革命事件。事件后，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宣布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四月二十日宣布解散。六月，蒋介石统一组织黄埔同学会。孙文主义学会虽然不存在了，但原来的学会分子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三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从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国共合作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又有猖狂反苏反共、公然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的出现。

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十余人麇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正式打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号。他们冒称“中央全会”，但实际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到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西山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通过了一系列反动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十二月，西山会议派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设立执行部。三月，又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伪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西山会议开幕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严厉驳斥在北京召开的这个非法会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湖北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通电，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反击右派的宣传。指出右派集团“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十二月，国民党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决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这个问题。

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听取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工运、农运、商运、妇运等多项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发表了大会宣言。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关于

达到后者的“必要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

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既抱定打倒帝国主义之目的，“故对于苏俄，以诚意与之合作”。大会关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指出：“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有利于工农运动的议案。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比国民党“一大”宣言更为明确，更前进了一步。

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弹劾西山会议”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反动右派团体），“予以除名”；其他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其中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戴季陶、李济深、林伯渠、李大钊、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恽代英等；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白云梯、毛泽东、王乐平、夏曦、邓演达、董用威（必武）、屈武、邓颖超、何应钦等。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国民党“二大”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坚持了革命的三大政策，打击了右派，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右派人物仍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特别是蒋介石，由于他善于伪装革命，表示积极反对西山会议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职务），让他扩大了军事实权，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就为他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 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同时，对另一个反动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也进行了批判。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一九二四年以后，青年党在国内建立组织，出版《醒狮》周报等多种书刊。这个反动的政派勾结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等，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当时广东国民政府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他们在上海、南京等地召开拥护五色旗（北京军阀政府用的旗）大会，组织拥护五色旗大同盟。在北京举行反赤大会。一九二六年初，《醒狮》发表大量反共文章，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曾李等人的所谓国家主义，是挂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宣扬“全民革命”，以此来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他们的骗人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是他们要“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对于一切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而对于同中国友好的苏联，则诬蔑它“侵略”，对接受苏联援助或对苏友好者，则骂之为“苏俄之走狗”。他们

只反苏，不反帝，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国家主义派所说的“国贼”，实际上决不是指的媚外卖国反人民的军阀官僚，而是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共产党诬蔑为“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列在“国贼”之中。这样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有人竟狂叫“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对军阀官僚他们是不反不“除”的。

国家主义派由于他们利用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样伪装革命的口号，又说过不少漂亮话，曾经欺骗了不少知识分子。国家主义的小团体一度纷纷出现。为了贯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了争夺知识分子，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大力的批判。《中国青年》是批判的主要阵地。

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外抗强权”的亲帝反苏的本质。指出：“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只说着玩而不实行的”，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的时代”。恽代英驳斥他们的反苏谬论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没有要求任何交换利益，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中国革命。这和帝国主义侵略是根本不同的。

批判文章揭露了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他们“天天在那里鼓其如簧之舌，唱什么国家主义，冀以欺骗工人阶级和智识落后的青年群众；或是无中生有说什么即将实行共产，及其他种种不利于革命前途的谣言，藉以博欢于买办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朋友”，是“做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而恬不知羞！”

《中国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集中了一切最反动势力的主张，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共产党人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阐明了国家的本质，批判了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后，国家主义派在该地区不能立足，便转移到北方依附张作霖。这时许多国家主义的小团体纷纷瓦解。中国少年自强会自行解散的宣言表示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认为他们奉行的国家主义和小团体活动“不足以挽救目前的危局”。一些个人也发表文章，宣布他们“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经过共产党的批判斗争，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大大缩小了。

五 三二 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经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位上升之后，野心更加膨胀。蒋深知军权的重要，他首先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为此他制造了三二 反革命事件。接着又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这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扩大反动势力、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两个重大步骤。

三二 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

萧楚女：《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版。

恽代英：《答 醒狮【哦 迴昶咳率 已粘霏矜*

《帝国主义和军阀底两个好朋友——国民党右派和醒狮派》，《中国青年》第八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

《醒狮派——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中国青年》第九十七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当时是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

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举动和专擅跋扈的做法，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并没有人挺身而出进行反蒋。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主张对蒋进行反击，但这种意见没有被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采纳。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向导》杂志发表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和谈话，为蒋开脱罪责，甚至吹捧蒋“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庭在回国三个月后返抵广州，他主张对蒋做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蒋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使蒋的反动意图得以实现，共产党则因此受到一次严重打击。按照蒋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同时蒋谄过于汪精卫，说这个事件是汪在军校挑拨国共关系，引起误会造成的，迫使汪离开广州出国。这样蒋既伪装了自己，又排挤了政治地位比自己高的汪精卫。

蒋介石在三二一事件中虽然实现了一部分篡权阴谋，但是由于他的力量还不够大，还不敢和革命势力完全破裂，他还想进行更大的投机活动，于是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他上书军事委员会，假惺惺地说：“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他“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后又虚伪地表示：“我对于共产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但不久，他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事件。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做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一一六页。

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一百四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出版。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八页。

见《向导》第一百四十八期。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全体党代表演说》，一九二六年五月。

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

对于蒋介石的新的进攻，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的提案被通过。六月四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系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同日，陈独秀致书蒋介石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他保证共产党决不会“倒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到了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后来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是国共力量“消长的分水岭”。

经过这两个事件，蒋介石扩张了权势，打下了以后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的基础。

六 工农运动的继续发展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广东的力量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的排挤和压制，北方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镇压下转入低沉。但这个时期的工农运动仍在蓬勃发展。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时，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即有七万余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有组织的工人增加到二十一万以上，几乎每个工厂中都有了工会的基层组织。这期间全国罢工在二百次以上，罢工人数达八十余万。这年五月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从前一年同期的五十四万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四万人，一年中增长将近百分之一百三十。这时农民协会遍布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十余省，农会会员将近百万人。农民一经组织起来，立即开始了抗粮抗税和反军阀的斗争。

五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学员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区，共三百一十八人。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彭湃、萧楚女、恽代英等都在所内讲课。学员分别组成十多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研究各地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经验。这届农讲所规定了下乡实习的课程，曾到海丰实习。农讲所设有军事课程，学员过着军事化的生活。这届农讲所为北伐开始后的农民运动高潮准备了一批骨干。

为了加强共产党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的领导，五一劳动节这天，中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两个大会提出的当前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工农的组织，工农阶级结成铁似的联合战线，与革命军队和学商各界大联合，支持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等。两个大会对于工农联盟问题和农民问题十分重视，通过了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

工农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共产党为促进革命高涨所作的努力，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和北伐开始后的革命高潮，准备了重要条件。

见《六大以前》，第五一—三五页。

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章第十三节。

第二章 北伐战争 国民革命的失败

第一节 北伐的胜利进军 奉系军阀在北方的黑暗统治

一 北伐战争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春，广东国民政府先后消灭了广东省和广东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与此同时，吴张两大军阀以“讨赤”为基础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有先发制人，出师北伐，才是粉碎北洋军阀反革命“南伐”的最好办法。这样，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的任务，提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北伐的。经过三二 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的势力，夺取了党政军的大部分权力。但他们还没有撕下革命的外衣，公开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他们还需要在向北发展中进一步扩张权势，实现更大的野心。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一九二六年四、五月，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积极态度。但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曾对北伐持不同看法。他在《向导》第一六一期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广东政府的职任应该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应该是“拥护根据地广东”。陈独秀的看法是消极的，但并不代表整个共产党的态度。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战争的序幕是援湘作战。湖南军阀赵恒惕是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的巨大障碍。他名义上挂着省自治的招牌，实际是吴佩孚的附庸。一九二六年三月，湖南省防第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在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驱赵，占领长沙、岳州，宣布代理湖南省长。唐的举动为吴佩孚所不容。吴一面委任湖南省防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一面派遣直军入湘，攻打唐生智。五月初，唐军从长沙退往湘南衡阳等地。唐向两广求援，国民政府便决定调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先行赴湘援唐。六月初，唐生智宣布就任国民政府所委之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国民革命军的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中央于六月五日通过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六日，通过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宣言指出：“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

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为建设统一政府及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这个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表明了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至第八各军军长分别是：何应钦、谭延闿（由副军长鲁涤平代）、朱培德、李济深（由副军长陈可钰率军北伐）、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除李济深统领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大部留守广州，第七军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他各部均出师北伐。苏联顾问随军出征。广东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北伐战争，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的运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发，曲江等地农民数万人赶来帮助北伐军运输。

二 北伐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北、湖南各省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有军队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有军队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有军队约三十五万人。从军队数量说，北洋军阀大大超过了国民革命军。但他们反动腐朽，祸国殃民，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三大派之间矛盾重重，不可能协同作战。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北伐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同时，为了防止敌人从侧背攻击北伐军，派出两支部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敌人。计划在消灭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军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消灭张作霖的部队。

根据上述作战计划，两湖便首先成为北伐的主要战场。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四、七、八三个军共约五万人投入战斗。

一九二六年五月底六月初，叶挺独立团在湖南首战告捷，连克汝城、永兴、安仁、攸县等地。湖南人民纷纷成立反吴战争委员会，欢迎和支援北伐军。七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株州、醴陵等地，长沙守敌闻讯弃城逃跑。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工人维持秩序，收缴溃散敌军的枪械，迎接北伐军。七月十一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八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开始两湖战场的第二期作战。集中到湖南的北伐军分成左中右三路，东路监视江西之敌，西路封锁长江上游，中路直趋武汉。中路军于八月中下旬连克平江、岳州等地，接着进入湖北。这时正在北方指挥同国民军作战的吴佩孚星夜南下，命令二万多主力部队死守汀泗桥。汀泗桥是粤汉路上的军事要隘，三面环水，一面高山矗立，易守难攻。八月二十七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领导下，穿过高山抄小路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发起猛冲，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北伐军其他部队一起猛攻，敌人仓惶溃退。北伐军攻占了汀泗桥。独立团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精神，在其他部队配合下，于八月三十日又攻占了鄂南另一战略要地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这时，吴佩孚退守武汉，沿城挖掘战壕，在高山构筑炮兵阵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九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九月六日北伐军攻克汉阳，七

日占领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十月十日，对武昌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北伐军胜利占领了武昌，全歼敌军二万多人。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在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各次决定性战斗中，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屡建战功，被人们颂为“铁军”。

吴佩孚的势力被打垮后，主要战场转向江西。

北伐开始时，孙传芳以“五省保境安民”相标榜，实际是等着吴佩孚与北伐军两败俱伤，由他坐收渔人之利。八、九月间，孙传芳把五省军队组成五个方面军，并大部调入江西，准备随时同北伐军作战。北伐军为平定江西，于九月上旬乘孙军尚未集中完毕之时，即派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及第一、第五军各一部和独立第一师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二十余县和赣南重镇赣州。九月十九日第一次占领南昌，但不久即退出，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受到重大损失。九月底十月初第七军从鄂南进入赣北作战，歼灭孙传芳部精锐谢鸿勋师，又打垮援赣联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指挥的三万余敌兵，截断南浔路。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投向广东国民政府，宣布浙江自治。夏超的自治虽然很快被孙传芳扑灭，夏本人也被枪杀，但这一举动对孙传芳是一个重大打击。十月中下旬，独立第二师和第四军主力奉调入赣。北伐军组成左中右三路，会攻南昌。十一月五日，第四、第七军和独立第二师组成的左翼军攻克九江。孙传芳逃往南京。十一月八日北伐军进入南昌。至此孙传芳的主力大部被消灭。

江西战场取得胜利后不久，福建战场也取得了胜利。北伐开始时驻守潮梅警戒福建之敌的第一军主力，于十月上旬向闽边发起攻击。十日攻克永定。后未经大的战斗，占领了闽南。十二月九日进占福州。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及闽北入浙，直逼杭州、上海。中路军由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下分程潜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的江左军，由长江两岸向苏皖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入皖北阻止直鲁军南下。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除留一部巩固武汉外，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作战，并与在陕西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相机进入豫中。此次计划的中心是夺取南京、上海，占领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地区。东路军于二月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中旬抵达上海郊区。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经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占领上海。三月二十四日，中路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

北伐战争进行中，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阵营。这一年五月，冯玉祥赴苏联访问。三个月后归国。回国途中，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经与国民政府联系，冯于九月十七日在绥远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后，国民军经甘肃向陕西进军，一九二六年底占领陕西全省。后与北伐军会攻河南。

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正义性质，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它的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于北伐军的英勇作战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

但是，北伐战争在它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孕育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因

素。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没有彻底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革命在发展，潜伏的危机也在发展。

三 中国国民党广州联席会议和迁都之争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中央委员和各地代表共八十人出席会议。其中有谭延闿、徐谦、宋庆龄、张静江、孙科、李济深、戴季陶、何香凝、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邓颖超等。苏联顾问鲍罗庭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领导工作。会议通过《对全国人民宣言》、《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之纲领》、《国民革命军代表条例》，以及国民政府发展问题等多项决议案。这是国民党“二大”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宣言指出：“二大”以后的十个月中，革命势力已由两广扩大到长江以南和中国的西北部。“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领域上，已成为最有势力的政府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势力“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中国民族运动“日复一日地发达起来”。但是，帝国主义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还是依然存在，真正完全打倒军阀的日子尚非目前的事，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还没有改善。“要达到中国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买办阶级、走狗政客、劣绅土豪、残酷地主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团结中国农民、工人、实业家、商人、兵士、学生、教员及其他革命知识分子”。

会议通过的国民党最近政纲的重要条文有：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尊重中国主权的新条约；实行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扶助本国工商业，取消在华外国工业的特权；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年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

上述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民主主义性质的政纲，是适合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

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他即日销假，归国视事。

广州联席会议以后，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鲍罗庭、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由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董必武等组成，

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庭为顾问，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武汉正式办公。

但是，曾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一反前言，提出迁都南昌。由此发生迁都之争。十二月底，由粤迁汉的第二批人员（包括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代理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张静江）经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蒋操纵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南昌，并把此项决定通知武汉。当时南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已成为蒋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叛卖活动的中心。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军事力量，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

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接到蒋介石关于政府改迁南昌的通知后，立即回电驳斥，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一月中旬，蒋到武汉察看。在一次“欢迎”蒋的集会上，各界群众代表当场一致要求“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从速迁鄂”。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一句百和，备极热烈。”随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及省总工会、省学联、省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和第四、第七军政治部，纷纷通电敦促政府“立即迁鄂”。在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广大群众的反对下，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没有得逞。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汉正式办公。三月上旬，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到达武汉。

武汉的革命势力在迁都问题上战胜了蒋介石，后来又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和个人独裁。但此时蒋的羽毛已丰，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奈何他不得。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四 奉系军阀在北方的黑暗统治

国民革命军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候，中国北方继续处在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下。

一九二六年初吴佩孚张作霖再次联合之时，张曾允诺将来北京的政局由吴主持。但实际上北京政府的实权始终由奉系军阀把持着。一九二六年四月，国民军推倒段祺瑞执政府后退往南口，奉鲁军进入北京。吴佩孚提出恢复曹锟的法统，张作霖则希望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以便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因此发生所谓“法统”之争。经过激烈的争吵，才决定暂时恢复原由曹锟任命的颜惠庆内阁。五月十二日，颜内阁复职。但不久，颜就在奉系逼迫下辞职，由海军总长段锡珪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六月二十八日，吴张在北京会晤，决定联合进攻南口。八月，奉鲁军攻下南口。十月段锡珪辞职，由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十二月初，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经张宗昌、孙传芳领衔推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发表“反赤”宣言。接着，奉军进攻驻包头、五原的国民军，并以援吴为名，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在这之前，奉军已占领了吴佩孚控制的保定、大名地区）。

吴张结合的基础是“反赤”。他们所谓的“赤”，不但包括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政府，不但指共产党和国民党，而且包括全国一切不满于列

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强侵略和军阀统治的爱国进步势力及平民。正是在“反赤”的口号下，奉系军阀对北方人民实施着反动黑暗的高压统治。

奉鲁军进入北京后，“北方民众革命运动概受摧残，革命的民众领袖概被通缉，左倾的进步的报馆被封，左倾的进步的新闻记者被枪毙”。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公然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著名的《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因揭露了奉系军阀在北京的暴行，以“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的罪名，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枪决。八月六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处死。

进入北京的奉鲁军，疯狂地劫夺民财，杀害无辜，蹂躏妇女，无恶不作。“张宗昌的旧俄白党的军队聚在街市里游行示威，散而酩酊大醉，强奸妇女。便是日本人的《顺天时报》，亦不能不承认奉军的暴行，有甚于庚子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行为”。“凡道行服装稍入时者每被剥下，稍有抗拒即遭枪杀，陈尸路侧，无人敢问”。奉鲁军强迫商店接受毫无保证的山东军用票、直隶流通券。由于不能兑换，使用这种钞票等于白白被掠夺。商店被迫纷纷停业，北京城呈现破败萧条景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张作霖派出军警宪兵数百人，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捕去使馆工作人员十六人、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三十五人。四月二十八日，以残酷的绞刑把李大钊等二十人杀害。这是奉系军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六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再次通电“讨赤”。

见《向导》第一百五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出版。

见《向导》第一百五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第二节 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一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推动下，从一九二六年底起，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革命群众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宣布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在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武汉人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三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前江汉关广场讲演，听众极多，秩序井然。但英国水兵却登陆干涉。当群众队伍压抑着怒火后撤之时，英水兵乘机用刺刀向群众冲击，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重伤四、五人，轻伤三十余人。这就是英国侵略者制造的汉口“一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向英领事提出抗议，限令二十四小时内撤退水兵，由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英租界。四日下午，武汉工农商学各团体代表五百余人举行联席会议，提出八条办法，要求国民政府执行：（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由英政府赔偿损失；（三）惩办肇祸凶手；（四）英政府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租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的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的绝对自由；（七）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并议定如英领事对于所提八条无圆满答复，要求政府自动实行下列四条：（一）立即收回英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内河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领事裁判权。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革命举动，答应“依议做到，以为人民报仇雪耻”。

一月五日下午，在李立三等领导下，武汉召开四百余团体三十余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将上述八项解决办法通电全国和全世界。会后，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同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组织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

一月六日，九江也发生英国侵略者杀伤中国人的暴行，九江工人和市民奋起夺回了九江英租界。武汉政府外交部于一月十日派出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一切。

汉案发生后，江西、湖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市和湖北各县人民，纷纷组织反英援汉委员会，举行反英大示威，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洪流。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英、德、法、意等国工人阶级纷纷通电支持中国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武汉政府执行了革命的外交政策。武汉政府不怕英帝国主义的威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同时由外交部通告外国人安心营业，政府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一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友仁开始与英国代表阿马利谈判。英代表提出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被陈友仁拒绝。一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表示要“恢复国权”，在经济平等、彼此尊重主权的原則下与各国讨论修改条约，以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一月底，英国政府决定调派大批军队来华，以上海为集中地。为此，武汉政府停止了与英国代表的谈判，以示抗议。结果，迫使来华英军大部分改向香港。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先后签字。这是中国人民反

帝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

二 工会组织的发展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七月二十五日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宣言指出：“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号召全国工人“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要求国民革命军在所到之地，拥护人民的利益，赞助人民的自由，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同时，总工会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去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在北伐战争军事胜利的同时，全国工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一百二十万增加到二百万。

北伐军占领长沙后，湖南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长沙召开湖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全省十八万有组织的工人，通过了关于统一工人运动、发展工会组织、组织工人纠察队等决议案。在关于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中指出：工人阶级要想抵抗统治阶级的进攻，“用和平的方法，磕头叩拜的哀求方法，以启发统治阶级之‘仁爱性能’，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工人阶级为要实现他所负担的革命的历史的使命起见，非有武装组织不可”。因此要“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要求政府发给枪枝弹药。会后，全省会员迅速发展四十万人，各级工会普遍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

在湖北，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北省总工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武汉召开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三十五人为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大会召开时，正遇“一三”惨案发生，大会和大会选出的省工会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和推动武汉地区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时全省工会发展到三百四十多个，会员达三十万人。湖北工人也建立了武装纠察队。

此外，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的工人组织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工会组织从工人集中的大城市迅速扩大到许多县城，而且都统一在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

工人组织起来后，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洪流中去。工人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许多地方，工人运动已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直接支援和配合了北伐战争。

这一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占有重要地位。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阶级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二月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镇压之下，都失败了。

在两次起义失败后，共产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从广东到了上海，先在党中央组织部工作，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一起担负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起义前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在工人中组织了五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组织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准备起义后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同

时对市民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三月十一日，党首先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切断了铁路运输。三月二十一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立即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数十万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罢工立刻转为武装起义，各路纠察队，各个工厂、铁路、码头、市政、商店的成千上万工人群众，都按照计划向预定地点集合。工人纠察队带领着广大工人群众，先夺取警察的武装，武装自己，然后向警察署、兵营、火车站进攻。这时，电报、电话、自来水、电灯、公共交通都中断了，枪炮声和群众的口号声响遍全市。上海市民热烈支援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驻在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要求支援，但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三十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不折一兵不费一弹开进上海。二十三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政府委员，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纠察队迅速壮大起来，新的工会纷纷成立，到三月底，登记的工会组织有五百多个，会员八十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北伐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动摇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存在着“左”的倾向。如要求增加工资过高，缩减工时过多，甚至出现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现象。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多月中，武汉工人、店员主要因为要求加薪而举行的罢工，有记载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和罢工中的一些“左”的举动，加剧了劳资纠纷，影响了生产，使由于敌人的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这些都对当时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 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革命

与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内，农民运动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他在九月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深刻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提议要有大批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争斗”，“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制定一个《农民政纲》，提出如下主张：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农民参加县政府；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佃户有无限期的租佃权，并由农会同革命政权的代表共同规定租课额；禁止压迫契约、禁止重利盘剥、取消苛捐杂税等。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健全了中央农委机构。农委由毛泽东、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七人组成，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就近

指导湘、鄂、赣、豫等省的农运工作。以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进驻武汉后，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民运动方面。在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下，同时也在左派国民党的赞助支持下，湘鄂赣等省出现了农村革命的高潮。

早在北伐前夕，湖南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五十二个县、两个特别区的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有统计的农会会员一百三十多万人，工农群众二十万人参加了开幕典礼。毛泽东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关于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会，并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这次大会加速了湖南农村大革命前进的步伐。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

湖北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农协会会员仅有七万二千人，到十二月即增加到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武昌召开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四月上旬农会会员达到一百万人。

在江西，一九二六年十月农协会会员仅六千余人，十一月就发展到五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一月达到三十八万二千人。二月在南昌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农协。

此外，河南、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运动都有相当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全国各地农会会员达到五百万人左右。

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在农村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们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夺权斗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予以处决。在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同时，农民还从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有的地方已经自动丈量土地，准备分配。在文化思想上，广大农民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农民禁止迷信活动，没收祠堂庙宇作会所或办学校。推翻了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农村大革命冲击了束缚妇女的夫权，各级农协都设立了妇女部，不少妇女拿起梭镖同男子并肩战斗。农民还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修道路，修塘坝，开办合作社，举办农民学校等。

农村大革命的兴起，使阶级斗争出现空前激烈复杂的形势。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恶毒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他们捏造农民运动“妨碍税收”、“破坏社会秩序”、“影响北伐”的谎言，作为攻击农民运动的借口。他们还成立反革命组织（如左社、白化党、保产会之类）和反革命武装，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甚至进行反革命暴乱。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攻占湖北阳新，阳新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正当农民斗争蓬勃开展之时，阳新反革命势力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惨杀了省农协特派员、县农协委员、县工会干部九人，制造了阳新惨案。阳新四乡农协会会员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三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听取了关于阳新惨案详情的报告，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组成查办委员会，负责迅

速处理这一案件。在军队的支援下，阳新农民开进县城，逮捕了反动县长和公安局长，改组了县警备队，迅速恢复并发展了工会、农会和工人纠察队等组织的活动。阳新事件，是当时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复杂的一个突出事例。

湘鄂赣等省兴起的农村革命，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也不可能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如有的地方曾忽略中间阶层的利益，有的地方有过吃大户、剪长衫之类“左”倾幼稚的举动。在农运中还曾出现过“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面。但缺点和错误不是农民革命的主流。

四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农民运动形成高潮并且遭受各方责难的情况下，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到二月五日，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三月，发表了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着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报告》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要求革命党人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要“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要“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报告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农民不夺取政权，“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革命武装又是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指出：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具体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农民同盟军问题，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回击了地主阶级、反动军官、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攻击，支持了广大农民的革命举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这篇报告全文最早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战士》上，三月十二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一期曾登载报告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因受压制未能刊出。四月，瞿秋白将此文交给共产党在武汉办的书

局出版，书名为《湖南农民革命》。瞿秋白并为该书写了序言，赞扬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负责。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十七个省，共八百多人。农讲所的学习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主要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这一届农讲所培养了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领导农民运动的优秀干部。三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

第三节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新勾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 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

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为了继续维护在中国的权利，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是英国。这是因为英国把长江流域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伐军向长江流域的推进，首先威胁了英国的侵华利益。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当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兵舰公然援助吴佩孚，炮击北伐军。接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先是八月底，川军扣留了屡次撞沉中国木船的英轮“万流”号和“万县”号。英国侵略者即以此为借口调来军舰，于九月五日向万县城大肆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使繁华的万县城几乎成为一片瓦砾。这是英国侵略者以武力威吓中国人民的一次严重暴行。一九二七年初，英、美、法、日等国为了阻止革命势力向长江下游的发展，都增派军队和调集军舰来华。据英国《泰晤士报》供称：一九二七年三月，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一万二千七百多人，日军四千多人，美军三千五百多人，法军二千五百多人，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三万多人。当时停泊在中国领海内的帝国主义军舰共有一百七十余艘，其中英舰七十六艘，日舰四十八艘，美舰三十艘，法舰十艘；停在上海附近者近六十艘，驻上海的各帝国主义舰队组织了所谓“联合军”五千人，随时准备登陆。一九二七年二月，英帝国主义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保卫上海”的建议，之后美帝国主义又提出所谓将淞沪划为中立区的建议。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上海。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又采取种种阴险手段分化革命阵线。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英、日、美等国先后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虚伪地表示“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愿意通过谈判使“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这些声明，正如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所指出的，无非是想“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它们开动宣传机器，鼓动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决裂”，暗示只要蒋介石能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就准备与蒋谈判并支持他。一九二六年底，日本外务省官员奔走于武汉、南昌、广州之间，日本的许多“要人”也纷纷来中国“考察”，极力拉拢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二月，英国也派了代表去南昌与蒋介石会谈。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集团，成了帝国主义争取的对象。

一九二七年三月，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炮轰南京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达到高潮。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在混乱之中，

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一一八、一一二页。

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一一八、一一二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一一九页。

《向导》第一八六期，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曾有袭击外国领事馆、外人机关和住宅的事情发生。于是，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便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进入南京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击，打死打伤二千多人。南京惨案发生后，这伙帝国主义又在四月十一日向中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并以如不满足要求，将“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之手段”相威胁。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加紧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事件，也是帝国主义武力胁迫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信号。

二 蒋介石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活动的斗争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进一步集大权于一身。国民政府所属军队都归他“统率”，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归他“管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他任免。在北伐中，他沿途招降纳叛，收编了大批北洋军阀“倒戈”部队和土匪，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在这里，他加紧同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官僚的勾结。他公开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同时派吴铁城、戴季陶去日本，谋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封建买办阶级的政客，纷纷前往南昌，出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为蒋出谋献策。奉系军阀一再表示：“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一时“南北妥协”、“南北合作”、“共同反共”的叫嚷甚嚣尘上。江浙财阀虞洽卿也到南昌与蒋商谈，答应给蒋提供反共经费。南昌成了蒋介石拍卖革命的场所。

蒋介石在南昌暗中策划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在城市里，蒋介石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群众团体，枪杀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一九二七年一月，捣毁了赣州总工会。三月六日，蒋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在九江组织流氓匪徒，袭击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被蒋的卫队所镇压。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蒋又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受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愤怒谴责和坚决反对。从迁都之争开始，武汉方面开展了群众性的恢复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运动。二月九日，由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二月中旬，邓演达发表题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长篇演说，反对军事独裁。二月二十四日，湖北省党部召开武汉党员大会，由董必武主持，通过“迎汪复职”、“肃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打倒党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谋妥协的反动分子”等项议决案。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党权运动达

见《向导》第一百八十八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到高潮。全会重申中国革命的方针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任何妥协。全会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统一革命势力、加强国共合作、扶助农工运动的决议案多项。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议决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两会之间，由九人组成的常委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常委会不设主席。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各设七人主席团，国民政府设五人常委，均不设主席。会议决定裁撤中央军人部，并改选了各部部长。全会还通过军委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规定凡重要军官的任免和出征动员令，都须由军委会会议决，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有效，总司令无权自行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这些决定都是为了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制止他的军事独裁的。蒋介石没有参加这次全会。全会一方面限制了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另一方面为了早日完成北伐，避免内部分裂，又对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右派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蒋仍被选为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并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四月六日，武汉国民政府又分任蒋介石和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下设四个方面军，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总指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对蒋介石攫取革命领导权、分裂革命统一战线行径的一次有力反击。会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三月二十六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猛烈抨击了蒋介石屠杀工农的罪行。会后，农讲所全体学员八百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惩办祸首蒋介石。三月十八日，方志敏组织江西人民请愿团到武汉，要求惩办杀害陈赞贤的凶手。由于在武汉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的努力及群众讨蒋运动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恢复南昌市党部，并决定派方志敏重新组织并主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四月二日，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工人纠察队，攻入了反动分子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四月三日，南昌各界三万人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大会，有力地打击了南昌的反动势力。四月五日，改组了右派把持的江西省政府。朱德任公安局长。三月三十一日郭沫若在南昌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在安庆屠杀民众的真相，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郭沫若大声疾呼“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许多地方纷纷举行讨蒋集会，发表通电，斥责蒋介石的罪行。

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蒋一进入上海，帝国主义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相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意见，是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

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字林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公开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末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

蒋介石也迫不及待地同帝国主义勾结。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他将扫除“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旗舰匹茨堡号上，并和帝国主义者商谈了关于“维持”秩序的办法。四月一日，蒋介石驻上海的专员“拜访”英国领事，为“南京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决不使其扩大”，并承担全部责任。

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蒋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工界联合会”，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蒋介石一边。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作了极其阴险的周密计划和部署。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把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从四月二日开始，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问题。二日，吴稚晖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文件，随即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这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三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他以后要“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都交给汪精卫指挥。汪参加了蒋召开的秘密会议，但在是否立即“清党”反共问题上，汪与吴稚晖等发生争执。汪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一切。

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危机时刻，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他不但不做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反而在四月五日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辟谣。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去武汉。

四月六日，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贴出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管辖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决不允许存在”。八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钮永健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蒋介石又成立了戒严司令部，

以白崇禧为司令。四月九日发布戒严条例，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同日，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同日晚，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诱至家中，然后杀害。

蒋介石在磨刀霍霍布置反革命大屠杀的同时，又玩弄政治欺骗手段。当工人代表要求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四月六日，蒋介石还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用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九日离上海去南京。上海的反革命政变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驻在龙华的司令部。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或武力等卑劣手段，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一千七百条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派占领。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广大群众在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厂的工人和海员、店员等二十多万人举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到会者仍有六万多人。大会一致决议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游行示威，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游向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流遍了烈士的鲜血。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一百多人，很多人受伤。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流亡失踪五千多人。继汪寿华被杀后，赵世炎、陈延年等也在“四一二”后牺牲了。这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时反动派压迫工人复工，外国资本家工厂大批开除工人。资产阶级也背叛革命，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包括六十余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工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避免无益牺牲，上海总工会于四月十五日发出通知，忍痛复工。同时号召全市工人“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

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

四月下旬，上海警备总司令部成立。杨虎任总司令，陈群任军法处长，杜月笙的一个门徒任行动队长，执行“清党”任务。上海变成了肆意吞噬革命者的“虎群”世界。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十四日，他们发出搜捕共产党人的命令，由钱大钧任戒严司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十五日凌晨，反动军队和反共的工会组织向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同时发起搜查和攻击，并派兵监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余人，封闭工会等团体二百多个。他们组织广州特别委员会，宣布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通令本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血腥恐怖笼罩广州全市和广东全省。六月，又进行第二次“清党”。总计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千一百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都被广东的反动派杀害了。

除上海、广东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举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这是一个在屠杀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它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所谓“清党”，通缉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一百九十余。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等反动派所控制的地区。

第四节 武汉政府走向反动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 武汉地区的讨蒋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和深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遭到了局部失败。但是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当时的武汉政权基本上还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左右。顾问鲍罗庭起着很大的作用。共产党中央迁到了武汉，所有的重要的共产党人几乎都集中到武汉工作。汪精卫于四月十一日到达武汉后，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宋庆龄、邓演达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继续为推动革命的发展而努力。

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二十二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民众团体，纷纷通电讨蒋。湖北农民协会在讨蒋通电中列举蒋介石的罪状，决心率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同胞，与蒋“决以死战”。武汉、长沙先后举行大规模的讨蒋集会。“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响遍广大城乡，“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贴满武汉三镇。各地在讨蒋运动中，加紧了向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

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在继续高涨。武汉的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六月，全国工会会员发展到二百九十万。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九百一十五万人，其中湖南四百五十一万，湖北二百五十万。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不仅有梭镖队，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支，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乡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实际政权机关。湖南省农民协会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两湖地区的农民协会还控制着粮食和食盐的运销，筹集了大批军粮供应前线。

四、五月间，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当时农民采用的办法，一是丈田，即清丈地主土地，使地租与地亩相当，免除地主超出土地实有面积的剥削。二是插标，即重新分配土地的租佃权，使失业农民得有土地租种，插标为记。这两种方法还没有触动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三是分田。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农民按人数和劳力分配土地，成年每人可得八石谷的土地，未成年者依年龄大小，每人分得六石或四石谷的土地。这种做法，在长沙、湘潭、醴陵等县的一些区乡都有实行的。湖北的一些农村也开始出现要求分配土地的斗争。

在土地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四月初国民党中央成立由邓演达、毛泽东等参加的土地委员会，开始研究制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土地委员会通过一个《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土地委员会同时通过一个《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没收之”。土地委员会关于没收大地主及一切公有土地分给农民的规定，与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的内容，基本一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样的规定是适当的。但这个决议草案提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时，因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未被通过。不久，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接连发生，土地问题的解决便被搁置了。

二 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压迫武汉政府的北伐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东南西北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南北的铁路和长江上下游的航运，均被截断，使一向被称作“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了孤岛。帝国主义一面出动大批军舰聚集汉口江面，对武汉政府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关闭在武汉的银行、工厂、企业，套走现金，运走物资，破坏武汉地区的经济。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七年一月，英国关闭了在汉口的全部企业。四月三日，日本侵略者在汉口制造了击毙中国民众九人、击伤八人的惨案，随后关闭了在武汉的所有日本企业。武汉地区的地主豪绅、反动军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攻击工农运动，造谣中伤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分裂和破坏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和军阀联系密切的买办官僚资本家，乘机抽逃现金，关厂罢业，对抗革命。上述各种反革命势力的进攻，给武汉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同时，武汉地区的民族资本家，由于反革命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和本身对于高涨的革命形势的惧怕，由于劳资纠纷不断加剧，也纷纷关厂歇业。这样，武汉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五月中旬，武汉各大商行关闭的有一百三十多家，继续经营的仅二十四家。到二十日，各商店都关了门，拒售货物。由于对外贸易阻断，工厂开工严重不足，造成日用商品奇缺，粮煤供应紧张，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工人大批失业，仅武汉一地，失业者即达十二万人。一方面生产缩小，财政收入日绌，另一方面又百业待理，军政支出浩大，结果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当时政府的月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万元左右，而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元。为了弥补赤字，只得大量增发纸币。这又必然使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并且日趋严重。武汉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反经济封锁、反抽逃现金的斗争，但没能扭转财政危机的局面。

四月十九日，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期北伐。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发展方向问题，曾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首先进行东征，乘蒋介石地位尚未巩固之时，迅速出师讨蒋，然后再继续北伐。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继续北伐，首先进军河南，迎接冯玉祥国民军出陕西，会师中原，再与阎锡山联合，驱逐奉军出京津，最后解决东南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应首先进行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第四种意见是南伐，即向广东进军。四月十八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行北伐。第二天北伐

开始。

第二期北伐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计六万人，唐生智为总指挥。这时河南的奉军约八万人。五月中旬，北伐各军集中驻马店地区，向奉军发起总攻。下旬，连克漯河、郾城、临颖、许昌、新郑。冯玉祥军也于五月二十六日攻占洛阳，然后分两路向新乡和郑州进兵。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六月一日，北伐军和冯玉祥军会师郑州。四日占开封。克复郑汴，是北伐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在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的同时，南京方面也北渡长江，攻打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六月二日占领徐州。

三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召开前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在汉口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确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约蒋介石。这次会议表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威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等参加了大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做了报告。报告把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做了一个回顾，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又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无力与敌人对抗取得胜利，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去，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陈独秀的意见是与鲍罗庭一致的。报告还讲到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但都没能给予明确具体的回答。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通过了接受该决议案的决议。大会并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做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决议案。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使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议决案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在三二一事件前后，“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北伐开始后，“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上海暴动期间，“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不是对立的，“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

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否则，革命的地域就会丧失。到西北去的主张，是一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失败的情绪”，是“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大会设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讨论中提出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公有的和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农业公司及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

《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中包括：“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议决案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号召工人去当兵，以促使军队的革命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等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等十四人。上述中央委员中陈独秀等九人为政治局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五大”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和政策。但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阶段，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在右倾错误还没有能解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尤其对于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这一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会议仍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参加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彼此意见冲突，加重了会上的意见分歧。“五大”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 武汉政府的右转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由于帝国主义和武汉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压迫，由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工农运动的深入和所显示的巨大威力，武汉政府中号称“左派领袖”的汪精卫等人，逐渐右转，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八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二十二日，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境。二十四日，国民政府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人心，实可痛恨”。五月底，国民政府下令解散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同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湖北黄冈和黄陂两个革命工作开展得好的县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北伐军中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大肆活动起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政府所辖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召集一些军官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两湖地区发动反共军事政变。五月十三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鄂南叛变。夏斗寅在这一天通电反共，随即进兵嘉鱼、咸宁、汀泗桥一带，一直攻到距武昌仅四十里的纸坊。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任命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和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前往镇压。十九日，将叛军击溃。但夏斗寅残部继续在鄂东、皖西一带作乱。

五月二十一日，在何键的指使下，驻湖南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变。叛军捣毁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讲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和武汉政府购买粮食的巨额现金，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一夜之间，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逮捕四十多人，长沙一片白色恐怖。这即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名义发出通电，宣布“凡以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五月二十八日，许克祥勾结湖南国民党右派头目，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推翻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的反动势力在“救党委员会”的号令下，疯狂镇压工农运动，捕杀革命者。

马日事变后，经鲍罗庭提议，武汉政府于五月二十五日派出一个由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庭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农运“过火”。但代表团只到达岳州，就因受到许克祥的恐吓而退回武汉。六月下旬，武汉政府委派唐生智回湘全权处理此次事变。唐回湘后，一面肆意攻击农民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一面为许克祥辩解，说他的叛变是“激于义愤”的“自卫之谋”，要求“从轻”处分。唐的回湘，起了进一步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

夏斗寅、许克祥在两湖相继叛变后，反动军官、江西省长朱培德在江西“遣送”共产党人。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将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一百四十二名“遣送出境”。六月五日，又将江西省及南昌市党部中重要共产党人方志敏等二十二人“遣送出境”。同日，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被勒令停止活动，农民自卫军枪械被收缴。六日，朱培德发出布告，明令江西共产党员限期出境，停止全省农工运动。

随着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这些反动军官的相继叛变，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疯狂反攻倒算。朱培德发出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后，江西“各县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若奉纶音，应时蜂起……纷纷捣毁农工团体”。当时全国农协在一件公文中指出：“一月以来，湘鄂赣省农民协会，多为反动派所摧残，农民之牺牲者竟达到一万数千人。”反革命分子用“洋油烧身”、“活剥千刀”、“砂石磨死”、“炮烙烤毙”、“挖眼断舌”等野蛮酷刑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工农运动遭到极大摧残，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北伐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以赴前方指导为名，于六月八日赶

江西省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报告。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到郑州。九日，冯玉祥亦到达郑州。十日举行郑州会议。会上，冯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汪精卫等既谴责蒋介石的独裁专行，又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表示不满。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和政务；成立豫、陕、甘三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在豫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均由冯负责肃清，所有进入河南的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地区；冯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经过郑州会议，第二期北伐的成果全为冯玉祥所独占。这次会议实际上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宁汉的合流。

郑州会议后，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会议。会议决定蒋冯共同对奉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六月二十一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等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决大计，早日实行”。随后，冯在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

五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中共“五大”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

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七六页。

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与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革命只有失败。

六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旬汪精卫等从郑州返回武汉后，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见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罗易赴华使命》，第三二五页。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九十五页。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六大以前》，第九一二页。

《国民革命军最近调查》，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和军队中加紧策划“分共”。六月二十九日，反动军官何键发布反共训令，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此时何键的三十五军已移驻汉口，准备向革命开刀。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由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的职务。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明确宣布共产党要“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是“共产党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这个宣言基本上是好的。同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他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工农”等行径。七月十四日宋庆龄发表声明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表明了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

在经过多方布置之后，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內，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集团举行反共政变，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完全抛弃。至此，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这一阶段的革命斗争是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口号、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基本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这次革命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叛变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而遭到失败，但它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仍是光辉的一章。它给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为革命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历史，以国共合作开始，以“清党”、“分共”告终。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标志了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变化。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成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权。

这个历史阶段，军阀势力发生了重大的消长变化。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

《国闻周报》四卷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北京《晨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汪精卫最近演说集》，第一三二页。

了。很大一部分旧军阀因革命高涨而归属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凭借各种机缘产生的国民党新军阀，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成了主要的反革命势力。北洋军阀的统治在逐渐让位于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的军阀的统治。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此后国民党军阀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第三编 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加强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章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第一节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一 宁汉合流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

经过北伐战争，大部分旧军阀的势力被消灭或被削弱，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乘机崛起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时，国内反革命势力分布如下（边疆地区除外）：

汪精卫和唐生智互相勾结控制着两湖和江西（本年六月唐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蒋系和桂系的一部分占据着宁沪一带；冯玉祥占据着陕西、河南等地；阎锡山仍旧盘踞着山西（六月初阎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桂系的另一部分和粤军占领着两广；四川、云南、贵州则有若干地方军阀割据着（“七一五”前三省军阀均已改悬国民党旗帜，并站在蒋介石一边）。北方最大的军阀是张作霖，他占据着东北、京津和山东等广大地区；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占据着苏北。这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派系则有：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政客集团和军阀武力互相勾结，今天甲乙联合对丙，明天又乙丙联合对甲。你争我斗，一片混乱。

当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宁汉两方的对立和争斗。武汉方面组织了东征军，集中江西，准备讨蒋；南京方面也派出军队与之相拒。双方处于武力对峙的状态中。冯玉祥在“七一五”前后几次发出劝和通电，主张通过会议解决宁汉纠纷。经过“七一五”政变，宁汉两方在反共问题上已经没有分歧，渐有妥协的趋势。七月二十四日，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回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八月八日，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通电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

八月十三日，蒋介石突然宣告下野。其原因，一是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力主“倒蒋”，而且声浪很大；二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貌合神离，甚至蒋系的何应钦也很想取蒋而代之；三是蒋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事打了败仗，并且受到日本出兵山东的干涉。蒋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于是采取了暂避锋芒、观望形势、乘机再起的策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亦纷纷离宁赴沪，南京方面的实权便主要落在桂系手中。但这样一来，促进了宁汉的合流，因桂系本有联汉攻奉之意。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武汉的谭延闿、孙科和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到达南京。汪陈以国民党中央的“正统”自居，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宁汉纠纷问题。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宁方的响应。这时的谭延闿、孙科也不再听命于汪。在这种形势下，汪只得自认“防共过迟”，表示要“自劾下野”、“听候处分”，并且不再坚持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孙科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

得到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的赞同。特委会于九月十五日成立。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是这个“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

特别委员会的实权把持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由于没能掌握中央大权，于是便重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依靠鄂湘、赣三省，反对特委会。这样宁汉合作又重新变为宁汉对立。到十月下旬，更演成李（宗仁）唐（生智）战争。结果唐军失败，放弃武汉，唐本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宣告下野，部队撤往湘南。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

与宁汉再次分裂的同时，还有宁粤对立的发生。九月底，汪派的张发奎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除参加南昌起义者外）到达广州。张打出“拥护党”的旗号，反对特委会。十月底，汪也到达广州。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在经过三个月的下野后，回到上海。以前势如仇敌的蒋汪二人，这时为了共同制桂，达成了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复任总司令，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十六日，汪精卫、李济深一同从广州赴上海。就在汪李离开广州的第二天，张发奎的部队突然向驻粤的桂军发起攻击，迫使桂军退回广西。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领导了英勇的广州起义，张发奎第四军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大部参加了起义。以上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次广州事变，都被反汪各派抓住作为攻击汪的借口。他们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南京政府下令查办汪陈。这样，汪派便在这场国民党的派系争斗中遭到失败。汪躲往国外，陈公博避居到上海租界，张发奎在镇压了广州起义后被赶出广州。这时，蒋介石重新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人物，各派纷纷电促他复职。一月上旬，蒋复任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三月七日，蒋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重新集中到蒋介石一人身上。同时，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被任命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的主席。这是承认各派国民党军阀割据的现状。

二 蒋冯阎桂四派联合“北伐”和东北“易帜”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把何应钦掌握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将冯、阎、李的军队编为第二、三、四集团军，三人分任总司令。蒋冯阎桂四派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再度进行“北伐”，展开同奉系军阀的战争。

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第四集团军在京汉线；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津浦、京汉两线；第三集团军攻石家庄。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九日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经十九日鲁西巨野一战，孙传芳部队基本被消灭。国民党军于二十七日攻下泰安，五月一日占济南。这时日本出兵济南，阻挡国民党军队前进，蒋命令军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接着国民党军相继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德州等地。张作霖见大势已去，放弃北京，于六月三日退回关

外。次日，张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八日，阎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十二日阎军傅作义部进入天津。十五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十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为北平市。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于七月一日发出通电，表示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七月中旬，蒋冯阎李等在北平小汤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东北问题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九月，进军到冀东的桂系白崇禧部与奉军杨宇霆部联合打败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直鲁军五万人全部被缴械遣散。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拿下原北京政府的红黄兰白黑五色旗，换上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表示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官。在这之前，新疆杨增新、热河汤玉麟已分别于六月二十日、七月十九日宣布“易帜”。至此，南京政府便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这种“统一”并没有带来中国政局的安定。随后，军阀之间的混战，接连发生，国民党内各派别的争斗，又激化起来。

三 国民党“训政”的开始和对革命的镇压

国民党军阀占领京津后，即于七月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训政纲领》六条。其中规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可见，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就是剥夺人民的权利，实行国民党一党的反革命专政。一九二九年三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其中规定：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国民党要“独负全责”。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这就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当时规定训政时期为六年，一九三五年结束。

在公布《训政纲领》的同时，国民党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中华民国的“治权”，由“国民政府”“总揽”，五院分别执行。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会推出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及五院院长。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分别为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五院的设立，表明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已经完备起来。

国民党对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一九二七年八月初，武汉工人为抗议国民党的迫害，宣布总同盟罢工。武汉政府对此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十一月，广州工人包围汪精卫住宅，要求恢复工会，举行游行示威。广州海员五千人反对广东政府压迫工人。二十三日，广州军阀为镇压工人罢工，白昼戒严。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了广州工人和士

兵的起义。同月，淞沪卫戍司令部下令严禁罢工运动，违者军法从事。汉口桂系军阀派兵搜查苏联领事馆，大捕共产党人，武汉大学也被搜查。一九二八年一月，桂系在武汉解散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要省政府严禁群众运动，取缔抗租、罢工。广州反动政府严令现存工会一律取消。二月，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规定属于共产党的理论、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三月，反动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其中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实行暴动者，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六月，南京政府公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八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一项《民众运动案》，规定组织团体“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这些反动法令和提案，把革命人民争得的民主权利完全取消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实行血腥的大屠杀。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就有三十三万七千多人被杀害，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杀害的达一百万人以上。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萧楚女、向警予、彭湃、恽代英等都先后牺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

国民党在实行武力镇压的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扼制革命，蒙骗人民，大力推行所谓“党化教育”。“党化教育”首先在学校实行，而后灌入整个国民教育中。在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党部，设立党化教育委员会。在各个学校，普遍建立训育制度。一九二八年五月以后，国民党把党化教育改称“三民主义教育”。一九三一年六月初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并对小学、中学、大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提出不同要求。这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已经抽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内容，成了完全反动的东西。所谓的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完全是国民党的反动教育。

四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

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建立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前往日本访问，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蒋在东京发表声明，说中日两国要“实现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理论”。蒋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会谈。田中表示支持蒋介石反共和统一江南，但不允许他立即北伐，统一全国。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日本如果援助他“早日完成革命”，“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对日本在满蒙特权的承认，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蒋回国后，十二月十三日发表谈话，声称“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共产国际”。表明他决心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一九二八年二月，南京政府开始同美英等国讨论解决南京事件。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残杀中国军民的事件，但南京政府却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诬指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

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林伯渠是“肇事祸首”，答应向各国道歉、赔偿和惩凶。宁案的处理，表明了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的顺从。

同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公然武装进攻济南。随即展开血腥的大屠杀。在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面前，蒋介石卑躬屈膝，严禁部队向日军还击，禁止人民举行反日运动。他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日本侵略军从五月三日开始的大屠杀，持续了一周，中国军民死伤万人以上。一九二九年三月，南京政府同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日本答应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安全。至于中国所受严重损失问题，协议规定由双方“实地调查决定之”。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城市、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被一笔勾销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南京政府在所谓“北伐告成”之际，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接着，七月十七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旧约已期满新约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关于关税自主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国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立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又规定缔约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即美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随后南京政府陆续同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中日缔结了关税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在中英条约中规定：对英国货物所课税率，应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所议之税率相同，即只能依照货物的品类性质，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再征收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的附加税。根据最惠国待遇，这一规定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中国仍无权自定税率。同时，总税务司和各地海关仍为外人把持。所以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没有实现。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更是毫无结果。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到一九二八年期满者有日、意、比、葡、丹、西六国，除日本外，其他五国都在新约中承认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作了如下保留：中国对此五国行使司法权的方式，须经双方同意，并须多数国家同意废除时始行废除。当时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十六个，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英、美、日、法等六国也未表示同意取消该项权利。南京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初公布一个管理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再延缓，最后不了了之。

国民党政府改订新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制造国家独立自主的形象，借以缓和革命人民反帝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以此取得各国的承认。国民党政府吹嘘改订新约是“外交新纪元”的意义就在于此。

南京政府一面投靠帝国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政府撤销对驻在关内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关闭各省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及商业机构。一九二九年五月，张学良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七月十日，蒋介石、张学良指使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以武力接收中东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五十九人，制造了中东路事件。七月十八日中苏断交。八月，在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

乘机进行干涉，实现中东路的国际共管。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苏联红军打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事件以前的状态。

南京政府亲帝反苏，正是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性质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 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

一 中国革命的低潮和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对革命人民极端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革命低潮的表现，首先是革命阵线缩小了。原来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军成了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其次是革命的主观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党，少数人甚至当了叛徒。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余人很快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被打散。工会会员在革命高潮时期是三百万人，到一九二九年减少到三万人。曾拥有一千万会员的农会组织绝大部分不再存在。第三是工农运动由进攻转入防御，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七一五”以后，城市工人仍然坚持斗争，但都遭到镇压。工人斗争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多以经济斗争为主，以失败告终者居多。农村斗争呈现着此起彼伏的状态，总的形势也是转入低潮。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说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

革命潮流是低落了。但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之下，还越来越趋向激化。因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七一五”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今后新形势下的方针，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筹备，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会期一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瞿秋白，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还有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共二十多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后不久又作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会议主要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问题等各个方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七六——七七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九八五页。

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告党员书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几个月“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机会主义的“总的理论”，就是“必须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顾顺章；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八月九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会议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最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田主实行减租。

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武装问题上的错误，指出中共中央过去“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会议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通过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会议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但是，会议对中国革命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错误。如会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会议没有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会议只批判了右倾，没有注意纠正和防止“左”倾。所有这些，就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委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

二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武装起义

“七一五”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党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起义。

这时，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骨干是周士第领导的七十三团，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而成）、新从鄂东开来九江由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以上三支均属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建制。还有朱德掌握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卢德铭等领导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属第二方面军）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等。总兵力三万余人。当时敌人正策划把叶贺部队调至南昌和九江之间的德安一带，包围吃掉。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兵力总计六个团约一万人。

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及叶贺部队相继到达南昌。七月三十一日晨，周恩来及前委其他成员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否定了张国焘阻止起义的错误意见，决定八月一日凌晨四时举行起义（后因发现叛徒告密，起义乃提前几个小时）。

八月一日一时许，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即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驻马回岭车站的第二十五师大部也于次日开进南昌，与市内起义部队会师。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赶赴南昌途中受阻，后来分别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起义胜利后，随即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定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由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由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总兵力三万余人。

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按预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途中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布继承北伐革命没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八月十九日占瑞金，二十四日克会昌，打垮堵截的国民党军队钱大钧部。九月上旬，进军长汀、上杭，中旬占大埔、三河坝地区。随后分兵，由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下旬，占领潮汕后又第二次分兵，一部留守潮汕，主力西取惠州。九月底十月初，起义军在汤坑、三河坝遭到优势敌人的攻击，激战数日，损失严重，潮州、汕头亦相继失守。随后，主力又在流沙一带遭敌截击。所留部队，一部约一千二百人由颜昌颐、董朗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一部约两千人，由朱德、陈毅率领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以武装斗争反抗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光荣节日。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想在广东重整旗鼓，再行北伐。因而孤军南下。再加两次分兵的失误，结果，

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就起义中的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起义区域问题等作了讲话。他十分强调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指出：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发动起义，必须有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归失败。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一带发动起义。会议决定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和党的行动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前委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行委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以易礼容为书记。

省委会议八月底结束后，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各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九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和部队编制。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为骨干，吸取聚集在这里的附近各县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农民自卫军为基础，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各一部组成。全师总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另外又收编夏斗寅残部组成第四团。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醴陵、浏阳，然后共同进攻长沙。

九月九日，从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开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天，一团从修水出发，准备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在接近长寿街时，四团突然叛变，一团腹背受敌，百人牺牲，两个营被打散。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相继攻克醴陵、浏阳，但在浏阳被敌围攻，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由铜鼓西进，在攻占东门市后被敌人袭击，也遭到损失。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军退集到浏阳县的文家市。在这里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现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暂时已经不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应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农村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向湘赣粤边农村进军。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了广州起义。

十一月粤军把桂军从广州赶走以后，二者相持于梧州、肇庆一带，广州市内十分空虚。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于十月下旬做出在广州发动工农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即成立行动委员会即总指挥部，张太雷任总指挥。起义前夕，叶挺也来到广州。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编成），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任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

十二月十一日晨三时左右，教导团全体官兵誓师起义。同时，市内各地工人赤卫队亦手执红旗，分路行动，投入战斗。第四军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率领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宣布起义。仅经过两个多小时，起义部队便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当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宣告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苏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理）。其他成员有：恽代英、

张太雷、周文雍、彭湃、陈郁、杨殷等。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宣言和政纲，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监督生产；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归农人耕种；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军阀立即停止内争，集中军队五万余人进攻广州。起义人民经过三天三夜的英勇奋战，终于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革命群众七、八千人惨遭杀害。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的一次重要尝试。表现了党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但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使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起义失败后，撤出的一部分武装，后来分别到达东江和右江地区，参加了当地的武装斗争。

除上述三次重要起义外，共产党还在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地区发动了起义。

一九二七年九、十月，广东东江地区人民在当地党组织和彭湃的领导下，先后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座县城，并于十一月间成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十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了广东琼崖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遭受挫折后，继续坚持斗争。

十一月中旬，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等领导了数万人参加的湖北黄（安）麻（城）起义，一举攻占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了赣东北弋（阳）横（峰）两县的年关暴动，数日内，起义区域达百余里，组成土地革命军，开始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

一、二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了湘南年关暴动，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三个月之久。

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开始在洪湖和湘鄂西发动农民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平江二十万农民，在罗纳川等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扑城”斗争。

一九二八年三、四月，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发动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契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春，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了闽西龙岩、永定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

总计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达一百多次。

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回击。它们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起义的武装力量有一部分保留下来。这些都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三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时已经开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当时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但是这次会议却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因此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命令条件不成熟的农村举行农民暴动。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会议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决不能“自告一段落”，它“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因此制定了没收民族资本家工厂企业和中小商人财产的错误政策。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当时全党正在探索中。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会议还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这种盲目的杀戮，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之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因此，一九二八年初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执行。二月，共产国际批评了瞿秋白的错误，指出那种“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意见，“是不对的”。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检讨了“玩弄暴动”、“烧杀主义”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基本上结束。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正式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这次会议前公布的供全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表述。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专门写了《苏维埃口号与工农政纲》一节。决议中说：“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实施。特别是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

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论述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一千余人，开始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进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的开始。

工农革命军于九月底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原来的三个团缩编成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十月三日改编完毕，部队继续前进。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八年一、二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这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同时解放一片农村，初创了井冈山根据地。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为两个团，共约一千五、六百人。党的组织有了恢复和发展，到二月，宁冈、永新、遂川、茶陵四个县建立了县委，酃县成立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已经解放的地区，群众展开了打土豪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春，部队实行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些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月上旬，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党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调走队伍，去支援湘南的农民暴动。结果，边界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三月下旬湘南暴动失败。四月部队返回井冈山。

四月底，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砦市同这里的部队会师。五月四日召开军民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六个团。两支队伍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起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五、六月先后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三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时红军实行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正确的作战方针。根据地有很大的扩展，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五月在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的队伍有很大发展。五月二十日在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增强了军民的胜利信心。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湖南省委派代表到井冈山，命令红军大队向湘南冒进，攻打郴县，结果遭到了重大损失。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被敌人占领，冒进湘南的红军也遭受失败。红军大队走后，毛泽东率不足一团的红军，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曾将敌军十一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二十五天。八月中旬，毛泽东留下一个营守井冈山，自己率领一个营去迎接大队。八月下旬在桂东与大队会合，决定重回井冈山。

八月三十日湘赣两省的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从黄洋界进犯井冈山。红军凭险抵抗，英勇地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六日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九、十月间，红军打了三个胜仗，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肯定了边界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论证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日益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在决议中提出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军阀间的继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使反动统治出现缝隙，给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坚持以可乘之机。

第二，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内，特别是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还广泛遗留。

第三，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没有解决，跟着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全国革命的形势必将继续向前发展。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

以上五点，说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毛泽东在说明第四个条件时，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工农武装割据”。他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是后来中国革命所走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正确道路的最初表述。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底，井冈山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五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共产国际的书记布哈林作政治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瞿秋白作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补充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通

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认为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错误的，认为现时中国革命是“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大会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十项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大会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认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但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当前“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指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底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是背叛劳动群众的利益。大会着重批判了盲动主义，指出盲动主义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只有消除极“左”的错误与情绪，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有成效。党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但尤其要反对“左”的弊病。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理”；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

大会对军事工作很重视。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党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罗登贤、彭湃、毛泽东、任弼时、李立三等二十三人。随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上列前七人为政治局委员。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全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但他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全会选举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为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个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各种反革命力量都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这就不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利

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大会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大会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六 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六大”再次指明：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是使革命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陈独秀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取消主义的立场，并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结合在一起，形成托陈取消派。

一九二九年夏，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写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他认为新军阀们不是代表地主豪绅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中国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的时期。因此革命时机的到来遥遥无期。他要中国的托派等待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只有那种危机“将成为革命的新的推动力”。在当前只能“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选举而产生的）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这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斗争。

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他连续写信给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反对中国革命。他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说成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南京政府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完全歪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充满了悲观情绪，说什么革命高潮何时到来，“没有人能够预言”。陈独秀要求全党展开争论。但在中共中央未答复之前，他就将信的内容在一些人中公开宣传，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针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观点和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于十月十五日做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说：照陈独秀所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它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在政治上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这就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是“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取消派既然肯定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否定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们就“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决议从政治上批判了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根本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否则就要开除出党。

在中央做出决定以后，陈独秀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因而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其同伙彭述之等人的决议。

共产党同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当时的党中央在反取消派的斗争中，在正确地坚持了革命的大方向和基本政策之外，在许多方面是用“左”倾的错误思想和政策批判取消主义的，因此不能完全正确地解决问题。

陈独秀在受到批判之后，公开亮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并且在组织上也与托派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共同签发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这个长达万言的纲领中，陈独秀等人继续坚持错误观点，攻击党的路线、方针，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辩解。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正式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书记，出版《无产者》。陈独秀在《无产者》第二期上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攻击共产党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是“出卖中国工人运动”，断言工农红军只能或被统治阶级“击溃”、“收买”，或“因自己内哄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同梁干乔、区芳、宋逢春等人的“我们的话”派，刘仁静、王文元等人的“十月社”，赵济、刘胤等人的“战斗社”，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委员会”，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或“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决定发行刊物《火花》，选举陈独秀、彭述之、王文元、宋逢春等为委员，陈独秀任书记。

中国的托派是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政治派别。它同时也反对国民党，所以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托派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即遭破坏，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逮捕。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彭述之也被捕入狱。中国的托派遭到很大的打击。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混战

一 国民党军阀在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上的争斗蒋桂、蒋冯、蒋唐战争

国民党军阀对奉系军阀的战争刚一结束，蒋冯阎桂四派之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这四派的斗争是围绕着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展开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军阀进入北京时，蒋冯阎桂四派所占地盘如下：蒋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一带；冯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阎占有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和平津两市；桂系李、白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对这样的地盘分配，冯玉祥最为不满。冯虽然地盘很大，但多是贫瘠地区。冯又认为他在对奉作战中出力最大，河北和平津应划给他，但在四派进入北京前，蒋就决定把这一省二市交给阎。冯对此十分不满。桂系李白认为自己地盘小，又没有出海口，也不满意。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占据了河北和平津，这一点他很满意。但他要把平津两市的税收全部据为己有，却为蒋所不满。阎虽主要倾向于蒋，但他更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蒋冯双方争取的对象，以便从中捞得更大利益。四派在地盘分配问题上勾心斗角，但斗争一时还没有表面化。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蒋、冯、阎、李等在北平小汤山开最高军事会议，除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外，还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编遣”全国军队。根据这一决定，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南京召开了军队编遣会议。会议通过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其中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全国划分六个编遣区，分别编遣一、二、三、四集团军和东北、西南各部队，中央直属部队和海军由中央直接缩编；全国陆军最多不超过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各省划分绥靖区，分驻各师旅。会议期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蒋冯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冯则以种种理由企图少遣多编。冯提出一个有利于第二集团军的编军方案，但被蒋阎否决。冯便装病不再出席会议，二月初离开南京回河南。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谈判桌上解决不了问题就诉之于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首先爆发蒋桂战争。战前，蒋桂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蒋为了制桂，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同时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鲁反桂。桂系便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将鲁免职，并进攻长沙。三月二十五日，南京政府下令讨桂，蒋桂战争爆发。由于被蒋收买的桂军一部在前方倒戈，桂军仓皇后退，在鄂中鄂西一带被包围、收编。到四月桂军完全失败。六月初，桂系的三个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战后蒋的势力伸入两湖。

蒋桂战争刚结束，蒋冯战争又在酝酿。冯本来答应同桂系联合反蒋，但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四七页。

在蒋桂兵力相等、胜负未定的时候，他采取陈兵以待、观望战局的态度。桂系败后，蒋冯两军的对抗便紧张起来。冯集中兵力，令其部下通电讨蒋。五月，冯正在积极备战的时候，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等被蒋收买，叛冯投蒋，给冯一个沉重的打击。阎也通电促冯下野。冯见形势不利，只好宣告下野。但因此对蒋更加仇恨，反蒋之心更迫切。

正在冯极端忧愤的时候，阎约他到太原去休养，并向冯表示要合作对蒋。冯为了拉阎亲至山西。六月，冯一到山西就被软禁起来。阎的意图是把冯掌握在手，由自己左右北方大局，作为与蒋抗衡和对蒋要挟的一种手段。同时阎又向冯表示愿意联合出兵反蒋。十月，冯系将领宋哲元等通电反蒋，蒋调大军应战。这时阎却按兵不动。冯军由于内部不和很快失败，十一月退回陕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蒋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挂出“护党救国军”的招牌，进攻广东。蒋派何应钦率军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是第二次蒋桂战争，或称粤桂战争。

同月，驻郑州的唐生智（蒋桂战争中为蒋起用）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参加“护党救国军”，举兵反蒋拥汪。不久被蒋打败。

一九二九年内爆发的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均以蒋派军阀势力的胜利告终。但是军阀内部的矛盾依然很尖锐。新的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酝酿着。

二 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至十月，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阎锡山看到李冯两支势力均被分化和打败，自己成了蒋将要打击的主要目标；同时因为李冯被蒋打败，自己俨然成了反蒋派系的首领，打倒蒋的意图更坚定了。阎囚冯，冯系将领非常不满，暗中同蒋勾结，准备对阎发动战争，蒋表示支持。阎见对冯再软禁下去于己不利，便向冯表示愿真诚合作，共同倒蒋。一九三一年三月冯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部队。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初被排挤出国以后，屡次策动反蒋，都没成功。他看见冯阎同蒋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很想利用冯阎的兵力反蒋。冯阎也想利用汪在政治上和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扩大反蒋的政治力量。桂系在蒋桂战争失败后，穷促于广西一隅，极想倒蒋扩大地盘。西山会议派正处在穷途潦倒没有出路的时候，也想借反蒋之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阎冯李各派军阀、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政客，便互相联络，一度形成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大联合。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发出逼蒋下野通电，要他“以党政还之国人”。四月初，阎和冯李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副司令。五月初，阎冯举行郑州会议，作了具体的战争部署。同时蒋也完成了军事部署。五月中，蒋下了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大战开始后，冯阎由陇海、津浦、平汉三路进攻，以夺取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陇海路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两路是它的两翼，双方都把主要兵力用在陇海路方面。

五月中旬，冯阎、蒋两军混战在豫、皖、鲁、苏交界地区展开。由于阎军一部叛阎投蒋，阎军后撤。蒋军攻到兰封。接着冯军投入战斗，冯阎发动新的攻势。蒋军全线动摇，后退到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蒋在军事上吃了败仗，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蒋的形势十分不利。六月中旬蒋提

出停战议和，冯阎不理。

陇海线激战时，平汉路蒋军为了牵制冯军，在漯河以北发动攻势。六月上旬桂军攻占长沙岳阳（八月又退回广西）。冯军配合作战发动进攻，蒋军纷纷退到漯河以南。

六月下旬阎军攻入济南，进攻曲阜。七月底蒋军反攻，阎军节节后退，损失惨重。八月中蒋军复占济南。阎要求冯发动新的攻势。冯在陇海线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八月攻势。冯的企图是一举攻下徐州，打通陇海津浦两路，与阎军会师。这一仗如能胜利，至少大江以北蒋军无法立足，也可能蒋集团因此而崩溃。故冯下了最大的决心，集中了大部兵力。在冯军猛烈进攻下，蒋军纷纷后退，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亳县等城。这时恰逢大雨，冯军作战十分困难，每攻取一地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冯军屡经激战，官兵非常疲劳，粮弹又得不到补充。冯军在陇海线以南虽有进展，而阎军进展迟滞，不能与冯军的攻势配合。因此，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蒋军溃乱的阵线得以稳定下来。冯的作战目的归于失败。这时阎军已退到黄河以北。至此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冯阎联军由主动转为被动，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蒋军在津浦线的压力减轻以后，以重兵加强平汉线，意在截断冯军退路。九月上旬从平汉线分兵向西北，进攻登封、洛阳。

反蒋派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斗争同时进行。与中原大战酝酿和交战同时，扩大会议也在筹备和举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汪精卫由香港派陈公博等到北方接洽。正值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陈邹与阎会商的结果是请汪北来。但汪精卫改组派同西山派为争夺权利，斗争极其激烈。在其他各派平息内争、共同对蒋的要求下，汪于五月提出：首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中枢”，然后由这个扩大会议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和“国民会议”。这个主张得到各方赞同。七月下旬汪抵平。八月，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多次，通过了宣言，选举了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扩大会议推阎、汪、冯、李、谢等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九月九日阎汪等就职，冯李也各在所在地宣布就职。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和阎、汪、冯等都极力争取东北的张学良。张一直采取观望态度，最后决定倒向蒋方。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二十一日占天津，二十六日占北平。阎汪退到太原。整个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东北军进关前几天，阎军已向黄河以北撤退。阎汪都失去坚持下去的信心。但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对蒋作战，把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与阎军协力，挽回战场上的颓势。他对退保西北没有采取可靠的措施，防守洛阳的兵力过于单薄，不足以确保洛阳到潼关的交通线的安全。当阎拒绝与冯协力作战时，蒋军在九月中旬已经攻至洛阳附近。冯军退路已断，大军只好纷纷退往豫北。十月六日蒋军占郑州。冯军全部崩溃，大部投蒋，一部分被东北军改编。阎军也被东北军改编。阎仍保有山西地盘，冯则全军覆没，地盘全丢。十月二十三日冯宣告下野，阎则躲到大连去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蒋战争完全失败。

奉军大举入关后，扩大会议由北平移至太原举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汪为了掩盖争权夺利的本质，打着主张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幌子，炮制了一个《约法草案》，于十月下旬由扩大会议通过并公布。接着许多与

会分子纷纷逃离太原，扩大会议烟消云散。

经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几次混战，特别是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中原大战后，冯的军队全部被消灭，阎又龟缩到山西，桂系仍退回广西。从此他们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和实力。蒋则在各派军阀中居于显然的优势。奉军乘机又一次把势力伸入关内。

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中原大战中，壮丁死三十万，伤者不计其数。军阀混战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三 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

一九三一年十月，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时，蒋对阎冯军事上的胜利已经确定，他此举的目的是要剥夺汪、阎、冯反蒋的借口，给他的统治制造法统上的根据；同时也是为了确定打败阎冯后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致开会词。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英美的民主主义，公然主张法西斯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断言”中国“无需乎此”。英美民主主义“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就会产生“纷乱”。适合于中国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蒋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在蒋介石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正符合蒋介石集团企图消灭共产党、打倒异己军阀的政治需要。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公开叫嚣，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新药方。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国民党《训政纲领》的具体化。它们的反动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中心内容是加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效能。《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按照这个规定蒋记国民党中央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

会议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巩固和平统一，声称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客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的。但这里主要是针对前两者。该案中说桂系和阎冯等军阀“虽相继叛变，卒均次第消灭”。“相信自兹以后，必无人敢冒天下之不韪，以破坏统一，为国人之公敌”。保障和平统一为“今后之最大任务”。蒋集团申明决心消灭异己的军阀，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会议确定当前最急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蒋记国民政府向会议提出了《剿灭赤匪报告书》，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叫嚷：“国民政

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打败阎冯后，蒋介石已把围攻红军做为重要任务。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决定大规模地进攻红军，从法制上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是一次极重要的反动会议。

第四节 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土地革命和红军反“围剿”战争

一 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赣南闽西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进入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湘赣两省敌人集中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发动“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和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主动出击，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部分队伍守山。

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月中，与敌军战于大庾，红军失利。于是沿赣粤边、赣闽边转战到吉安、兴国一带。这中间曾与敌人交战数次，均未取胜。但士气仍很旺盛。二月中旬与敌军激战于宁都瑞金交界处的大柏地，大败敌军，活捉敌团长二人，俘获人枪各八百余，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接着，红四军转移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休整。这时得知井冈山已失守，乃决定去闽粤交界处游击。

闽西龙岩、平和、永定、上杭等地，一九二八年曾发生过多次武装暴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基础。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首次入闽，在长汀县的长岭寨歼灭土著军阀郭凤鸣部两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乘胜占领了长汀城。四月初，红四军转入赣南，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形势，在赣南的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

五月中旬，在闽西地方党的积极配合下，红四军二次入闽，解放上杭、龙岩、永定地区。六月十九日，第三次攻克龙岩城，消灭另一土著军阀陈国辉部二千余人。九月，再克上杭，消灭闽西第三个土著军阀卢新铭部一千余人。至此，以杭、岩、永为中心的闽西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到一九三一年初，闽西区已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三月十八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五月，闽西地方红军编为红十二军。

一九三一年初，红四军大部自闽回赣，连克广昌、永丰、南康、信丰，使赣南红区打成一片。同时，罗炳辉领导了吉安、吉水、峡江、泰和等八县的保安队起义，加入红军，进一步扩大了赣南根据地。一九三一年春，江西苏维埃政府在东固成立，并把当地武装编为红三军。

一九三一年六月，以红四军为基础，红三、四、十二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各军负责人是：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罗炳辉代），政委谭震林。此时，赣南闽西区已有十七个县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

湘鄂赣区一九二八年三月平江“扑城”后，反动派进行了疯狂镇压。五月，何键派湖南独立第五师前往“清剿”。这时共产党人彭德怀任该师一团团团长，黄公略任三团三营营长，贺国中任师随营学校大队长。赴平江之前，彭等即已开始酝酿起义，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七月初，湖南省委派滕代远来平江，参与策划起义事项。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率第一团官兵誓师起义，随即占领平江县城。二十三日，贺国中率随营学校学员到达平江。黄公略率三团三营官兵亦赶往平江，但当部队接近县城时，因反动分子的煽动该营又叛变而去。二十四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

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便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平江、浏阳、通山、通城、修水、铜鼓、万载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中旬，成立湘鄂赣边界党的特委，以王首道为书记。十一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五个大队（连）开赴井冈山，黄公略率六个大队坚持湘鄂赣区的游击战争。十二月十一日，四、五两军在宁冈地区会师。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后，井冈山遭到十几个团敌人的围攻。红五军以不足千人的兵力阻敌数日，表现了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众寡悬殊，最后不得不撤离井冈山。红五军冲出重围，转至赣南，四月与红四军会师瑞金。两军会师后，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此后，红五军主力转战于湘赣、湘鄂赣两个地区。九月，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分别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浏阳、万载、萍乡地区；铜鼓、宜丰地区；湘赣边苏区；阳新、大冶、通山地区。一九三一年，湘赣区与湘鄂赣区联成一片。七月，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一纵队扩编为红十六军，红五、八、十六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第五军军长邓萍，政委张纯清；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后改袁国平）；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委于兆龙。

闽浙赣区弋阳、横峰起义后，方志敏、邵式平等率领新成立的土地革命军退到两县交界的磨盘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春，敌人实行“搜山清剿”，游击地区逐渐缩小。六月，方志敏在方胜峰召开弋横两县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埋枪解散”的动摇情绪，坚定了部队斗争意志。会后不久，取得金鸡山大捷，粉碎了敌人对赣东北根据地的第一次进攻。随后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团。接着，又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十二月，成立包括弋阳、横峰、上饶、万年、德兴、贵谿、玉山、余江等八县的信江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冬，共产党领导了闽北崇安的农民起义。一九二九年四月组成闽北红军独立团。

一九三一年夏，赣东北红军攻克景德镇，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皖浙边，红军扩充到四千余人，成立红军独立师。七月，闽北独立团集中到赣东北，与红军独立师合编为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八月，成立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奠定了后来闽浙赣区的基础。

鄂豫皖区鄂东黄麻起义后，留下的工农武装于一九二八年初转入黄陂的木兰山中，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四月，返回起义地区，在黄、麻、光（山）边界，辗转游击。五月，部队进入光山县界的柴山堡地区，开始建立游击根据地。七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三十一师胜利粉碎敌人三次“会剿”，并乘胜发展，扩大割据地区，建立了鄂东北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共产党在河南商城发动起义，组成红十一军三十二师，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商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开始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又在安徽六安、霍山发动起义，组成红十一军三十三师，开始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统一领导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红军集中编为红一军。五月，红一军乘蒋冯阎中原混战之机，大举出击，使根据地扩大到二十余县，三个地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

地。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军与红十五军（湘鄂赣区红八军一部扩编而成，一九三一年十月由鄂中进入鄂豫皖）合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

洪湖湘鄂西区一九二八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受共产党中央派遣来到监利县境，会合了贺锦斋、吴仙洲、邓赤中和彭国才等领导的三支游击队，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参加了由地方党发动的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队伍很快发展到近千人。不久，贺龙、周逸群转到湘鄂西桑植、鹤峰一带活动，革命军大部失散。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洪湖一带的共产党人段德昌、段玉林等亦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展开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到达桑植，利用亲友、旧部的关系，很快组织起三千人的武装，并进占桑植城。四月，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周逸群转至沙市，组织鄂西特委，在洪湖地区开展工作；贺龙则率余部进入湘鄂交界的高山丛林中坚持斗争。至一九二八年底和一九二九年春，部队经过整顿，重新获得发展，相继攻克建始、鹤峰、桑植等县城，使湘鄂边根据地初具规模。工农革命军编为红军第四军。

在洪湖地区，由段德昌、段玉林领导的两支游击队，到一九二九年各发展到数百人，一九三一年春合编为红军第六军。红六军成立之后，采取逐步推进方针，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汉川等城镇，后又渡江南下，打下华容、公安等地。

一九三一年春夏，贺龙根据党中央指示率第四军东下洪湖地区。七月初，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公安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两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后改邓中夏）。二军军长贺龙兼，政委朱勉之；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会师后，又在汉水以北发展了根据地，并使洪湖和湘鄂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广西右江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共产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派干部回广西恢复工作，六月成立广西省委。一九二九年夏，党中央又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来广西，由邓小平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当时，蒋桂战争已结束，桂系黄绍竑被逐出广西，新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编遣区主任李明瑞，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当地农军在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全军五千人。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二月，李明瑞、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起义后成立工农红军第八军。不久，红八军被敌人打败，余部退入贵州，后并入红七军。

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调，留韦拔群等率部分队伍坚持当地斗争。不久，根据地被敌占领。韦拔群于一九三二年牺牲。红七军主力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到达中央苏区的兴国，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除以上几个主要地区外，在广东海陆丰，一九二八年初成立了红军第二师和第四师，建立了海陆丰根据地。根据地丧失后，红军进入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后发展为红十一军。在海南岛，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了红军第三师，开辟了陵水、万宁两块革命根据地。遭敌人镇压后，部队转入母瑞山中

坚持斗争。一九三一年夏，又成立起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

从一九二七年秋冬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逐渐走上了以农民为主力，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到一九三一年，农村红色政权已分布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许多省份，红军发展到十万人，枪约六万支。中国革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二 古田会议和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于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红军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红军的主体和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红军成员中还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彻底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军队的影响，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四军内，突出的错误思想是：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愿接受，主张军事领导政治，习惯于“长官说了算”；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喜欢“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正式红军的路线，主张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反对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实行军阀主义，打骂现象很严重；以及不注意纪律和极端民主化等。对这些错误思想如何解决，干部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认真总结经验，解决红军建设问题，提高红军的政治质量是个迫切任务。

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不久，前委决定红四军二、三纵队去闽中打击土著军阀部队。在打了两个胜仗之后，又退回闽西。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军乘粤桂军阀发生冲突之机到东江活动，但仗没有打好，再退回闽西。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和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红四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削弱，广大干部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来。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对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除作了口头指示外，还于九月二十八日代表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书面指示信。

中央指示信首先对国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都未解决。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和军阀们对地盘与饷源的争夺，推动着军阀混战危机的加深。红军要充分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肯定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和“伟大意义”，今后“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指示信还指出，红军与群众组织不同，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军中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对一切问题，前委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

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做了分析，指出这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造成的，“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最后要求“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中央还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中央指示信对推动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对指导古田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它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陈毅把中央指示信带回闽西根据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内容和红四军实际，主持起草了大会的决议草案。大会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期间，毛泽东作了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它强调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决议案强调，在政治上要树立坚强的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在思想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决议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重视思想建设。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号召全军彻底地加以肃清。而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主要的是加强党内的教育。

在组织上，要有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的纪律，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决议案指出要在组织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改善党员质量，严格党的纪律，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和中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使红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从而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古田会议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写了重要的党内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到一九二九年底，中国革命形势已有初步发展，全国各主要革命根据地都在开辟之中。但是革命力量仍然非常弱小，它还只是闪耀在全国黑暗之中的“星星之火”。因此，在革命根据地内，悲观思想不时出现。革命一遇挫折，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是当时悲观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具有悲观思想的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没有建设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他们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针对上述悲观思想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所代表的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错误思想，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路线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甚大的困难，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在这里，毛泽东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之后，进一步阐明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伟大意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尖锐的矛盾，指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必然性。他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党内一些人产生悲观思想，是被敌强我弱的一时的现象所迷惑，而没有从实质上看问题的结果。

三 毛泽东对社会调查的大力提倡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意做社会调查。在大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八年春他做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一九三一年五月写了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及《寻邬调查》。一九三一年一月写了《兴国调查》，同时期还写了其它不少调查材料。一九三三年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它是从哲学基础上、认识路线上、工作方法上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文件。毛泽东在文件中提出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什么要做调查呢？为了解决革命中的问题。对一个问题现状和历史调查清楚了，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因此，不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而是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是要不得的。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我们做社会经济调查，主要的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共产党人必须抛弃思想上的保守路线，采取“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号

召共产党员：“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一九三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寻邬作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他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了的老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提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十月底，毛泽东在罗坊找了兴国县永丰区送来当红军的八个人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毛泽东调查了八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人口、劳动力、生活情况和他们的要求愿望等；调查了这八个家庭在土地革命前、中、后的情况。由此得出关于农村的基础概念。毛泽东调查了各个阶级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调查了兴国县永丰区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商人、游民、手工业工人等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他调查了这个区的各阶级的人口和土改前土地占有比例，以及现在土地分配状况。他调查了解放前贫苦农民受剥削的状况。他还调查了区乡村三级政府的情况和农村军事化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写成了《兴国调查》。他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泽东所做的调查，是调查研究的榜样。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红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经过毛泽东的倡导，社会调查成为共产党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认识路线。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的优良作风之一。

四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正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国际上，从一九二九年秋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遭到严重的损失，大大减弱了他们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力量。在国内，一九三一年五月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围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阀部队大大减少，原来用以镇压城市人民斗争的军阀部队也有很多调到前线。这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到一九二九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一九三一年，全国党员人数（包括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到十二万人以上，产业支部增加到二百二十九个。参加革命工会的工人增加到十一万多人，其中国民党统治区约占三分之一。在上海、天津、武汉、厦门、无锡、哈尔滨等地，共产党还恢复了地方总工会。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向苏维埃区域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以上是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但是，从全国总的情况看，一九二七年以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红军只有

六万多支枪，根据地还很小，白区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因此不可能马上打败强大的敌人。

就在这时，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样，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也在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基本政策等问题上，做了错误分析和规定。

李立三否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极端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方面。他认为新的军阀混战“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就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也不承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

李立三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说“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并为此制定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等“左”倾政策。

李立三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他认为中国革命“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六月政治局会议后，李立三等人制定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的高潮。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李立三在党内强调反对“右倾”，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打击。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使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赣东北根据地。只有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八日乘虚攻占了长沙，但八月五日又被迫撤出。各大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也因为行不通而失败。白区的党和革命组织由于执行冒险计划，受到很大损失。这个期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了七万六千人。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引起共产党内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与反对。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停止组织全

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七人，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七人。这样，就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推行期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也曾奉调北上攻打中心城市。六月下旬，红一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从汀州向南昌进发，七月底，到达南昌附近。八月一日，以部分兵力进攻距南昌三十里的牛行车站，不克，撤军西行，进军长沙。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于浏阳永和市，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随后即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但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中，久攻不下，军队伤亡越来越大，而敌人援军则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认识到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红军还不可能夺取和控制中心城市，于是，在九月十三日决定将部队撤离长沙，由湘返赣，改攻吉安。这是一个审时度势、使红军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重大决策。十月四日，红军一举攻入吉安城，随后占领吉安周围的太和、安福、吉水等县城，使周围红区连成一片。这时，红一方面军已有五万余人。十一月初，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问题。会议最后否定了攻打南昌、九江的主张，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红军撤到根据地内部，待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十二月，红军退到黄陂、小布一带集结整训。这期间，正式接到中央批判立三错误的通知。

五 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八七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决定用革命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此，土地制度的革命进入实施阶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其中规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由苏维埃政府“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这里确定了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公有、农民使用两条基本原则。土地公有的原则是不适当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在《政治决议案》中也有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规定。这些决议案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正确地指出“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主要内容”。规定：“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土地革命中“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关于富农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富农“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应根据富农的政治态度决定对待他们的政策。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时，“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要“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六大”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和未弄清的问题。

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都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规定，经过实践摸索，各根据地都形成一套进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初，是发动群众打土豪，为分田做准备。一九二八年二月新城大捷后，宁冈大陇等地开始进行分田。五月，湘赣边界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如何深入土地革命的问题。六月龙源口大捷之后，边界出现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办法是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依党中央办法改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土地革命进行了一年之后，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三种方法分配之：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分配给农民共同耕种；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土地分配后一律禁止买卖。分配土地主要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这个土地法虽然也有错误的方面，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属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但它是第一个土地法，它的制定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到达兴国，在那里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七月在上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随即分配于贫农”。“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势，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后来闽西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由于正确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中，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六十多万人得到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一九三一年初，红四军由闽西到赣南。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批判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阻碍土地斗争的错误，决定一要“分”，二要“快”，端正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方向。二七会议后，赣西南土地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会上通过的《土地暂行法》，曾提出组织集体农场等不适当的政策。八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一个土地法，纠正了五月《土地暂行法》中的某些错误，规定：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需要的贫民使用”；准予在乡居住的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酌量分田；按人口多少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一九三一年春，进一步解决了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在这之前，共产党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大都规定了土地国有、农民使用的原则，禁止土地买卖。结果造成地权的不固定，有些地区甚至三次五次地分了又分，影响了农业生产。斗争的实践使革命领导者认识到确定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重要，于是决定改变土地公有的政策。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指出：“过

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所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信中还说：“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共产党对改革土地制度的认识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个原则对土地革命以及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关系极大。三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件，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即归农民所有。四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中作了同样规定。

以上是中共中央和赣南闽西苏区摸索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过程。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没收对象、阶级路线、分配方法、土地所有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富农问题还没有恰当的解决。

除赣南闽西外，其它各个革命根据地，也都进行了土地革命。

六 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开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介石在结束了对冯阎的战争以后，立即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拼凑杂牌军八个师约十万人，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敌军西从吉安东到建宁布置成一个半圆形包围圈，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办法，由北向南分路挺进。当时红军有主力一、三两个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共三万三千余人，连同二十二军缩编的六十四师，共约四万人左右。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特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军队主力有计划地逐步向南实行“求心退却”，十二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待机歼敌。十二月二十九日，得悉张辉瓒率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进到龙岗，红军立即埋伏在龙岗附近山中。三十日红军发起攻击，全歼张辉瓒师的师部和两个旅，活捉张辉瓒，俘敌九千余人。接着，红军乘胜追击，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在东韶歼敌谭道源师一半。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总计歼敌一个半师，俘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三千支。这时，其余各路敌军纷纷退去。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组织南昌行营，由何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长驱直入”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四月初，敌军二十万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敌军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战线。当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实行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将主力隐蔽在东固附近，待机破敌。五月十六日，红军选择侵入富田一带敌军较弱的两个师，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天战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缴枪五千余。然后迅速由西向东横扫，连连得胜。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到三十一日结束，十五天中，红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富田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

完好地缴获无线电台数部，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军队，以嫡系部队为主力，由他自己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打法，妄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当时红军仍然只有三万人左右，主力还在福建建宁，而且是苦战之后，尚未得到休整补充。面对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强敌，毛泽东提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并决定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指挥红军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根据地西部兴国集中，佯作要北上冲破敌军的防线。八月四日，红军自兴国向东突进，乘夜通过敌军之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转到莲塘。接着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五天之内红军三战三捷，共歼敌两个师又两个团，缴枪万余支。这时敌军主力急忙调头东进，猛扑黄陂，妄图密集包围红军。红军主力则穿越敌军间一个十华里空隙的大山，回师兴国休整。当敌军发觉再度调头西进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而敌军则饥疲沮丧，只得下令撤退。红军乘机追歼敌人。九月初，在老营盘消灭敌军一个旅。九月中，又在方石岭全歼敌一个师。全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先后歼敌十七个多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支。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灭，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赵博生、董振堂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组成红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红一方面军的力量。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其它各苏区也都取得了重大的反“围剿”胜利和发展。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三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限令五月底将鄂豫皖红军完全肃清。“围剿”部队增至十一个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到五月红军又歼灭敌军六千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此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改取守势。鄂豫皖红军趁机发动反击，扩大根据地，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九月，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乘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鄂豫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十二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四、五月，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一带，红军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共三万多人，内生俘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此时，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淝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起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达五万人。

洪湖苏区自红军主力转移后，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至一九三一年春又重新得到恢复。十月，移往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经过反“围剿”战争，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重要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由于敌军

强大，红军弱小，敌军总是企图把红军包围起来吃掉。因此，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防御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分，“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的防御战，经过努力，是能够转入主动的。这就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和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

毛泽东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当敌人举行大规模“围剿”时，红军“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这种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是使红军“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之间的进退、攻守、外线内线的形势。实行集中兵力，就可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被动中的主动。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红军，所以能够屡歼强敌取得赫赫战果，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是红军战役战斗行动的主要特点。由于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和技术贫乏，红军的战争必然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游击性的运动战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最好的战斗形式。红军游击战的基本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走是为了打，逃跑主义是错误的。

红军作战必须速战速决。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红军总的情况是数量少、补充困难、面对的敌人比较密集，因此必须在战役和战斗上力争速决，旷日持久就要失败。只有每一战役每一战斗速战速决，迅速歼灭敌人，才能支持战略的持久战。

红军必须善于打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敌军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从物质上人员上给红军以补充。红军力避打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伟大发展。它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七 王明的《两条路线》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三一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是全会和全会以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因此，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未能得到纠正。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又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一九三一年，王明（陈绍禹）等人陆续从苏联回国。王明因反对《新的

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受到处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九、十月间王明写成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这个小册子在他们夺取党的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纲领作用。《两条路线》提出了如下错误观点：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即批评李立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因而没有能够更急迫地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王明认为这是李立三的右倾，是“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承认“第三派”或“中间营垒”的存在。他说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营垒，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说：“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这是王明从革命性质问题上给极“左”思想以理论上的解释。他指责李立三不反对资产阶级（事实并不如此），认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同李立三一样把反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因此王明强调宣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土地国有，要在工业农业方面“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要在经济政策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在“左”的词句下，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是“‘左’表右里”。他抨击李立三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和意义，因而“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这样王明反右倾的气焰就更凶了。

他否定广大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努力，否定实际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说“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他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在小册子的末尾王明狂妄地提出：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无效。“根本改造党的领导”，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在全党“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这次会议，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把王明的错误观点写进了决议，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以“国际路线”作掩护，具有较多的马列主义词句的伪装，因此危害更大。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等人，并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了一直在白区坚持斗争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派夏曦至洪湖根据地，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接着又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

五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否认中间派别的存在，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红军工作中的“积极进攻”方针。强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发动罢工、罢业、罢操，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以纪念五卅运动。这个决议表明“左”倾机会主义已在实际工作中贯彻。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内还发生过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罗章龙开除出党。

第五节 中间政派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

一 第三党的“平民革命”

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的统治，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在这个专政下面的全国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在大买办地主阶级的军事专政面前，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法的，就是大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是不合法的。然而这些正是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和改良主义得以出现的政治背景。

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革命洪流，曾把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以及一些投机分子卷了进来。但是正当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蒋汪的两次叛变，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顿时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阵营发生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主要斗争形式是用武力推翻国民党。一些参加过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的在革命高潮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反动派疯狂屠杀的恐慌之中，在革命突遭惨败的震惊之下，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不满意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权的垄断及其内外政策，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同时又从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得出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错误结论。他们主张走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间派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他们的政见，进行实现本阶级政治要求的活动。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前夕，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共产党个别领导人之间，就曾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这个主张当然被共产党所拒绝。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苏联，后又到欧洲考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朗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组织。一九二七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形成后最早采用的名称。该党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一九三一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回国。八月召开十个省区负责干部会议，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政治主张》的决议。邓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

《政治主张》是第三党的纲领文件。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它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新约；

在“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前提下，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是：改良工人的生活，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第三党十分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它的土地政策是：“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是：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国家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有土地和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同时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将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第三党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和建立“平民政权”的主张，但具体怎样进行呢？它的领导人设计的基本方案是：被压迫人民经过各种职业（农工商业）及准职业（学生、妇女、兵士、警察等）团体团结起来，“自动去开国民会议”，“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面前，要实现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邓演达也曾提出建立“平民革命军”的问题，但他并不是从革命群众中去建立，而是寄希望于那些“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的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这是说要凭借邓的影响把蒋军军官拉过来，去组织“平民革命军”。

邓演达一面倡导平民革命，一面却又反对真正代表工农民众利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含有不少对共产党、对工农红军、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之词。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的。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和南京政权的横暴贪污的政策，都是“毁灭农村”。共产党政权与南京政权“互相依存”，第三党要把二者都消灭。邓演达反对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烧田契、铲田界”的斗争，认为这“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爆烈，而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只有按照第三党的方案，采取“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方法。而实际上，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第三党的方法恰恰是行不通的。

由于邓演达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被蒋视作眼中钉。一九三一年八月，邓被逮捕。十一月，蒋把他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蔽的活动。

二 改组派“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活动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见《邓演达文集》，第三七五页。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邓演达文集》，第三一一页。

邓演达：《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同上，第二七三、二七一页。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同上，第三八——三九页。

原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陈公博一派，本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准备在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中占据主要地位，可是结果却受到其他派系的排挤，不但大权没有到手，而且竟被南京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被迫躲往国外，陈公博等人避居上海租界。但他们并不甘心就此沉寂下去。为了同国民党中央掌权集团争夺权力，汪陈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号。汪陈等人是一批投机政客，但他们提出的若干主张，却迎合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愿望，因而能够在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一个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改组派的下层群众是一批处在彷徨苦闷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职员。他们是改组派得以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先后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革命评论》共出十八期，影响颇大。如何改组国民党呢？陈公博提出：要“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

施存统著专文论述“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主张复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照陈公博的说法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法治”；“扫除政府机关中之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肃清军阀割据”；“实施革命的民权”；“积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有条件的与苏俄恢复邦交”；“建设国家资本、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等。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

对第三党、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及北洋军阀时期遗留的各派系，改组派也说要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

一九二八年冬，陈公博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设在上海，由汪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组成，具体工作由王乐平负全责。会员曾达到一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已经重新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并正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强个人独裁。对待改组派，蒋介石采取排斥和镇压的政策。因此改组派的人们便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内，各地改组派，特别是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改组派，反蒋活动十分活跃。三月，改组派掀起反对国民党中央圈定指派“三中全会”代表的浪潮。“三中全会”处分了汪精卫等人。五月，改组派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号召“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的蒋介石”。宣称“继续反帝国主义”，“继续反新旧军阀及封建势力”。这年冬，乘张发奎与桂系联合举兵反蒋的机会，江苏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改组派的刊物《民意》等，还曾代表东南沿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出反对南京政府增加捐税的呼声，指责国民党政府执行的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十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出版。

见《革命评论》第五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出版。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

《中国国民党革命大同盟成立宣言》（一九二九年五月）。

政策不是“民生主义”，而是“民死主义”。

改组派的活动，遭到蒋介石的严厉镇压。改组派的刊物《革命评论》、《前进》、《民意》、《中华晚报》等，相继被查封。设在上海的大陆大学和改组派的领导机关先后被封闭。南京改组派多人被捕，改组派负责人王乐平于一九三一年春在上海被暗杀。这样，改组派在各地的基层活动全部陷于停顿。此后，主要就剩下一些上层分子利用改组派这块招牌，同蒋介石进行争权夺利的活动了。

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中原大战进行当中，汪精卫同冯玉祥、阎锡山、西山会议派在北平召开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属于改组派的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平、沪等处改组派上层分子纷纷前往参加。但是仅仅两个月，随着阎冯军事上的失败，扩大会议也就烟消云散。汪陈先后出国，并发表解散“改组同志会”的宣言，其他上层分子重新寓居到津、沪的租界去。改组派宣布瓦解。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又有反蒋各派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另一个“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汪精卫重新搜罗各地原改组派分子一百余人前往广州参加，但这件事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与蒋介石达成权力分赃的协议。随着汪蒋的合流，改组派的上层分子都进入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取得了一官半职。

三 人权派的“争人权”和反对暴力革命

二十年代末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派”，也被称为“人权派”。

一九二八年十月，国民党公布了《训政纲领》。在训政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少数人对政治权利的极端贪婪的垄断。因此引起一部分在野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罗隆基等，非常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时认为扼杀民主奉行独裁并不利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他们经常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指责国民党的弊政，“希望国民党的反省”。他们要在革命“大火”燃烧的时候，为统治者“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他们出版刊物《新月》，宣扬自己的主张。

在《新月》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上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国民党没有“保障人权”，提出“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接着罗隆基在《新月》二卷五期（一九二九年七月出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提出要发动一个“人权运动”，“争回人权”。他们所要争的“人权”，无非是仿效欧美资产阶级，主张“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民应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之类。罗隆基还提出所谓“专家政治”。他说“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他把“国家一切行政官吏的选用，应完全以才能为根据”，列为“必争的人权”之一项。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胡适写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发表在《新月》

胡适：《人权论集·小序》，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二卷第二期。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期。

二卷十期上。该文是经过集体讨论，作为表达新月派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而发表的。他们声称“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也称“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都“不在内”。新月派标榜：“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如何建立这样的“新国家”呢？他们主张走“演进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他们反对“有主义的革命”、“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说革命只能是“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因此，他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反共是胡适、罗隆基等人议论的主题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罗隆基在《新月》三卷十期发表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是他们鼓吹所谓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罗隆基说：国共相持的结果，只会造成“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为中国人民求生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罗认为，军事的胜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剿共铲共的策略”，是“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他说，只要做到两条：“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那么，“共产学说”在中国就不能立足，共产党也就“不剿自灭了”。

总之，新月人权派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他们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但不过是要要求允许他们自由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容纳他们这些专家到政府中去做官，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得到一些改良。但就是这样的主张，也为独裁者蒋介石所不许。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罗隆基一度被捕。胡适的言论也曾受到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指斥。

第二章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 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起伏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

一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东北三省的沦亡

一九二九年秋，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卷入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是破坏力空前巨大的世界性危机。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交织在一起，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二千五百亿美元的损失，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银行信贷系统陷于瘫痪。危机使四千多万工人失业，几千万农民破产。

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为了摆脱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镇压革命，对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进行恐怖统治和残酷压榨；另一方面加紧对外的侵略扩张，准备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更残酷的掠夺。于是，德国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世界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就开始了。甲午战争之后，它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最后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七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一九三一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一九三一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破坏性很大。垄断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同日本政府结合在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千方百计地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恶果，转嫁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中小企业主身上。据统计，一九三一年工人失业者达三百万。农民生活十分困苦。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群众的生活也动荡不安。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充满着不安和反抗。面临着这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来医治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为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大造舆论，并大规模地扩军备战。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军费开支增为四亿五千多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它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大量输入军事物资，建立了一支以近代武器装备四平、凤城、安东等城市。九月侵占了辽宁（除辽西）、吉林两省。十一月占领黑龙江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军侵占锦州。至此，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

《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时事月报》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版。

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和全国各阶级，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二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危机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方面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召开了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九月二十六日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参加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九月二十八日，北平各界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的有二百五十多个团体，约二十多万人。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定外交方针，认定日本为目前中国最大敌人”，实行“对日宣战”，在全国“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抗日义勇军”，“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二十三家日资纱厂工人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日本商号的店员和私人雇用的佣工也纷纷离去。十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工人纷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十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其它各地的职工也都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

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九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学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九月二十五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和教职员电国民党政府，谴责政府和军队“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九月二十七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成立全国的反日运动联合会，作为全国反日帝国主义的总机关”，“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各地学生还纷纷向各地方政府请愿，并派代表或结队赴南京请愿。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学生派出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请愿的学生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捣毁了他的办公室。十一月，南京国民党第四次全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三卷第八章，第二——三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三卷第八章，第三页。

国代表大会通过紧急动议案，“请蒋速北上，收复失地”。蒋介石也诡称“个人决心北上”。消息传出，南京及全国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人。十二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各地学生乃改请愿团为示威团纷赴南京示威。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被军警包围，学生被打伤三十余人，被逮捕一百八十五人。七日上海各校学生一万五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大学生，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九日上海学生上万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抗议国民党特务绑架由南京来上海报告情况的北大学生代表，迫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释放了北大学生代表，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捣毁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示威团二百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正在开会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推为代表与学生相见，学生殴打了陈蔡二人。十七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和南京学生共三万多人，联合举行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珍珠桥时，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当场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杀害，一百多名学生受伤。当夜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以武装押送各地学生返回原地。这就是南京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各地纷起抗议，上海学生工人和市民抬着死难烈士的棺木举行了十万人的示威游行。

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起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八。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抗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写了《沈阳事件》一文，就日本侵略中国一事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说：“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我们希望有个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来暂时负担国事，做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这里，一八七一年法国的国防政府是个前例”。十月中旬，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了他的“两大救亡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九一八”后，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裂和动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军向黑龙江进犯时，黑龙江省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抗战，给进犯的日军以重创，成了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国各地纷纷捐款援马抗日。同年十二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上述形势，冲击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时，国民党内各派军阀政客的分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都乘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击。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九一八”后，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

罗隆基：《沈阳事件》，第一五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王造时：《救亡两大政策》，《荒谬集》，第二十页。

力逼蒋下野。九月下旬，宁粤双方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开始举行谈判。粤方同意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但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蒋介石必须“通电引咎，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第二，必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调与粤方有历史关系的十九路军进驻上海及京沪铁路沿线。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双方代表在上海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蒋介石下野问题仍是争论的中心之一。会议最后议定，双方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在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一切提案，并改组政府。十一月南京和广东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粤方举行的大会上，倒蒋气氛愈加浓厚，会议通过议案：“必须蒋中正践言实行下野，并解除兵柄，如蒋不下野，则在粤组织中央党部”。有人甚至动议“永久开除蒋中正、张学良党籍”。

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咄咄逼进下，蒋介石考虑到对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林森孙科等就职，广东通电取消在粤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组成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国民党内部更趋混乱。胡汉民、汪精卫滞留香港不肯赴京，桂系、粤系军阀仍然各霸一方。广东陈济棠提出西南五省“大团结”的倡议，企图乘机扩大地盘；蒋系的何成濬则发起九省“联防”的计划，与陈对抗；张学良也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军阀政客相互争斗，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一二八上海抗战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其目的是借此转移国际上对它侵占我国东北的注视和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违背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仓皇宣布迁都洛阳。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工人和广大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斗争。上海总工会发布了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在上海的日本工厂、商店、机关和住宅工作的中国工人、职员、雇员等都实行了罢工或离职。全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巨大的捐献运动和支前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起捐制棉衣，五天内就制成三万多套，送至前线。抗战期间，国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款项达七百余万元。上海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协同十九路军作战。

由于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和强有力的支援，上海抗战取得重大战果。到二月底，侵沪日军增到十万人，而中国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自动参战的一部分第五路军，总共不足四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却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杀伤侵略军一万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蕴藻浜一处阵

地上六十名士兵，在危急的时刻，全体用火油濡湿衣服，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六十人全部殉国。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重新上台。蒋介石先前辞职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他在下野之前，就为复职做了周密的布置。他本人虽然飞回浙江老家，但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仍为其亲信所把持，不得蒋的同意，军队无法调动，财政也周转不灵。到“一二八”前夕上海局势紧张的时候，蒋的亲信党徒便乘机叫嚷，促蒋复职。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汪精卫赴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达成权力分赃的协议。二十一日，蒋、汪联袂入京。经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一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随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这样，蒋汪合作，重新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筹划结束上海的战争。

国民党政府对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不给以任何实际上的支持，不派军队增援，不给补给。何应钦还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令各部队说：“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国民党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并截留各地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捐款。国民党政府还对空军发出密令：“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国民党政府海军当局甚至与日本海军达成“互不攻击，以维友谊”的协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按兵不动，坐视不援，十九路军伤亡日重。这时大批增援日军开到上海，组成上海派遣军。三月一日，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击，并在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于三月二日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线，撤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三月十四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日双方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军事行动。三月二十四日，中日双方开始正式进行停战谈判。五月五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正文共五条，附件三件。根据协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而不能进驻上海。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应撤退至一二八事变之前驻扎区域，但又规定“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这就是说日本侵略军可在上海驻扎并扩大其区域。除正式协定外，还有三项谅解：（一）中国取缔抗日；（二）中国十九路军换防；（三）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

《上海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正如当时报纸评论所指出：“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因此，这个协定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五月三日，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痛殴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表示强烈的抗议。五月九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代表全中国劳苦群众，否认这一卖国协定，号召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破坏上海抗战，与日本侵略者寻求妥协，一个根本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一二页。

《时事新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七日。

原因，就是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攻红军，消灭共产党。所以，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后来蒋介石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自我供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于是，“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他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因此，他要求部下“专心一志剿匪”，宣布“嗣后若再以北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正是在这样的反动国策下，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而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则不断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夺。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

四 国难会议和宪政运动

在“九一八”后掀起的全国抗日反蒋怒潮中，中国人民中最急进的派别，不只要求抗日，同时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中间派别也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非常不满和愤慨。他们企图在国难深重人民愤恨的情况下，以合法斗争的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内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反蒋派，也标榜民主政治，作为反对蒋介石和获取本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一致呼吁召开国难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救国会议之类的会议，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六十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并连续发表通电，申述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掌握政权，自属于统治阶级，而无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他们要求国民党“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等自由，“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

此后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陆续成立了一批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当时的报纸曾把上述这些活动称为中国的一次宪政运动。

对于上述抗日和民主要求，国民党当权派极力抵制。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召开国难会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內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会议的召集由行政院办理。参加会议的会员“由国民政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聘任之”。

国民党政府召开国难会议的命令颁布后，许多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继续努力，争取借开会之机实现自己的主张。王造时、史量才、沈钧儒、黄炎培、荣宗敬、刘鸿生、穆湘玥、李璜等六十二人提出一项《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对外他们主张：不辞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之完整。为贯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民宪运动之初步》，第一九页。

彻此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对内他们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在宪政未实施以前，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设立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并于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的宪法。

国难会议于四月七日由汪精卫主持，在洛阳召开。原定会员为二百二十七人，到时出席者仅一百四、五十人。主张抗日民主和不满蒋汪把持会议的人，几乎都没有参加。在讨论国内政治问题时，国民党分子张继发言，他说：“现在唯一希望，全国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会议以这个发言做为讨论的终结。这样就把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完全否定了。关于会议要讨论的“御侮”问题，最后做了这样的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这表明国民党政府要坚持现行的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不准人民起来抗日。会议于四月十一日闭幕。

这次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的压制破坏下，如昙花一现，无结果而终。这次会议表明国民党对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是决不肯改变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的。因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错误政策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在日益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

大会还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以及经济政策等重要法律文件。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关于经济政策规定：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实行监

督生产”；保证商业自由，但“严禁商人的投机和提高价格”；对于同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政府不实行垄断，而“实行监督”；“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等六十四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五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领土内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府，它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大会通过的宪法以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都包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

“九一八”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加上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这些构成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形势。这时，共产党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高举抗日的旗帜，在大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同时，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把整个革命大大向前推进。

但是，当时党中央已经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一九三一年月下旬，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王明等人也主张抗日，但对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开始就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反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完全脱离人民抗日要求的口号。他们过分强调“九一八”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因此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它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列起来。

他们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为重要。他们说：“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州的计划”。日本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他们简单地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把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国民党内各反蒋派别，一律说成是“反革命的在野派别”，认为他们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欺骗民众”，“愚弄民众”，“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的崩溃”。

他们看不到“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拒绝“国防政府”的口号。他们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派别。

他们还过分地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错误地认为国

民党统治已经“总崩溃”，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行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全线进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首先胜利”。

他们提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和“民众政权”的口号。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并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一个“左”倾关门主义的口号。他们提出的“民众政权”，实际上还是“苏维埃政权”。他们说：“苏维埃政权是民众政权的唯一形式”。

一二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政策，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利用“九一八”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去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反使高涨的革命运动低落下来。

六 美英对日本的纵容和限制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态度，颇为复杂。他们采取了既纵容又加以限制的政策。

日美两国在争夺中国，夺取太平洋地区以至世界霸权上存在着利害冲突。日本不断扩张其在华势力，企图独霸中国，同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是不相容的。美国资本和势力在张学良执政后日益渗进东北，对东北的投资和贸易不断增长，又损害了日本的利益。日本力图排除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对美国震动很大。九月二十日美国国务院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对事变的发生表示“惊讶”。二十四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命令军队，避免再有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歧见”。总之，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消极的。直至日本侵占黑龙江后又南攻锦州，美国政府才改变其消极观望态度而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同日本对抗的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侵占锦州。一月七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不承认主义”照会，宣布美国不承认被改变了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现状。

英国的态度主要通过它在国际联盟的活动反映出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把事件的解决寄托在国联主持“公理”和“调停”上。国联一开始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只是要求中日双方立即撤兵，避免事态扩大。九月三十日，国联理事会作出决议，以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有确切之保证”为条件，希望日本于十月十四日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并对日本政府声明“无领土野心”予以肯定。日本政府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

博古：《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红旗周报》第二十九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第一页。

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国联对此无能为力。十月二十四日，国联理事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日本于十一月六日以前撤兵，日本投反对票并拒绝接受。十一月二十一日，国联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东北，事实非常清楚，根本用不着调查。国联组织调查团的真正目的，一则在于怂恿日本去进攻苏联，二则企图将东北由日本独占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它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调查团经过半年多的活动，到十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虽然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指出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但报告书总的倾向和主要内容是荒谬的。它诋毁中国，为日本的侵略罪行辩护；它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提议国际帝国主义合作支持国民党政权来消灭中国革命；它“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又不甘心日本独霸中国的东北，也不主张中国收复东北，而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国际共管”反映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也暴露了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控制中国东北的阴谋。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揭露“李顿报告书公开的最无耻的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除国民党的御用报纸外，全国报刊对报告书几乎是一致反对，加以谴责。只有国民党政府和一小撮民族败类，才对报告书表示“同意”。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出席国联的中国代表，对报告书表示原则接受。国民党政策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接受东北“国际共管”原则，微妙地反映了它和英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它既代表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不愿日本独霸东北，又急于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以便集中力量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基本上接受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和建议，并申明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发表通告，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就成了一团废纸。

第二节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强化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

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支柱。蒋介石始终抓住军权不放。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适应蒋介石“加紧剿共”的反革命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国民党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三月，蒋介石重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强化国民党正规军，通令统一编制它的军队为四十八个军，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军队——中央军。并且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办军官训练团、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等办法，来加强这支武装。

除了正规军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建立和加强了反革命的地方武装——保安队。到一九三四年夏，仅八个省的统计，保安队就已有一千七百万人。

蒋介石为了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加强对内部的控制，监视反对派和异己力量，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把他委派但未能到职而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交给陈果夫。陈果夫以反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把他们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团体，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这就是所谓CC的由来。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当上了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二陈的魔掌逐渐伸进各省市党部的组织部和基层组织。从此，国民党内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因此有人把CC解释为二陈的简称。一九三三年初，以二陈为中心成立了“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该会以蒋介石为会长，核心人物有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人。它自成立后即派中央干事到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和作为该会外围的青年组织。各地外围青年组织有北平的“诚社”、南京的“青年社”、上海的“上海协会”等。参加“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党棍、政客、流氓头子和堕落文人。在陈果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党务调查科”。后来扩大机构改称“党务调查处”。“调查科”或“调查处”专门从事特务活动。随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权势的逐渐扩大，“党务调查处”的特务组织和活动也扩大到各省市党政机关、文教部门以至经济机构。抗战爆发后，“党务调查处”更名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国民党蒋介石的另一特务系统是“军统”。“九一八”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使蒋介石感到惶惶不安。为了稳固他的独裁统治，他指使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社长。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又在其内部成立了一个更为秘密的内层组织“力行社”，并决定设立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等。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活动范围起初主要是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后来扩展到其它方面。复兴社设有特务处（以戴笠为处长）和别动队（以康泽为头子），专门从事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系统后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称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复兴社分子曾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吹捧蒋介石。侦查、绑架、审讯、暗

杀、残害革命分子是他们的专门职业。蒋介石把特务组织扩展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去，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造成一种特务恐怖统治。国民党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特务打入共产党、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潜入革命根据地，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在建立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同时，国民党不断强化它的反革命国家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的反革命统治网。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召集所谓“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确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又多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不断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扩大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一步严密控制和监视人民，加强镇压革命，颁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一九三四年更把这一法西斯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国民党政府把一县划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甲。保甲之编组，是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组织依照所谓“管、教、养、卫”的法西斯原则进行活动。所谓“管”，即清查户口，稽查出入境的居民，监视居民言行；强制实行“连坐法”，各户之间相互监视，一户“犯罪”，株连各户；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在规约中强制广大人民承担各种义务。所谓“教”，即进行反革命宣传和法西斯的“党化”教育，灌输反动思想，欺骗、麻痹人民。所谓“养”，即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进行公开的敲诈勒索。所谓“卫”，即组织反革命武装（民团），分区分期实行集训，搜查、缉捕革命者，镇压人民，并组织保甲内青壮年组成壮丁队，修筑碉堡、公路。此外，还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广大人民的一副沉重的枷锁。保甲长多是豪绅地主及其爪牙，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庇护下，私设公堂，鱼肉人民，勒索盘剥，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总之，国民党各级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基层，是一整套法西斯的统治工具。

国民党为了强化它的反动国家机器，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颁布了所谓《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是破坏三民主义”的各种行为都以“反革命罪”论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专为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反省院条例》，根据此条例在南京和各省普遍设立“反省院”。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运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是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或集会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思想者也要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极其野蛮的绞杀革命、扼杀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恐怖法。

二 国民党的法西斯宣传

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除了扩大军事、政治和特务的力量之外，还大力开展文化思想方面的反动宣传，即大肆宣传中国固有的封

建道德和外来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他的反动思想体系。

蒋介石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攻击共产主义，“围剿”中国革命运动。他胡说：“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他诬蔑共产党“毁弃”“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

他说，由于“一般人不讲究固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弄得人欲横流，四维灭绝”，“以致造成今日禽兽般的世界”。“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他打出所谓“复兴民族”、“复兴国家”的欺世惑众的旗号，叫嚣“恢复民族固有道德”。蒋介石大肆鼓吹《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原则”，要他的党徒“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在蒋介石带头鼓吹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孔丘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令全国学校于该日举行“孔诞纪念大典”。八月，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祭孔典礼”。南京的孔诞纪念会由汪精卫、戴季陶主持；曲阜举行“祀孔盛典”时，国民党的各院部均派代表，一律身穿长袍马褂，专程前往参拜。十一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下令各地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额。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各地学校强迫学生读经，如湖南省明文规定从小学起开始读经。广东省编了中小学的《经训读本》。

蒋介石一面鼓吹所谓“中国固有道德”，一面贩卖法西斯主义。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在他的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宣扬法西斯的政治理论。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又开始宣扬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所谓“致良知”就是恢复和发扬人的天赋的道德观念——礼义廉耻。蒋介石把法西斯的“行动主义”搬来，强调“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说什么“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蒋介石还组织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并派送他的儿子和党徒去受训，同时从德国请来大批高级顾问，传授法西斯统治方法。

紧跟蒋介石提倡王学之后，陈立夫抛出了《唯生论》一书。他说：宇宙的本体是“大智万能至微至妙”的“生元”。这个“生元”与上帝是同一个东西，是万物的主宰。陈立夫非常强调“诚”，把“诚”说成“民族生存的原动力”，要救国，“唯一的方法就是诚”。陈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和法西斯的反理性主义。

在蒋介石大力提倡之下，国民党的报刊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叫嚣。如《社会主义月刊》、《汗血月刊》、《汗血周刊》、《进展》等都是专门反共反革命和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介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头目的书籍大量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等，充斥书肆。法西斯党徒叫嚷，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一九三一年五月。

蒋介石：《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蒋介石：《军队教育的要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蒋介石：《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

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

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他们公开反对民主政治，用流氓语言大肆咒骂：“一些政治骗子”“始终用‘民主’、‘宪政’等‘臭脚带’的幌子来蒙蔽民众”。他们猖狂地叫嚷要对全国各阶层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对高级军官施行“精神训练”。八月，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调训军队的高级党政人员，与军官训练团相配合。庐山训练团后来扩充为军政党教人员的训练团。所谓“精神训练”就是向受训人员灌输法西斯主义。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的新生命”，“创造军人的新生命”。而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鼓吹“确定力行主义的哲学信仰”，“不成功则成仁”。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的大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大本营南昌，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蒋介石叫嚷：“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出开展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手段。

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说法，就是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的运动。蒋介石一再强调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他说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但这是表面上的话，他真实的目的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大人民的一言一行，让广大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自从提出新生活运动后，在短短两个月中，接连在南昌作了五次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报告，还炮制了一个《新生活运动纲要》。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总会。国民党的头目和一批反动文人纷纷出动，摇旗呐喊。各地大小党棍以及宪兵、警察也一齐出动，强迫民众“依照准则，切实施行”“新生活”。在蒋介石大力鼓吹和国民党强制推行下，到一九三六年为止，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新生活运动分会的县份，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三个。但是这场新生活运动的闹剧，并没有收到什么大的效果。

为了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封建思想，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四年还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为理事长。十月开始出版刊物《文化建设》，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该刊第一期发表了陈立夫的《中国文化建设论》。陈立夫的文章着力鼓吹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合中西文化的观点。他说中国文化偏重于精神，西方文化偏重于物质。他要使两者作“合理的（中）配合（和）”，形成一种“新文化”。建设这样一种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序言第二页、正文第十页。

《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编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引文均见《庐山训练集》。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须知》，第九、一一页。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须知》，第二四八页。

文化是中国复兴民族的希望所在。他说：“我们要建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再尽量利用科学的发展，以创造人民所必需关于衣食住行之资料，再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这实际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子。

为了扩大反动宣传，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萨孟武等 CC 系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它的内容同陈立夫的文章是一致的。此后一两年间，反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文章，并汇成讨论专辑出版。一二九运动以后，这种反动复古的叫嚣受到了进步文化的有力冲击。

三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外国经济侵略首先是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一九二九年以后，中国进口激增，而出口却大大减少。一九三一、三二两年，入超额达八亿一千万和八亿六千万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各种进口货中，尤以农产品进口增长最快。一九三三、三五两年，大米进口由以前占进口总值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款九百余万元，用作免税进口美国小麦和面粉，称“救灾美麦借款”。一九三三年，又以关、统二税作担保，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用作购买美棉、美麦，称“棉麦大借款”。一九三二、三三两年，中国进口的米、麦、面三种总数均达四千万担以上。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在所谓“改订新约运动”中，国民党政府先后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但中国并未取得关税自主权，也没能改变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状况。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生产。

其次，是扩大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投资（包括贷款）平均每年增长一亿三千万美元，到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资本总额已达四十三亿美元。此时，中国重工业的各部分，如煤炭、钢铁、电力以及铁路运输、轮船航运等，都已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就是中国比较发达的轻工业部门，如棉纺织、卷烟等，外资力量也占了优势。财政金融业，更是处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势力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操纵着中国外汇价格，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外债、保管关税盐税等特权。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在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同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搜刮。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实行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以内战和买办起家的。蒋介石集团抢得政权以后，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连年发动反革命内战。随着内战的扩大，军费开支也跟着扩大，仅据公开的数字，一九二八年为二亿一千余万元，一九三四年为四亿四千余万元，增加了一倍以上。为了筹措军费，国民党政府一面加

强财政搜刮，一面滥发公债，四大家族便从中攫取大量财富。就拿发行公债来说，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二十六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军费开支。历年发行的公债，主要是向金融界推销。一般是五折、六折、七折押给银行，而按票面十足偿还，并有很高的利息。所以经营公债，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四大家族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攫取大量财富。公债最后是以赋税偿还，而赋税主要是由人民负担，所以四大家族积累的财富，归根到底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四大家族一方面从反革命内战军费的筹集中掠夺大量财富，另一方面还从军火买卖中攫取高额利润。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顾客。大宗的军火贸易主要为四大家族所垄断，而买办军火的折扣向来是很大的，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四大家族便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此外，为了打内战而进行的公路修建，一切车辆器材燃料等军用物资的购运，也都成了四大家族获得利润的好买卖。四大家族不仅是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大买办，而且是中国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商品的大买办。

四大家族从反革命内战和买办活动中积聚了大量财富，但官僚资本的形成，还取决于种种独占经济活动的完成。

首先，四大家族垄断了金融事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这个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它号称国家银行，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家银行，它的第一任总裁是宋子文，第二任是孔祥熙。这个银行是四大家族垄断全国金融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在此前后四大家族又以强制加入所谓“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九三三年又特设了一个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到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外，四大家族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两个金融机构，垄断信托、保险等金融事业。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中心机构。此外，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和经济特权控制了当时所谓“小四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个银行）等二流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垄断金融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币制改革”。规定“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按：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这次“币制改革”，一方面在当时对于制止白银大量外流，扭转金融紧缩、利率高涨、物价大跌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完成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通过这次改革，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把全国的白银都搜刮到了自己手里，据宋子文宣布，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收回”的白银，除中、中、交三行原有存银不计外，不下三亿元。这次改革后，全国金融界都不得不进一步仰承四大家族的鼻息。这次改革，也为四大家族以后滥发纸币，向中国人民进行最直接的掠夺打开了道路。

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对金融垄断的完成，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形成。

其次，四大家族利用经济政治势力，开始垄断全国的工商业和农产品购销。商业方面有孔家的“祥记商行”及其它七、八个大商行，专门经营匹头、颜料、煤油等货物。宋家的中国棉业公司，操纵全国的花、纱、布市场；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洋米入口；国货联营公司，垄断了全国国货和洋货的买卖。陈家在各地也有商行。蒋介石虽然不直接出面作商业老板，但也插足于孔、宋家族所建立的商业系统之中。工矿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是执行四大家族独占全国资源和垄断国家工业的组织机构。四大家族还利用加资和改组的方式，或利用债务关系，控制了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在农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高利贷主。四大家族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抽调壮丁和无偿地征用土地等方法剥削和掠夺农民。

此外，四大家族还逐渐垄断了全国的交通运输业、电影业、广播业、新闻业和出版业等。

总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到一九三六年前后已经形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主义。它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反动经济力量，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国民党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凋敝或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从一九二九年起，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小。而同时，旧厂改组、倒闭的数目却急剧增加。以上海为例，一九三四年新设工厂二十八家，改组二百九十一家，倒闭七十家。一九三六年新设工厂四十二家，改组四百二十九家，倒闭一百三十三家。当时即使勉强维持生产的企业，也是经常停工减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如全国纱锭开工率，一九三一年为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三六年降为百分之八十，如果再剔除在华外厂开工率，华商开工率就更低了。一九三一年，上海九十七家丝厂中，停工的达六十五家，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尚能开工的仅有十三家，停工率达百分之八十。民族工业的衰退，日益加深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一九三一年全国至少有五十万人失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摧残下，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帝国主义不但竭力向中国倾销“剩余”农产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尽力排挤中国的农产品，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无不遭受打击，而出现严重的销售危机。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及地主，利用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逃亡，纷纷兼并土地，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之手，土地集中的趋势更加发展了。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不但侵占了农民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必要劳动量的一部以至大部。田赋征收额更是迅速增加，四川许多地区的田赋，往往预征到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除了这种直接税的剥夺外，还有繁重的间接税压在农民身上。田赋附加及其他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乃至数十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也极其严重。商业高利贷和地主剥削及财政搜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封建剥削的天罗地网，对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这些情况，加上国民党军阀连年进行内战对农村的破坏，使自然灾害的为害程度大大加剧。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历年都有大灾，无数的农民被夺去生命。

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灾，受灾十几个省，灾民五千万。一九三五年水灾，仅鄂湘赣皖四省，灾民即超过一千万。大量农村人口流离死亡，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在北方，例如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在南方，例如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上述情况，使农村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广大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面对工业衰退，农村破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局面，蒋介石曾企图发起一个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八月，蒋介石又通电各省，提出这一运动的“实施要项”，要求各省“切实着眼于建设国民经济，视此为唯一之中心”。在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后的两年内，蒋介石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组织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自任会长，拟定了经济建设方案。他表示：“政府定有确乎不拔的决心，……使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能尽早解除经济的痛苦，得到一条生路”。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中国社会经济凋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方案，终归不会收到什么明显效果。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四 国民党政府反动的土地法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晏阳初的“县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伟大斗争。这一场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地主买办阶级的坚决反对和仇恨。国民党政府在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竭力维护四大家族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所谓《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有三百九十七条之多。但它主要点是虚伪地宣称土地“属于国民全体”，而又把土地分为“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两类，以维护四大家族掠夺“公有土地”和地主阶级占有“私有土地”的利益。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组织“农村兴复委员会”，对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在被其占领的苏区实行反攻倒算，恢复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

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蒋介石：《公务人员训练的意义与政府财政经济建设的方针》，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提出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和“解决乡村问题”的种种主张，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九三五年九月公布了一个《土地公有办法大纲》，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其要点是：“由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年满十八岁“向村公所呈领份地”，到五十八岁“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公债用什么还本呢？用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这就是所谓“土地村公有”。

阎的办法决不是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为了反共和反对民主革命。他自己说：“今日之土地私有，实为共产党露下一大空隙，也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办之势”。“土地问题解决，将共产党造乱的空隙弥补，将摧毁现社会的爆炸弹消除”。“土地村公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

“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之后，有些进步人士对它做了正确的分析批判：土地村公有，掌管土地的是村公所，但是“村公所是地主豪绅的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在实际上一一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是用公债收买的。掌权的地主豪绅一定不会自己出钱去收买，而是用“劳动所得税”去偿还。这样，“实际负担公债的还是农村劳动大众，他们出了偌大的代价，方始领得份地耕种；然而这种份地却不是农民私有，而是村公有”。“农民出了钱没有得到土地，地主豪绅得了钱（收回债本），田地还留在他们手里”。阎锡山玩弄的把戏就是如此。

阎的这一套办法并没有实行。他的办法里本来就说，“推行之初，耕农对省县地方负担，仍照旧征收田赋”。山西省的封建剥削方式一如既往。

梁漱溟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斗争。他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领导农民，……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他叫嚷：“共产党闹的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代替才可以”，“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没有。”

梁漱溟在一九二八年开始提出“乡治”的主张，到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说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人与人是“义务关系”、“情谊关系”。因为“中国社会是没有阶级的”，所以“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他说“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为此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地主武装，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和封建的剥削制度，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他说：“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代替共产党”。

《〈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的说明》，见一九三六年《申报年鉴》第九 二页。

《谈谈“土地村有”》，《大众生活》创刊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以上引文均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主张，得到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赞赏。一九三一年，他拿着国民党政府给的钱，在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在邹平以后又扩大到菏泽等三个专区，搞“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的大多数校长校董由当地豪绅担任。通过“乡农学校”把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一，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实际上是建立地主豪绅掌握的地方武装。三是建立“合作社”，实际上是加强地主买办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梁漱溟所谓“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是不可能办到的空话。所谓“文化改造”，就是维护和恢复封建的腐朽的伦理道德。

晏阳初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城市里提倡识字运动。从一九三一年起，由识字运动转到“农村建设”，在河北定县搞所谓“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等人认为：“愚、穷、弱、私”“是中国目前的大患”，是“中国人的生活上的四种基本缺点”，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其根源是“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鼓吹用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复兴农村”，“复兴中国”。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他们宣称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造人”，“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那中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召开内政会议，晏阳初以“特聘专家”的资格出席。这次会议决定了各省设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于是，晏阳初原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名义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一变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之下的“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由晏阳初任院长，仍以定县为实验区，但改称“县政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说：“县政建设底意义是在学术和政治打成一片”，“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借，方得顺利推行”，“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

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定县所搞的“县政建设”，把研究院和反动政权融为一体，自县长以下的一切公务员都是研究院实验部的职员。他们把农民组织成所谓“公民服务团”，规定团员随时要接受特种训练，要严守纪律。他们抹杀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大力宣扬扫盲、卫生、改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法和改良家畜，试验新法制造火腿及熏肉等。这是用改良的办法反对农村革命。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向关内的侵略扩张 抗日民主浪潮的起伏

一 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在我国东北成立所谓“满洲国”，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并以此应付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把溥仪挟持到东北。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十七日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汉奸张景惠为委员长。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还开展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伪造民意。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九日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出任“执政”。十日溥仪公布关东军提出的伪政府成员名单。由汉奸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九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同一天，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确认日本以往“在满洲国领域内”“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并“予以尊重”；确认“两国共同担任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一九三四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又把“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

“满洲国”由一批汉奸头目当伪总理和各部大臣，但各部大臣下面都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由他们实际掌握各方面的大权。在伪政府中还设立了一个总务厅，由日本人任总务厅长官，总揽伪政府的一切大权。事实上“满洲国”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支配，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是“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侵略者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汉奸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端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分驻东北铁路沿线大小城镇和军事要地。日军在伪军配合下，经常到各地疯狂地进行“讨伐”，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成千上万个村庄被烧毁，成千上万无辜的中国人民被杀害。例如一九三二年九月，日寇对抚顺附近的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烧毁房屋八百多间，三千多居民惨遭杀害。日本帝国主义还建立并加强宪兵、警察、法院、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到处为非作歹，随意逮捕、杀害城乡中国居民。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两年间，在东北因“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就有六万七千多人。因其它“罪名”被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还采用各种狠毒的手段，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大搞所谓“治安肃正”运动，进行“大检举”。推行保甲制度，实施连坐法。实行所谓“归屯并户”，用刺刀强迫当地居民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小屯为大屯，集中居住。后又“并大屯”，强行建立“集团部落”。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寇为进行细菌战，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在东北哈尔滨附近建立所谓“石井绝密机关”，丧心病狂地用中国人代替动物进行细菌试验。

除野蛮的军事统治外，日本侵略者还在“日满经济一元化”的口号下，

通过各种方法，对东北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最庞大的殖民掠夺公司。“九一八”以后，“满铁”的势力扩展到东北经济的各个领域。它垄断了东北境内的全部铁路，控制了汽车和航运事业。它除直接经营东北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制铁所和最大的煤炭企业抚顺煤炭会社外，还拥有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和满洲煤矿株式会社等许多旁系公司。除“满铁”外，还有其它垄断资本组织，如三井、三菱、大仓、东洋拓殖公司、住友、根津、安田、浅野等财阀的势力也先后伸进东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重点。“满铁”及这些垄断组织掌握下的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村的掠夺更为残酷。它凭借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武装移民”，大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还直接抢走大量农产品。“九一八”后，东北将近一半的豆类及其制品，近三分之二的粮食都被日寇抢走。此外，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面积种植鸦片，用来筹措侵略军费和毒害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还垄断了整个东北的商业和金融。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军事镇压和残酷经济掠夺的同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妄图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强令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禁止中国关内报刊进入东北。据伪文教部记载，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七月，焚书六百五十余万册。日本侵略者还实施所谓教育的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伪满的学校从小学起，就把日语列为必修课。把中国语文课改称“满语”课，内容均是宣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之类的胡言乱语。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伪造历史，捏造事实，胡说什么东北不是中国领土，东北人民不属于中华民族。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推行封建复古的教育，用“忠君爱国”、“忠孝仁爱”、“王道政治”等谬论，毒害中国人民。为了直接控制东北的各级学校，日本侵略者派出一批日本军国主义爪牙和法西斯文人到学校总揽大权，并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训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对东北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各种形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斗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斗争范围很快地扩展到东北全境。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北宁路、南满路和中东路的铁路工人也奋起斗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当日军向黑龙江侵犯时，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抵抗，东北人民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东北各地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以及汉奸走狗的为虎作伥恨之入骨，纷纷拿起锄头木棍和刀枪，与日伪军展开斗争。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中许多人直接投身到工人农民的反日武装斗争中去。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到处奔走呼号开展救国活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有四部分：（一）东北军的官兵，如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丁超（后投敌）、冯占海，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等部队；（二）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的部队，如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等；（三）自发的农民抗日武装。（四）一些地主武装。这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总称东北抗日义勇军，是自发的爱国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力量的斗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相当大的打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东北军改编的义勇军，情况复杂，弱点严重。到一九三三年夏，为数三十多万的抗日武装，只剩下几万人了。

始终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给敌人更大打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如杨靖宇、童长荣、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工作，或在东北各地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某些“左”倾政策，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封信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先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要有：磐石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珠河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密山游击队（后与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汇合，发展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也称东北抗日同盟军）、宁安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也称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队（后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饶河游击队等七支抗日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但部队的战士成份好，觉悟高，组织性强，作战英勇。他们积极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一九三四年，游击队粉碎了日寇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扫荡”，并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一九三五年，根据抗日斗争出现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始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队伍中，进行统一建制的组织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东北共产党在汤原召开各抗日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各抗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二）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三）哈尔滨东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四）李延禄领导的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五）周保中领导的反日同盟军和宁安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六）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为军长；（七）饶河

游击队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陈荣久为军长。共七个军，近三万人。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总司令，李红光为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抗日联军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以后又成立了第八、九、十、十一各军。一九三七年初，为了适应全国抗日高潮和东北游击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抗日联军又进行了整编，将第一、二两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指挥，以京图路（长春到图们）以南、南满路以东为游击军区。同年夏，又将第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以京图路以北、松花江左岸、乌苏里江右岸为游击军区；将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赵尚志任总指挥（后又改由李兆麟任总指挥），以松花江右岸，东西兴安岭、黑嫩平原为游击军区。全军人数总计四万五千人左右。抗联不断袭击敌人的据点，焚毁仓库，炸毁机场，破坏交通，歼灭敌人。从一九三一年到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军在东北被歼灭的有十四万多人。

三 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 抗日民主浪潮的持续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积极向华西进行新的侵略扩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军进犯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进行还击，安德馨营全营三百人力战殉国。这是长城抗战的开始。但因孤军无援，没能抵住日本陆海空军的联合进攻。一月三日，山海关沦陷。

二月，日军纠合伪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当地守军二十万人，望风而逃。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二百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日军先头部队仅百余人，在三月四日侵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三月九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决定张学良去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

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三月又进犯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以大刀与日军拼杀。冷口驻军商震部也奋起抵抗，坚守阵地。日军进犯喜峰口、冷口受挫后，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四月一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冷口腹背受敌，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冷口。接着又撤出喜峰口。同时，古北口也失陷，中国军队撤至南天门防守。五月初，日军再次向滦东发动进攻，十一日夜日军强渡滦河，侵袭滦西。随后冀东二十余县均被日军侵占，南天门也失守。日军已控制长城各口和冀东，平津危急。

在大片国土丧失、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一心“剿共”，急于同日本妥协。五月三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并令黄郛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在北平与日方进行密谈，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式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

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寇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冀察和平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国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深重，使被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之下，这个宣言没有在实际坚持的去作，而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

一九三三年一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华北的铁路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抗日。二月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求加紧抗日。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调集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捐献运动在全国各地又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工商界和海外华侨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宗教团体也开始行动起来。国民党军队若干将领“请缨抗日”，虽然有人仅是表态，但有一部分人确有抗日愿望。国民党的部分地方组织，各从其不同的目的出发，附和民众的要求，呼吁抗日。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各从不同的背景和各自的利益出发，指责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赞成抗日。

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提出：“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论绥靖》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欲言‘绥靖’，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之民主政治着手”。当日军侵占山海关时，王造时写了《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告》一文，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他说：“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何去何从，望政府其速自择”。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天津《益世报》社评说：我们主张，政府“处在两面夹攻形势中”，“应付方案既然不能双管齐下”，出路“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依我们的主张，此日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甚至一贯唱“低调”、向来主张中国“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的丁文江，这时也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我要

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这些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的主张。当然，他们的情况复杂，立场观点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有的则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替国民党政府出谋献策。

国共两方如何相互妥协呢？王造时一九三三年二月写的《战的政策》一文提出了他的结束“国共内战”的条件。这就是：“共党（一）须交出红军，让政府收编，调往前线；（二）须放弃阶级斗争政策，以期全国内部一致。政府（一）须相当容纳共产主义的政策，如平均财富，生产公有等；（二）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共党及其他党派有和平公开参政的机会”。资产阶级中间派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们提出的国共妥协条件，国民党不可能真正接受，由于它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主张抗日争取民主的浪潮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该同盟由宋庆龄等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间发起筹备，同年十二月成立。主席为宋庆龄，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杏佛。同盟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一九三三年一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同盟存在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如抗议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杀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抗议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营救陈独秀，营救牛兰夫妇等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其他二十多个进步团体在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立刻派全国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收复东北热河，保卫华北；立刻武装全部民众；保障民权，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抵制日货运动等。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当时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成分。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极端仇视，国民党特务给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寄恐吓信，把他们的名字列在“黑名单”里。在《社会新闻》等反动刊物上进行造谣诬蔑和人身攻击，甚至对同盟成员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庆龄寓所附近把杨杏佛暗杀。同盟的活动因蒋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无形中终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的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而“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纲领提出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五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这个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但在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王造时：《荒谬集》，第一四 ——一四一页。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春，日军进犯察东，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五月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它是在共产党员吉鸿昌（原西北军将领）的奔走下，联络冯玉祥、方振武等组成的。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通话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国亡种奴，危机迫切”，“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援。张家口和平绥铁路工人积极支援同盟军，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冀察的一些地方武装，也集合到抗日的旗帜下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余万人。六月，在张家口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六十一人。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问题决议案》和《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文件。纲领决议案共十三条，主要有：（一）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二）同盟军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三）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四）同盟军主张对日断绝国交；（五）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六）同盟军为完成抗日任务计，必须肃清汉奸国贼；（七）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八）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九）释放因反抗帝国主义及汉奸国贼而被拘禁之政治犯；（十）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等。大会选出军事委员，组织军事委员会。复由军事委员互推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十一人为常委。并制定了抗日的具体方案。会后，分兵三路迎击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七月，血战五天，收复多伦，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赶出察哈尔。这个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七月下旬，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用各种手段破坏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同盟军成立之时，蒋汪即电冯玉祥，谓其组织同盟军为“擅立”“军政名义”，“妨碍统一政令”。蒋又任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以十六个整师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进攻同盟军，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在蒋日的夹攻下，暂时归入同盟军旗帜下的军阀部队倒戈投敌，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八月，日军重新侵占多伦。冯玉祥去职。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九月，讨贼军又遭蒋日联合进攻，方吉率部从怀来转战退入滦东，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十一月，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吉鸿昌。吉鸿昌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

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被蒋介石出卖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在同红军作战中屡遭失败，该军将领觉悟到“剿共”不是出路，广大十九路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厌恶内战的情绪越来越深，要求抗日反蒋的情绪越来越高。当时，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去进攻红军，是想一箭双雕，使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这种种情况，推动了十九路军领导人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地主豪绅之反革命政府，且为民族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二十二日，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成立宣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和黑暗统治之后说：“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人民革命政府向全国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力；（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人民革命政府改组了军事机构和部队，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向闽浙边界推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反映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情况下国内中间阶层的要求。他们确实已经和实行独裁、内战、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了，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是革命的行动。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策略。他们指责福建人民政府“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它的“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政策和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去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反蒋，反而号召福建的工农群众去“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破产”。

《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七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八二——八三页。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迅速扑灭的方针。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并集中海空军进行封锁和轰炸。同时派人到两广去活动，拉拢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进攻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还派人去日本请求日本出兵援助。日本侵略者遂派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介石的部队占领厦门。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官职收买十九路军军官，从内部进行破坏。福建人民政府对蒋军的进攻曾分兵迎击。但是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军事上没有整个计划，事变后不敢发动和依靠群众，又没有取得各派反蒋势力的响应和支持，同时内部发生了叛变。因此，在蒋军进攻下，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归于失败。

五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继续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狂妄的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对于这样一个狂妄的《天羽声明》，国民党政府竟无半点抗议的表示，只是苦苦哀求和辩解，声称“中国与外国之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于军事项目，“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日本“殊不必有所过虑也”。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七月正式通车。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五个税卡。一九三五年一月又恢复通邮。这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

一九三四年秋，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表。这篇文章向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他要中日两国当局对中日关系作一番“检讨”，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以致弄得双方“同归于尽”。他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是“根本的错误”。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何”。又说，现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已绝不容当局不抵抗而屈服，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为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希望日本当局“不要为感情而牺牲理智”。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篇文章表明，蒋介石一面力求对日妥协，一面又希望日本当局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不要逼迫太甚。蒋介石竭力说明中日双方必须合作，好让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他也告诉日本当局，为了维持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他也不能允许日本无止境地侵占中国。这篇文章说出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态度。

《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外交评论》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党政府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和“增进邦交”。对此，蒋介石表示：广田演说“亦具诚意”，今后要以“敦睦邻邦之道”“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二月，蒋介石派王宠惠去日本交换“亲善”意见。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五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使，以表示“调整邦交”的“诚意”。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敦睦邻邦令”，禁止中国人民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言论、组织抗日团体，“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从此以后，报纸刊物再不允许出现“抗日”字样，只能以“抗×”来表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媚日外交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略中国的步伐。

第四节 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和左翼文化的成就

一 革命作家内部的争论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一大批文化宣传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一月，创造社和太阳社（一九二八年初成立）以《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杂志为阵地，发起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力图创造一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指导的、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斗争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巨大发展。但当时正是国际进步文艺界“左”倾思想流行的时候，否定文化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一度控制了苏联的文坛。在中国，八七会议后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左”的思想情绪，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曾经统治党中央。国际国内的“左”倾思想必然影响到中国的文化界，因此导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在正确地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左”倾错误。

鲁迅和创造社本来是准备联合起来，共同战斗的。鲁迅同意以《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但后来由于创造社新成员回国，带来了他们在日本早已酝酿好的计划，其他有些成员也认为《创造周报》不足以代表一个新阶段，便改变了同鲁迅结成联合战线的打算，并进而错误地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攻击的对象，挑起了争论。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创刊号首先点名批判鲁迅。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进行反批评。接着创造社、太阳社的主要成员，都把鲁迅视为革命文学的敌人群起而攻之，给鲁迅加上“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最恶的煽动家”等大帽子，使论争愈演愈烈。

论争涉及到如何对待革命的同盟者、如何认识作家世界观的改造和文艺的特点及其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成员犯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对五四以来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有成就的作家，除了肯定郭沫若作品的反抗精神外，对其他人一律加以否定。他们把思想改造看得过于容易，以为只要学习一些辩证唯物论的理论，承认它是改造世界观的有力武器，就是已“获得辩证法唯物论”。他们强调文艺要为无产阶级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但却忽视了文学的艺术特性，只讲“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是宣传。”鲁迅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两个团体的成员是“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他指出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突变”论是错误的，那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是明天又可以“突变回去”的。他正确地论述了文艺与宣传的关系，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无产阶级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述，不必忙于挂招牌”。

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不同思想和意见的争论。在论争中提出的和争论的一些问题，都是建立无产阶级文艺所必须解决的。不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九七、二九九页。

鲁迅：《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八十四页。

论当时论争的文字有怎样的缺点，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文艺队伍的一次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通过这次争论，整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这样就为革命文艺队伍的新的团结，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作了准备。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战斗，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共产党组织的提议下，论争双方代表召开清算过去和确定当前文学运动的任务的讨论会。到会者有鲁迅、沈端先（夏衍）等十二人。与会者总结了过去文学运动的缺点，认为目前文学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新文艺理论的建立。作为讨论的结果，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家都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

推举冯乃超、钱杏村、冯雪峰等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它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参加左联的有鲁迅、茅盾、冯雪峰、冯乃超、潘汉年、阳翰笙、沈端先、钱杏村、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等五十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纲领规定：“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等等。纲领后面还附有一个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行动纲领的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是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工作方针是：“（一）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二）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四）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五）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这个纲领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其主要缺陷是没有把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强调地提出来，也没有强调动员更广泛的进步作家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意义。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左翼作家要深入实际，了解实际，改造世界观。左翼文艺队伍要扩大战线，培养新生力量。鲁迅尖锐地指出，不在革命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一八四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导），《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一八五——一八七页。

失望”。对于左联成立后的迫切任务，鲁迅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战线应该扩大；第三，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第四，“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的讲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中外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左联指明了斗争方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件，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

左联成立后不久，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等团体，同左联一起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各个左翼文化团体中，左联阵容声势最为壮大，成为“文总”的主力。

左联在全国重要地区建立分部，先后出版《萌芽》、《前哨》、《文学导报》、《北斗》、《拓荒者》、《文学月报》、《现代小说》、《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等刊物，努力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介绍，积极以文艺为武器，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左联培养了大批作家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干部，为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

首先是剥夺革命文化的任何出版自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发行，违反出版法的规定，处以罚款、扣押、停止发行和判刑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规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审查委员会不但删削文章，而且“改”文章，如果不按削改的印刷，就“予以处分”。

其次是查禁进步书刊。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初，国民党即实行所谓“邮电检查”，扣押进步书刊，予以销毁。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并密令施行“邮电检查规则”。国民党以种种所谓罪名查禁进步书刊。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上海党部，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并令“连底版一并呈缴销毁，毋稍违误”。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押扣的达千余种。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订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查禁文艺书籍三百六十四种。一九三六年八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

除了查禁书刊之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一年一月，著名的优秀青年作家

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同月，国民党特务袭击良友图书公司，并发信警告各书局各刊物，“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决不宽假”。上海报业资本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为《申报》发表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抨击国民党“剿共”政策的言论，抵制国民党控制舆论，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涉及了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说这是“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立即禁售该刊，查封该周刊社，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并有七个审查官因此被革职。

国民党反动派以各种方法迫害鲁迅。他们诬蔑鲁迅“拿苏联卢布”，诬蔑他“乐于作汉奸”，“领日本津贴”，甚至派特务监视，准备暗害。杨杏佛被暗杀时，在暗杀的黑名单上还有鲁迅的名字。鲁迅因为受迫害，曾三次不得不离开住所到别处躲避。

国民党反动派除了用以上种种手段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外，还开书店，印刊物，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其残酷性是举世未有的，然而革命文化并没有被消灭，相反，文化革命更深入了，革命文化仍在曲折地滋长。国民党反动派查禁进步刊物，刊物出得更多；封闭书店，书店仍在卖进步书籍。为了躲过反动当局的查禁，转移分散特务、暗探的注意，让革命书刊能够出版、发行，共产党人和革命文化工作者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如采用伪装封面，变换刊物名称，报纸采用当时流行的消闲性小报的编排形式等等。反动派杀害进步作家、革命青年，“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围剿”左翼文艺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三 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和左翼文艺的成就

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文化“围剿”时，还指使文化特务、走狗文人，向革命文艺运动猖狂进攻。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也在宣传他们的文艺思想，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当时这样的文学流派有新月派的文学、“民族主义文艺”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进步的文艺界对他们的文艺思想和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新月派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和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一九二七年他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

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五三——一五四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三页。

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 的态度》的发刊词。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思想上言论上的充分自由，声称“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不敢赞许感伤与热狂”，“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还要反对“标语与主义”。实际上他们攻击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后来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认为“文学与革命没有多少的根本的关系”，“‘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他攻击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他通过攻击鲁迅的“硬译”来反对苏联文艺理论的介绍。

针对新月派的主张，鲁迅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进行批判。彭康、冯乃超也写了批判文章。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绝无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存在。“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因此，文学“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梁实秋的那些论调，“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鲁迅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途，深刻地指出：“无产者就是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新月》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出至六卷四期便停刊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纠集了一帮政客、特务、流氓和反动文贩潘公展、朱应鹏、王平陵等，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杂志。他们打着“复兴民族”的幌子，鼓吹所谓“民族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底当前的危机”，就是“缺乏中心意识”即“民族意识”。

因此“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的文艺运动，在现代中国是最为需要的”。他们主张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民族主义文艺的代表作品有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前者吹捧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的战绩。后者写的是中国人跟着日本军阀去征服俄罗斯，宣扬反苏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还大量散布反苏媚日、歌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言论。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一三、一七、一二页。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九页。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二四、二六、二八页。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八一、八五页。

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八七页。

左翼文艺队伍在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对他们的反动文学主张和作品不断予以反击和批判。比较重要的批判文章有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钱杏邨的《黄人之血及其他》等。

鲁迅针对“民族主义文学”鼓吹者的活动及其反动作品，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实质。指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的一种表现。提倡这一运动的是一群帝国主义的“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它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政策的必然产物。由于“无产阶级的勃兴”，“阶级斗争愈加锋利”，在这“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的时候，作为反动派“宠犬”者流，看到他们将与其主子被无产阶级作为“污秽”一同扫去的时候，就竖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和主人一同做最后的挣扎。鲁迅还从阶级本质上彻底揭露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的反动实质。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民族中从来就有不同的阶级，绝不会有有没有阶级内容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文学家”所鼓吹的那种“民族意识”，不过是甘心做帝国主义爪牙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

茅盾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法西斯蒂的本相”。他指出：“国民党维持其反动政权的手段，向来是两方面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无耻的麻醉欺骗”。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瞿秋白指出“民族主义文艺”把军阀混战、“围剿”战争、反苏都说成为民族而战，鼓吹的是“杀人放火的文学”、“屠夫文学”。

曾经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只好收场了。

正当鲁迅等人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在他主办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幌子，摆出一副折中公允的姿态，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反对无产阶级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叫嚷“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随后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章，向左翼文艺进攻。

在“自由人”胡秋原的谬论遭到左翼文艺界痛斥之后，苏汶（即杜衡）打着“第三种人”的旗号，于一九三二年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文，标榜他自己既非左翼又非右翼，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是“第三种人”，“永远中立”，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他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专制粗暴，动辄指责别人为“资产阶级走狗”。攻击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说这是把文学变成了“卖淫妇”。这样，围绕着“文艺自由”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剧烈的论战。

针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瞿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冯雪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周扬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文章，进行了批判。

针对苏汶等的文艺“超政治”、“超现实”的论调，鲁迅尖锐地指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做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有力地批判了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胡秋原替文学要求“自由”，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冯雪峰的文章在批判了“第三种文学”之后，特别向这种文学的主张者提出劝告，希望他们“改变他们对于政治的现在的那种态度，抛弃鄙弃群众的观念，改正对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写出“多少有些革命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

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是左联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的三次主要的斗争。

以鲁迅为主将和旗手，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艺运动，不屈不挠地坚持在文艺战线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且取得了辉煌的创作成就。这个时期，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电影、音乐、美术，都有很大的发展。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比前一个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杂文和小说的成就就是突出的，戏剧也有很大的成就。

鲁迅在这个时期，是以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的。他这时的杂文所暴露和批判的社会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几乎全都涉及到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托派、汉奸、御用文人以至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鲁迅的杂文都与之一一较量过。鲁迅的一系列杂文可说是用杂文形式写的思想斗争史。他的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形象感染力，做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发生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瞿秋白这时期结合实际斗争，也写了不少精采的杂文。同鲁迅的杂文一样，瞿秋白的杂文所暴露和抨击的社会对象也是异常广阔的。

在小说方面，茅盾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子夜》、《林家铺子》等。《子夜》这部长篇小说，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形象地表现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不可能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从而用文学这一斗争武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的谬论，捍卫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后，震动了当时的文坛，获得了国内外进步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叶绍钧（圣陶）这时期的创作，在主题和题材上比前一时期更有现实性。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通过小学教师倪焕之从“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和精神面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批判了改良主义，歌颂了革命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他的童话集《稻草人》，是我国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巴金是在这个时期展开创作活动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家》，是他的代表作品。它以“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歌颂了“五四”初期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以及他们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部作品在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老舍（舒舍予）是以描写城市贫民而著称的作家。一九三六年秋发表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他对于没有公道的世界的愤恨和对于摆脱不幸处境的迫切愿望。

这时期，在小说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家还有蒋光慈、张天翼、叶紫、丁玲、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

在诗歌方面，这个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积极提倡诗歌要大众化，要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殷夫的诗是这个时期革命文艺的鲜艳花朵。他的诗集有《孩儿塔》等。臧克家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一九三三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之后又接连出版了《罪恶的黑手》等诗集。艾青、田间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诗人。

在戏剧方面，这时期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一九二七年田汉组织了南国社，于一九二八年全力投入戏剧运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锡等地举行公演，不仅扩大了新戏剧的影响，并在戏剧艺术上很有贡献。一九二九年冬，夏衍、郑伯奇等组成上海艺术剧社，首次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曾多次到工人区演出，对话剧运动起过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左明、陈白尘组织了摩登剧社，提出“青年戏剧同志联合起来一致完成民众戏剧”的口号。一九三一年由艺术剧社、摩登剧社发起，组成上海剧团联合会。同年八月，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一九三一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成立。剧联成立后，左翼戏剧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团，其中在工人中组织的兰衫剧团以及为工厂学校演出的移动剧团，面向工、农、学生，多次演出反帝抗日的戏剧。一九三三年是剧联所领导的戏剧运动最活跃的一年，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这年春天首先演出的。曹禺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第一个剧本《雷雨》和第二年出版的《日出》，在中国话剧史上享有盛名。

《雷雨》以一九二五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展示了这个家庭的罪恶历史和矛盾。这个剧本有强烈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它是这一时期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

这个时期的进步电影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九三二年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加强了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二月电影界的群众性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五月，对协会的方针任务进行过宣传和讨论。讨论中明确提出中国电影的当前任务“是反封建和帝国主义”。这个时期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较好的影片，如《渔光曲》、《马路天使》等。

音乐方面，一九三二年在剧联内成立了音乐小组，参加者有田汉、聂耳等。这个时期在音乐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聂耳。他创作的著名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飞花歌》、《开路先锋》、《新女

性歌》等。

四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者的古史研究

从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当时所以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是与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但是，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开始，托洛茨基趁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失败之机，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发起攻击。他认为：在中国，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另一个俄共党内反对派头目拉狄克，则把商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一直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也促使人们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而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又都离不开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六大”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都肯定第一次大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现阶段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两大任务。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则主张托洛茨基的观点。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而展开，中心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判了托派理论。同年上半年，进步刊物《新思潮》连续刊登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五月出刊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了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等文。六月，潘东周又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发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一文。这几篇文章，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其中又以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一文更为重要。

潘文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相互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寇中国以后”，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一五四、一五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潘、王等的文章登在《新思潮》杂志上，故一般称他们为“新思潮派”。

以，中国就只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而不能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文章列举事实，批驳了托派“残余之残余”说，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是，封建关系仍然占据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优势，而中国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封建关系“实际上就占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王学文在文章中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和主要地位的，是封建半封建经济。

李立三和潘王等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其中主要人物是托派分子任曙和严灵峰。一九三一年初，任曙发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六月，严灵峰发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后又写《追击与反攻》一书。他们的主要错误观点是：

第一，抛开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研究分析，宣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严的共同认识是：封建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侵华以来，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所以，“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这里，他们不但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而且对中国商品经济状况也做了极度的夸大。任曙更进一步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他根据对外贸易的某些统计资料，断言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了优势”。

第二，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上，鼓吹“绝对破坏论”。严灵峰的逻辑是：既然“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而资本主义同封建的经济制度又是“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任曙也极力反对“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的观点，攻击这是“荒谬绝伦”。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和侵入到一个丧失独立的国家内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抹煞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

第三，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上，鼓吹“一视同仁”论。任严都否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宣扬：两种经济都是“中国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国经济”，即使是帝国主义排挤民族资本而扩张其在华的经济势力，那也同样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主张对华洋资本要“一视同仁”。

第四，曲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严灵峰说：中国旧式地主已经破产，“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即“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任曙也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任严的这些论断，完全否定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

第五，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

对于托派分子的攻击，马克思主义阵营予以回击。比较重要的文章有：

这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前两篇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和九月发表在《动力》杂志第一、二期上。一般称严灵峰等为“动力派”。

本目所引任曙、严灵峰的话，均出自《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

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九三一年六月）、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一九三三年四月）等。

刘梦云指出：任曙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他认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刘梦云既肯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针对严任曲解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谬论，刘梦云分析了地主经营土地和剥削农民的租佃方式，指出“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种封建的剥削。刘苏华在文章中揭露了任严等托派分子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实质。他指出：把目前的中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托派“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托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反对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们对华洋资本的所谓“一视同仁”论，“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刘梦云、刘苏华及“新思潮派”的文章，虽然也有立论错误的方面，如对封建关系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估计不足，而对资本主义成分则有些夸大，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但是，从总的方向上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宣传了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一九三二、三三年间，虽然继续有刘镜园说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严的继续“答辩”和“反攻”，但他们的阵地和影响是愈来愈小了。一九三三年前后，吕振羽等比较确切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一九三五年，又有钱俊瑞、薛暮桥等与王宜昌、张志澄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钱薛等人继续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样，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就被更多的人所承认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必然联系到对过往历史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开展不久，我国思想理论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除了一些专著和许多刊物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以外，《读书杂志》从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四月相继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四辑，论战达到高潮。这一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十分广泛、复杂。大体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一论战的主要参加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中对于它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看法。郭沫若开始认为，马克思所讲的

陶希圣等办《新生命》杂志，一般称他们为“新生命派”。

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原始共产社会，后又说它等于奴隶制以前的族长制。吕振羽开始说它只是“亚细亚国家之封建主义的一点特色”，后又改为：它“不外是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即希腊、罗马发达奴隶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其他的人也各执一说。有的认为它是指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而又与奴隶制不同的东方的一个社会阶段（李季）；有的认为它即是东方的封建社会（王宜昌等）；有的说它是亚洲的专制主义（胡秋原等）；有的认为它包括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整个东方社会。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

（二）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托派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奴隶制社会。李季说：原始公社崩溃后，“因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关系”，中国和欧洲走入不同的发展道路，欧洲转入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国则进入以土地国有为特征的“亚细亚社会”。杜畏之说：“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

最早论断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肯定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又指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经过争论和研究，中国也如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见解，为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所公认。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起止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三）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参加论战的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大多数成员，都主张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李季认为：“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始终”，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了。

梅思平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社会，乃完全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郭沫若、吕振羽等人，虽然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当时郭氏认为开始于春秋，吕氏和翦伯赞等认为开始于西周），但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针对李季等人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吕振羽指出：在世界上，没有商业资本“独自存在的处所，有的，就只是在那班诡辩论者的脑子里”。

在论战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艰苦的工作，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居留日本后，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一九三一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根据卜辞金文和各种古代文献，第一次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一次理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初步系统，这就是：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他的说法后来有改变）。随后，郭沫若对甲骨文、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载《中国社会史论战》（下简称《论战》）第二辑、第三辑。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载《论战》第二辑。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载《中国社会史论战》（下简称《论战》）第二辑、第三辑。

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新生命》一卷一一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郭沫若：《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

金文和各种古文献又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先后写了《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考》等一系列著作，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他认为：夏和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秦到鸦片战争是“变种的”（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一些史学工作者还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作了研究探讨。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深入一步的时代。

五 哲学上的争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更加深入。当时的文化革命战士们更自觉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他们力图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提出：“现在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按指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他们把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和宣传，看做一场新的大革命的“前奏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后的数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国外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问题》、《思想起源论》、《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辩证法的唯物论》、《史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等，连同国内编著的新哲学著作一起，达数十种之多。这些书广泛流行。辩证唯物主义还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一时间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风行全国。这样自然地引起资产阶级学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不安和反对。于是自一九三一年起三、四年间发生了关于新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张东荪发表《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一文，直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以后又写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一九三二年九月）、《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一九三三年九月）等文，着重反对辩证法。张东荪的意见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他认为，如果如辩证唯物论所说，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使我们产生感觉的就是物质，那么，“自来所有哲学家没有一个不承认有东西作用于我们的官觉之上”的。如此说来“就没有一个唯心论者”。这就是说，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次，他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天下万物也并非无不具有内在的矛盾。所谓奥伏赫变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上的变，时间上的变，与事物的变”。这种变实际上并不变。他武断地说辩证法是“过时的古董”。这样又完全否定了辩证法。第三，他认为哲学是不能有党派的。“哲学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思想自由。无自由思想即无哲学，使‘哲学’二字与‘党派’二字联

八二年九月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彭康：《前奏曲》，《叙言》及正文第一五二页，一九二九年六月版。

缀成一句，即等于取消哲学而只留党派。这种在党派之下的哲学虽名为哲学，而其实并不是哲学”。随着张东荪的挑战，哲学界的论争也就开始了。

当这场争论正在进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国哲学界知名人士李石岑，本来服膺尼采哲学，这时转到辩证唯物主义阵营来了。他在一九三三年初发表了《未来的哲学》、《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二文，九月出版的《哲学概论》一书中写了《新唯物论》一篇，阐述了他的新的哲学思想。他的文章和书籍正确地简明易懂地论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他说：“辩证法的对象是过程，过程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辩证法有三个基本法则，即矛盾统一律、量变质变律、否定的否定律。“就中矛盾统一律，又为基本的基本”。新唯物论认为自然界不是静的陈死的自然界。“自然的整一性就是它的物质性”。自然界的事物一方面形成，一方面便毁灭，这是由于自然界本身所含的内在的矛盾。“有矛盾之处必形成一种对立。有对立必有统一。但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乃是绝对的。整个的自然界只是统一和斗争的过程”。新唯物论认为认识与实践是相关联的。“认识随实践而发展，而扩大，但实践也随认识而发展，而扩大，这是互为因果的”。他认为“未来的哲学必然的以新唯物论为主营”。新唯物论的哲学作为方法论的科学，“在现在和最近的未来，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发展”。

上述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但唯心主义者却因此而“为学术界前途担忧”，写文章批判《未来的哲学》。《论未来的哲学——新唯物论》是一篇代表作。它批判的不只是个别人，而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主要错误观点是：（一）认为现象与本体是分离的，因此不能由现象知本体；（二）认为“科学上之物质乃是概念”，反对世界的物质性；（三）认为“物之变化纯由外物的影响”，反对事物内在矛盾说。

当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首先起来并发表大量文章批判张东荪等人的，是叛徒叶青及其他托派分子。他们暂时掩盖着叛徒反革命的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自居，以捍卫新唯物论和辩证法自任，以便欺世盗名。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伙政治骗子，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哲学，必然要暴露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貌。因此，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一方面批判张东荪等公开的辩证唯物论的敌人，另一方面批判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这种批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场批判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艾思奇写了《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抽象作用与辩证法》、《认识论上的问题》等书籍和论文，李达写了《社会学大纲》，邓云特写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还有其他不少主张新哲学的人写文章，参加这次斗争。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阐发了以下的重要哲学思想：

（一）关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问题。艾思奇认为：由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叫做感性认识。用理解力去了解，这种认识叫做理性认识。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做基础。实践则使人的主观和客观的世界相接触，即使主观和客观统一。总之，“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

（二）关于对立统一法则。一篇叫做《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说：“对立的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法则，而是解明一切现象都是对立的统一

着，同时也是解明每一个物体都在矛盾地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对立的统一是运动的唯一源泉。对立物的斗争是绝对的，而对立物的统一是相对的。研究对立的统一法则，必须要指示出矛盾的主导方面之意义来，更需要指示出每一个矛盾中的特质来”。

（三）把新哲学的研究同民族解放的任务联系起来。新哲学是改变世界的指导，而它又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因此新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例如联合战线问题就必须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去考查。

但当时有的主张新哲学的人，也有某些错误，例如有人主张形式逻辑已完全被辩证逻辑所代替，声称“早已宣布了形式伦理学的死刑”。

第五节 苏维埃区域革命的深入和各项建设的开展

一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川陕苏区的开辟

一九三二年夏天，国民党围攻红军的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六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进攻红军的“方略”要“军事与政治并重”，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下旬在武汉成立了“剿匪总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六十三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他疯狂地叫嚣“这次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

为了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包围态势，国民党军先以主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而以进攻鄂豫皖苏区为重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曾给敌人以相当大的打击。但是，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的错误指导，这次反“围剿”未能胜利。张国焘起初麻痹轻敌，提出所谓“偏师”说。因此对新的反“围剿”毫无准备。到敌人大举进攻开始后，又仓促应战，死拼硬打。结果红军苦战了两个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不能扭转战局。最后张国焘在敌人新的攻势面前惊慌失措，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率主力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以十万之众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使红军困在内线，分兵把口，节节阻击，与敌打硬仗拼消耗，完全陷入被动。加上由于肃反扩大化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使红军失去了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可能，不得不放弃湘鄂西苏区，分批仓卒突围，转战到湘鄂川黔边境。

在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反“围剿”失利后，蒋介石集中主力部队三、四十万人，以顾祝同为“围剿”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二月，陈诚指挥中路敌军三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南丰、广昌一线推进，妄图一举聚歼中央红军于黎（川）、建（宁）、泰（宁）地区。

当敌人大举进攻开始时，毛泽东已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反“围剿”开始前，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命令红军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胁和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当时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等，坚持正确方针，抵制“左”倾错误意见，反对打无把握的攻坚战，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寻找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周恩来朱德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他们多次向党中央陈述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红军主力完成对南丰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攻城未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朱德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并主动从南丰撤围，以一部分红军伪装主力回到黎川附近活动，箝制迷惑敌人，随后集中红军主力在黄陂围歼敌五十二、

五十九两个主力师。接着又在草台冈、东陂地区歼敌主力十一师。两战两捷，共歼敌三个师，俘敌约一万九千人以上，缴获敌人枪支总数约一万五千支以上。至此，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

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攻胜利发展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六月中旬，粉碎了川北军阀田颂尧动用六万兵力、历时四个月的三路围攻，共歼敌两万余人。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时川陕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设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吴焕先、徐海东等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在陕北，渭华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等继续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与谢刘的游击队会合，成立反帝同盟军。一九三二年底，成立了红二十六军。一九三四年秋冬之间，共产党北方局决定在陕北建立根据地，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并成立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春，陕北建立了红色政权。

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二 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没收分配土地阶段、检查土地分配情况阶段、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发展生产阶段。在中央苏区大致有三种区域：新发展区域、斗争比较落后区域、斗争深入区域。在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革命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没有完全打倒。一部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地方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们成立反动组织，破坏革命，阴谋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里应外合，实行反攻倒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进行了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

一九三三年三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干部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以取得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把查田运动全面推广。六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六月二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六月中旬，在瑞金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明确规定，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运动的步骤是：（一）讲阶级

（做宣传），（二）查阶级，（三）通过阶级，（四）没收分配。运动中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要坚决反对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查田运动迅速形成一个群众运动。

在查田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为了纠正错误，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写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肯定了运动的成绩，批评了“左”的错误，指出侵犯中农是最严重的危险，消灭富农的错误也严重存在，还存在着在发展贫农团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毛泽东也批评了有些地方对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错误。

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一九三三年十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正式公布。这个文件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各阶级进行了具体的划分，明确规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雇农在内）各阶级的标准。同时，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也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施行。这两个文件是关于土地革命斗争的指导性文件。

三 苏区各项建设的开展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对苏区不断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布了封锁苏区的办法，规定在经常有红军和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各县设立“封锁管理所”，对苏区施行“物质封锁”、“交通封锁”、“邮电封锁”。物质封锁规定，凡军用品和日用品（如油、盐、米、粮、种子及燃料等）严禁向苏区输入。苏区生产的货物绝对禁止输出。取缔苏区周围的负贩，设立公卖会，“居民购买日用品须由各保长统计本保实有人口每月所需数量按月或按旬代为购买发给之”，杜绝向苏区输入物资的可能。并规定凡和苏区“通消息者”、“私相买卖者”、“偷运货物图重利者”，“应予枪毙”。甚至“对于封锁职责奉行不力者”，“也要枪毙”。特别对食盐的销售运输更是严加控制和监督，一律禁止自由贩卖，施行公卖办法，购买食盐需持购买凭单，每人每月食盐限制到四钱至五钱。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红军的给养和群众生活遇到很大困难。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把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进行建设的可能，谁讲经济建设，就骂谁为“右倾”。同时他们推行许多过“左”的经济政策，如消灭资产阶级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等。他们片面强调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只管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注意发展生产，这种情况给苏区经济带来了损害。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纠正中央苏区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亲自到江西兴国的长冈乡和福建上杭的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抓典型，总结经验，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和

总结。这些调查和报告，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还指出，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党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并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同时大规模发展合作经济。对不超出政府法律范围的私人经济，应予以提倡和鼓励，反对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政策。为了进行革命战争，毛泽东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只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

由于苏区迫切的客观需要，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中央苏区的农工商业都有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实行耕种互助。苏区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还有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程度更高的农业合作组织——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组织，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劳动互助社的发展。在组织群众实行互助合作的同时，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发动群众开垦荒地等一系列措施。在很短的时期内，苏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农业生产的收获量，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二年，中央苏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闽浙赣苏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苏区的军需和人民的吃粮，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极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努力发展工业、商业和财政金融事业。

苏区的工商业，由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和私人企业组成。国营工商业，一部分是没收帝国主义及封建官僚买办资本的企业建立起来的，另一部分是苏维埃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工业方面，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需要，中央苏区建设了一些军需品工厂和民用品工厂。据一九三四年三月的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有较大的军需工厂三十三座，民用工业方面有制糖、制盐、纺织、煤炭、炼铁、造船、农具以及纸张、烟草、樟脑、肥料、医药等工业。其它苏区也先后建立了一些军需品工厂和民用品工厂。在商业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经济封锁，把苏区的产品输出到白区去，再从那里换回军民所急需的物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苏区进出口贸易，起先几乎全部由私商掌握。为了反对私商的高利剥削，保证军民的生活需要，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加强对输出入的管理，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一九三四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进出口公司——中华商业公司，同福州、厦门和广州等地进行了大宗贸易。

合作社是由工农群众集资合股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大力倡导建立合作社，并给予支持和扶助。在工业方面，组织了铸铁、造纸、石灰、钨砂、煤炭、造船等合作社，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仅江西就有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家。合作商业有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形式。此外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

苏区的私人经济主要是个体生产的小私有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数量很少，苏维埃政府对它们采取监督的办法。

在财政方面，苏维埃政府是用战胜敌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援革命战争。在财政支出方面，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为了改变反动派遗留下来的金融方面的混乱，各苏区陆续成立了若干银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银行。各个苏区的银行归并于国家银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国家银行曾发行过多种形式的硬币和纸币。国家银行不但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作为储备金，而且拥有大量的物资作后盾，因此发行的货币币值基本稳定。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及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先后多次发行公债。

土地改革的实行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苏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了限制，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日益发展，国营经济取得了领导地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使经济建设工作也受到不少的干扰和影响。

苏维埃政权为了动员民众加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为了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革命的文化和教育。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干部。

在苏区，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区在义务教育方面有很大发展，学龄儿童普遍地进入列宁小学学习。一九三四年一月根据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多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余所，学生近九万人。为了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苏区普遍地开办夜校、识字组和俱乐部，其中夜校是主要形式。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和粤赣三个省的二千九百多个乡中，共有夜校六千四百多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多人。识字组的组织，更是普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干部教育有在职学习和离职进校学习两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形势、政府法令、党的路线策略、群众工作、社会调查等。一九三三年九月，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创办了苏维埃大学，担任校长。此外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红军大学、女子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无线电卫生等技术学校、红军步兵特科学学校等。

苏区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中央苏区在一九三四年已有各种报纸三十四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额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刊物方面，《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仅在江西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此外还大量出版了《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摘要》、《阶级斗争讲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以及《工农读本》、《青年平民》、《列宁小学读本》等教科书。

苏区的文艺工作也得到普遍的开展。剧社、歌舞团、农村俱乐部都有广泛的发展，创造了许多革命的话剧、歌舞剧，并改造了地方戏，编了许多革命歌谣和歌曲。

共产党非常重视苏区的政权建设。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各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建设。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颁布和实行了各种选举法令。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苏维埃区域普遍进行了三次选举。人民群众和红军士兵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选民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兴国和赣东北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选出的妇女代表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通过选举，大批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被选进各级政权的领导机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七百多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

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具体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和苏维埃区域经济建设等重要问题。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和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大会选举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吴亮平、瞿秋白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二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发、方志敏、罗迈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为中央行政机关。

大会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紧急动员起来，把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集中一切力量开展革命战争。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而斗争。

第六节 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白区工作中，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拒绝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采取了所谓“全线进攻”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赤色团体，如赤色工会、赤色济难会等。他们强调“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经常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结果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也被迫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就进一步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执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在二、三月间提出的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并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在历次反“围剿”中之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在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去专做政府工作。

为了推行“左”倾的错误政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或不赞成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党和红军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三三年二月，苏区中央局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苏区的巩固地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罗明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罗明及有关人员进行打击。接着，又开展了对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当时是江西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也都是党和红军的重要干部。他们批评和反对苏区中央局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因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纯粹防御路线”、“逃跑退却路线”、“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等帽子，遭到打击。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完全掌握了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他们的错误政策。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他们忽视苏区的经济建设，片面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拚消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他们打击知识分子，说知识分

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他们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不要统一战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苏区造成了严重危害。

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和其它革命根据地得到大力贯彻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再次召开所谓“剿匪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是一方面继续以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另一方面更注重运用政治力量来摧毁根据地。同年六月，蒋介石派宋子文去美国，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棉麦贷款协定，加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经济力量。他还聘请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研究新的战法。这次“围剿”开始以前，敌人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认为以前“每误于纵线进剿，而忽于平面之组织，孤军深入，动辄受其包围”，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堡垒政策。这种办法就是：构筑碉堡与军队前进齐头并进，“务期星罗棋布”。“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经过这些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九月，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方针，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在苏区周围筑起了三千多个碉堡，企图紧缩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红军面临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如果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的。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下，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当时敌人为了隔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向黎川进攻。但红军在洵口遭遇战获胜后，没有采取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而是到外线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法。“左”倾的领导人震惊于黎川一地之失，为了收复黎川，派兵到白区去打黎川以北的硝石，不胜，再打其东南的资溪桥，又不胜。这时，他们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转而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阻止敌人的进攻，即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抽出进攻红军的主力去镇压。此时红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机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中央苏区之敌回援，既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采纳这样的正确意见，也拒绝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反而把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结果，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继续从北路和东路进攻红军。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发展的顶点。五中全会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无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的重大挫折，盲目地说什么“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

《剿匪部队协助民众构筑碉寨图说》，一九三三年六月颁布。

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这一次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战略战术上，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决定。这就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必不可免。

一九三四年初，红军在泰宁、建宁地区与敌人相持数月，因节节抗击不能取胜而被迫后撤。三月，敌主力向广昌推进。在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英勇的红军战士虽然杀伤了三、四千敌人，但是由于战略的错误和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法，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广昌失守以后，红军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在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十一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赣东北，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十二月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和七倍于己的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因叛徒告密而被俘。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名文。八月六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任弼时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八月十二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指挥下，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和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二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蒋介石忙调重兵堵截、追击，以阻挡两部红军会师。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三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没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意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得到多数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通道城之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作战顺利，

部队情绪逐渐振奋起来。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到会者共二十人。”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调动敌人，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一月十九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一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河，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但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发动陕南战役，致使敌人得以沿川贵边布防，破坏了红一方面军的渡江计划。在此情况下，中央红军挥戈东向，于二月中下旬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为了进一步调动敌军，三月中旬，三渡赤水，再至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在川、黔、湘三省边界重重设防。当各路敌军汇集时，红军突然折返贵州，于三月下旬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作出进逼贵阳的姿态，迫使蒋介石调动滇军援黔，红军却乘虚直入云南，于五月上旬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掌握了长征的战略主动权。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 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之后，由于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地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到达四川的懋功。在这之前，张国焘借口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放弃川陕苏区，向川康边境转移。六月十四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

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却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他过高估计反革命力量，认为红军的长征“已经失败”，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现在是处在“总退却阶段”。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北上，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七月，红军又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兴奋了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中国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继续向前；过分夸大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肯定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等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在包座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主力师。

张国焘对毛儿盖会议决议阳奉阴违，他自恃所掌握的四方面军兵力比一方面军多，妄图篡夺党中央的权力。在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到阿坝以后，张国焘竟打电报给中央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其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坚持错误，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发现了张国焘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向甘肃前进。

九月，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的七、八千人，自巴西出发，到达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并警告张国焘必须改正错误，如果坚持错误，前途只能是离开党。会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俄界会议后，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接着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十月，红军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十九日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受迫害被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张国焘在这时则带着被其欺骗的红军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逃跑。十月中，在卓木碉，他终于公开分裂党，非法宣布另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自封为中央“主席”。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罪行，党中央政

治局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他立即取消非法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军第二、六军团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进行长征。一九三六年六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初，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部分红军汇合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又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时红四方面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的错误，纷纷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八月到达甘南。这时，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二、四方面军乃分两路前进，二方面军为右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十二月七日组成统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团共二万余人，于十一月十日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优势敌人围攻下，到一九三七年三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两路继续艰苦转战，一路由李先念等率领的七百余人，在中共中央关怀下，经陈云滕代远营救进入新疆，后来回到延安。另一路在祁连山地区进行了一段游击战争，也有一部分陆续回到延安。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和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反党分裂活动作了总结，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执行的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他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是共产党内空前的罪恶行为。在组织上，他在党内搞家长制度，以惩办和恐吓来代替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和整个红军的全体干部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接受教育，做到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地为党的正确路线而奋斗到底。

四 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同时成立了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一三六页。

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以后，实行了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大批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瑞金被杀害的有十二万人，平江被杀害的有十三万多人，宁都有八千三百多户被杀绝，闽西被杀绝四万多户。国民党匪军在江西和闽西屠杀了八十万革命人民。茶陵县上岩乡六十里茶山，被焚毁五十四里。平江徐家洞等六个乡的二千四百七十余栋房子，烧剩六百五十栋。闽西有五百多个村庄被毁掉。有些地方，如新县至麻城、罗田间，八十里内的村庄全被烧光，成为一片荒凉的无人区。国民党组织“靖卫团”、“铲共团”、“返乡团”、“义勇队”、“清乡委员会”等，纠集地主恶霸对苏区的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利用反动武装威逼贫苦农民，抢走土地房屋和其它财产。

为了断绝人民群众对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的支援，国民党还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血腥措施，大规模地“烧山”、“封山”、“砍山”、“并村”、“移民”，强迫山区人民搬到敌人据点里去住。严密保甲制度，加强基层反动力量。村村筑碉堡，处处安据点。反动政府规定每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油盐和日用品，违反规定就以“通匪”论罪。

但是，敌人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把苏区的革命人民吓倒。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方方、傅秋涛等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军民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闽赣边、赣东北、闽西、闽北、闽东、闽南、浙南、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和广东省的琼崖等地区。

中央苏区丧失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区域坚持斗争。失利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退入南岭一带，分散活动。十一月，赣粤边特委建立了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分局也来到油山。中央分局召开了干部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从此，在中央分局直接领导下，赣粤游击队以油山为中心，在江西的信丰、赣县、龙南、上犹、广东的南雄、湖南的桂东一带，展开了游击战争。

闽西苏区的人民和独立第八、九两团革命武装，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八个主力师的“清剿”，坚持了闽西区的斗争。

在鄂豫皖地区，少量的红军部队和地方部队，面对二十万敌人的“清剿”，仍然坚持斗争，并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了自己，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八军，以大别山为依托，进行反“清剿”斗争。

其它各个区域的游击队也都向敌人开展反围攻反“清剿”的斗争。在浙南、浙闽赣边，有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部分武装进行斗争。湘赣区有新成立的红十六师坚持武装斗争。闽北、闽东区有红军的独立游击师开展游击战争。此外在湘南、湘鄂赣边等地，都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些负责人。后来何叔衡在转战途中牺牲。瞿秋白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武平被俘，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就义。

南方根据地军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地区的红军部队合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

第三章 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

第一节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

一 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的加深

正当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敦睦邦交”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将它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平、津、冀、察。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借口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六月初，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七月六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承认日本的要求，内容包括：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这一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察哈尔驻军逮捕了在察省活动的日本特务，随即释放。日本又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的要求。六月二十七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代表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即《察哈尔协定》）。内容包括：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在察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察哈尔全部撤退，察省主席撤职等。从此，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日本侵略者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一九三五年九月，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表声明，提出华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十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十月十三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具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十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者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暴动，占领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毒犯，向国民党政府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日寇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所谓“内蒙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派特务头子土肥原到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进行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能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致使华北政权公开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又慑于日本的武力不敢拒绝，于是再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各方商议解决办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十七名委员中，有宋哲元派，有蒋介石派，也有汉奸亲日派。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没有公开挂“自治”的招牌，但已把冀察置于南京政府管辖权之外，成了变相的“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汉奸和日本浪人随意横行，无人敢阻止。驻华北的日军时常举行演习和进行挑衅活动。国民党军政官员争相携带家属南下。故宫古物陆续南运。各

大学当局准备南撤。这种险恶的形势正如北平学生所说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二 国民党内英美派同亲日派的分化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华北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加紧进行经济扩张。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的头子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说：“现在，满州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华北“将来在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和经营，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三倍，民众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长，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为了加紧对我国华北进行新的经济扩张，日本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课，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立了经济顾问部。日本驻华大使馆扩大了“调查工作”的范围，在华北各处进行经济调查。一九三五年八月，日本政府决定改组“满铁”，并由“满铁”在天津设立兴中公司，从事“开发华北经济”，加强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兴中公司设立后，日本资本在华北迅速扩张起来。华北的铁路、航空、矿山、工业、商业、贸易、金融大部分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经济势力的大力扩张，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英美不甘心日本抢走他们在华北的经济权益，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表示反对，并以扶植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英美派来抵制日本。英美的报刊也不断责骂日本是“黠武的国家”，是“国际上的强盗”。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并加入英镑集团。日本驻华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加以反对，叫嚷“为防止华北所存白银南运起见，将不辞发动实力以阻止之”。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声称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占中国的危险，必须“采取予以彻底阻止的办法”，即“利用这个机会一举”策划华北各省“独立”。并说这是“时不再来的绝妙机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订立“白银协定”，使“法币”又与美元发生联系。这样，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因而促进了国民党内英美派与亲日派的分化。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华北进行经济扩张，也严重地损害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来自关税，自塘沽协定签订，特别是从何梅协定以后，由于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使海关收入急剧减少。这使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四大家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逐渐上升。国民党内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和分化也日益明显起来。

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媚日的“敦睦邦交令”，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也借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向亲日派发动了攻击，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和发布“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在全国人民的指责下，在英美派的抨击下，八月，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不得不提出辞职，后来虽然由于蒋介石的“慰留”而又复职，但斗争仍在继

《清华救国会一二九告全国民众书》，《清华副刊》第四十五卷第八、九期合刊。

见《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第一一四——一一五页，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五月版。

续。十一月初，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时，汪精卫被刺受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

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不断扩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英美派和亲日派发生分化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难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日高，这次代表大会较之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说算是一次统一的大会。冯玉祥、阎锡山参加了大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然没有亲自出席，也派代表参加了。宋哲元、韩复榘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在大会开会前后致电代表大会，提出“政权开放”、“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暗中与国民党中央对抗，但也表示“服从中央”。

大会听取了党务、政治、军事等报告。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演词。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但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说在这次大会最重要的一件事，表示国民党对日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大会通过决议接受宪法草案，授权五届中执会对宪草修正后公布，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仍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后补执行委员共一百八十人，中央监察委员、后补监察委员共八十人。大会通过了宣言。

大会后，十二月二日召开五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宪法草案，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丁惟汾、叶楚傖、孔祥熙、邹鲁、陈立夫九人为常务委员，主席胡汉民，副主席蒋介石。推选张人杰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会议又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向会议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

行政院作了改组，改组后各部门的主要官员是：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长张嘉璈。行政院又以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任参谋总长。

这次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大会后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国民党的对日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即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二）表示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三）这次大会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中也包括了各派系的分子（当然很多人只是担任闲职），表面上表现了空前团结的现象。（四）政府机构中罗致了少数“学界名流”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表现了一点开明的姿态。所以当时的舆论说：“此次中枢的新组织，惹起一般国际上的注意，各国都

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认为比较举国一致的政府，日本亦然”。

三 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要求的进一步增长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大大缩小。在华北，日本通过武装走私，大量倾销日本商品，又大量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市场。例如，日本以各种方式掠夺华北的棉花，冀、鲁、晋三省生产的棉花几乎完全为日本所控制。这样就使中国自己的棉纺织工厂不能直接从华北农村得到原料供应，反而要高价从外国购买棉花，因此提高了棉纺织品的成本。加以日本纺织品大量走私，充斥市场，在日货的排挤下，中国的棉纺织厂大量倒闭。日本还在华北大量投资，排斥中国资本，并吞和掠夺中国的工厂，使面粉、卷烟、火柴等民族工业也都处在危机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不但使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大受打击，也影响到其它地区民族工业的生存。正因为民族的安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日益增长。华北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外交整个是消极被动。指责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在中国造成了‘爱国有罪’的局面”。他们发出“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不到最后的时期是不便牺牲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便要抵抗等等空话很不满意，他们质问说：“甚么算是最后的时期，我以为沈阳失陷那是最后的时期了！……你说现在还不到最后的时期，那么最后的时期究竟是那里？”他们表示“深愿舆论界一致奋起”，“赶快督促政府以全力对外”。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政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四 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进一步增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

一周简评《中枢新阵容》，《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努生：《万般有罪，爱国无罪！》，《自由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出版。

杜重远：《狱中的收音机》，《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吴斯麟：《绥东问题的严重性》，《自由评论》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三三页。

抗日联军”。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宣言，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这个宣言还具体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十二月九日，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城内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冲破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和拦阻，聚集到新华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党驻华北当局代表请愿。由于反动当局无理拒绝了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要求，他们义愤填膺，立即举行了游行大示威。当游行示威的学生队伍来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又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同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学生们和反动军警搏斗了一天，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城外的学生队伍，由于城门紧闭，被阻止在城外。他们一面与守城军警作斗争，一面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寒风中，从黎明坚持到黄昏。十二月十日，北平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斗争。

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冲破军警的包围袭击，经过与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反动军警的几次搏斗，在天桥胜利会师，举行了有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声震云霄。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一）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四）反对华北自治。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又一次对学生进行镇压。一天中逮捕的学生有二、三十人，受伤的将近四百人。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和支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长沙、杭州、西安、重庆、南宁、开封、徐州、太原等地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行动起来。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十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声援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接着，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抗议。上海总工会、上海文化界、北平文化界、北平妇女界都发表了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讨伐伪组织，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从此，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统治，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部队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

五 瓦窑堡会议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华北事变后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分析，并根据这一分析制定出新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会议决议正确地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决议指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可能，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决议还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形式。决议宣布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自己的政策。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决议最后提出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附庸。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

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同样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长期性，就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报告在充分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后，对比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线，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批判。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策略同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统一战线策略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关门主义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统一战线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在深刻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报告又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作用的重要，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和巩固红军和根据地，指出：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他告诫全党必须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败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各抗日阶级进入统一战线，报告阐明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各项政策。人民共和国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它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人民共和国的纲领和政策，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既批判了当时阻碍革命和抗日事业发展的“左”倾关门主义，又指出了必须不再重复一九二七年时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既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及其根据地。报告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调整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一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由于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英美派地主买办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在逐渐地发生着某种变化。

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发表所谓“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部；（二）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并宣称中国政府“对以上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说：日方所说“对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殊非事实”。三月，中日就调整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中方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之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亦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这次会谈未获得任何具体结果。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增兵华北，国民党政府曾令驻日大使向日本提出抗议。同时，对侵华日军在华北包庇走私浪人，破坏海关缉私，国民党政府也曾多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七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这里，蒋介石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但他又说：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

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间，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强设领事馆，愤而击毙两个日本人）和“北海事件”（日本人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等事件。九月，中日两国再次举行谈判。日本方面不仅要求解决上述事件，而且强迫国民党政府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实行共同防共，华北经济提携和减低关税等，以此作为“对调整邦交具体表示诚意之确实证据”。对此，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谈判无进展。十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表示，解决中日间悬案的谈判，欲求实际上之进步已不可能。他向日本外务省报告称：近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提案之态度已因其国内外之形势转趋强硬。至十二月三日，会谈不欢而散，中日交涉停顿。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对南京国民党政府一面保持隶属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掌握。宋哲元对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重大问题推给南京政府去解

见《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决。而日本方面，一面支持冀东汉奸政权，一面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抓住不放，不断施加压力，力图通过控制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日本政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对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正式把分离华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作为国策，规定“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通过宋哲元来进行，“逐步实现实质性自治，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纲要还决定把“华北工作”完全交给华北驻屯军负责。根据这个纲要的要求，日方多次派人访晤宋哲元，要求扩大冀察“自治程度”，逐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宋也曾亲自到天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会谈。他在某些问题上向日方妥协让步，满足日方扩大冀察“自治程度”的要求。但宋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不同意，因此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三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宋哲元与其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对此外国通讯社有过透露，但宋哲元不敢承认。第二十九军的一部分将领反对屈服于日方压力，国民党中央警告宋哲元不得削弱中央政府在冀察的权力和地位。五月，日本借口“共同防共”，大量增兵华北。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大示威，抗议日本增兵。日方要求取缔。宋哲元表示学生行动没有越轨，不便取缔。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在丰台无理寻衅，同当地驻军发生冲突。九月十八日，双方又发生冲突。宋哲元屈服于日军压力，下令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撤退。日军乘机占领丰台。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要求宋哲元答应建筑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开辟航空路线、收购华北棉花、输出长芦余盐等。对日方的要求，宋哲元先敷衍推诿，推诿不了就托辞得由南京批准，拖着不办。

此时，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不少人“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他们要求和赞成同共产党重新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推动了国民党当权者对日态度的转变。

二 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调整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一二九运动以后，中国国内形势朝着抗日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这时，如何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把动摇的阶级或集团引导到抗日的目标上来，或者迫使他们不得不走抗日这条路，如何使广大群众的斗争目标集中到当前首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并把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共产党面临的迫切任务。党必须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改变各项不合时宜的和原来就错误的政策和主张，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党正确地实行了这个艰巨的复杂的转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因此“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同时，为了团结中农，发展生产力，也必须改变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决定指出：在白区“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见《六大以来》（上），第七七六页。

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它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将领发表《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是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抗日反蒋”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重申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二月，共产党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以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总司令。十七日，发表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动群众抗日，并准备开赴华北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阎锡山调遣大批军队阻拦红军前进。红军给予阎锡山部队以打击，共毙伤俘敌军一万七千多人，缴获很多武器弹药，在二十多个县发动组织了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壮大了抗日力量，扩大了新兵七千多人。这时蒋介石一面调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入山西，阻止红军东进；一面下令驻在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向陕甘红色区域进发。五月五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通电申明：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通电正告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通电最后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书国民党，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同时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的报告，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共产党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但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致国民党书还指出：全国人民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是与全国人民的这种愿望背道而驰的。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指示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就愈能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指示正式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极为重要的改变。

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十七日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中央认为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决议还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应该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但在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三 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的论述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开始转变。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有深远的影响，党内许多人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认识不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路线不理解或理解不深，因而实现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工作的。一九三五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刘少奇到达天津。

以刘少奇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实现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重建和加强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把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的轨道。北方局采取了荫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正确方针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七七事变前，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

其次，北方局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在北平成立了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和妇女各界人士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又在许多县城建立分会，还成立了华北各地的学生救国会。党通过这些组织，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公开半公开的抗日救亡刊物和许多小册子，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戏剧团、下乡工作队等，深入工厂农村，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同时，还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口号，开展政治的示威、请愿、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反对武装走私等斗争。

第三，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同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

军转向抗日，共产党组织说服群众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去工作，同这些部队的上中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并发动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对部队进行慰问和宣传。

由于北方局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后，用很大的精力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他写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上发表主要针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文章《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刘少奇在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各阶级的动态以后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但是如果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的开展。他系统地指出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他说：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总是盲目、莽撞”，特别是纪念日，几乎成了“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他们完全“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他们“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而是“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他们“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拒绝同盟者。总之，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刘少奇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他主张要“大胆放手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刘少奇的这篇著作，对于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它在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对于实现全党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对党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十一月刘少奇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教材，在《火线》上发表。他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他说：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一个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党策略上的转变，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党绝不在统一战线中束缚自己的行动，取消批评的自由。党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党一方面与各党派联合进行抗日斗争，但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党一方面为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但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他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

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领导权属于谁，这是要靠斗争来决定的。他指出：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他指出：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同时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和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最后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之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封建势力与汉奸，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尚理想。”

四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一二九运动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一九三六年一月又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学生运动开始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学生“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一月下旬，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在京（南京）沪铁路沿线的农村，用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在沿途各地组织了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广州、徐州、济南等地学生，也先后到农村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各地学生到农村去进行宣传，不但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了广大农民，也使青年学生从农民那里受到教育，得到锻炼。

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逮捕爱国学生。本月，仅北平被捕者就达二百余人。三月，河北高中一学生惨死狱中，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于三十一日举行了抬棺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有五十余人当场被捕。四月，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学生运动进一步与社会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了。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为名大量增兵华北，并在古北口等地筑炮台。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示威。六月十三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罢课，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天津、北平学生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示威游行迅速扩大到全国，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

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大起来。一二九运动一爆发，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动，于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

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宣言说：“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十二月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八项救亡主张：（一）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的外交经过；（二）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三）停止一切内战；（四）武装全国民众；（五）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六）罢免并惩办一切卖国的亲敌的官吏；（七）对敌经济绝交，全国恢复抵制仇货；（八）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紧接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正式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表示对“任何压迫，无所畏惧”，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把爱国救亡运动说成是“共产党阴谋”，借以威吓各界爱国人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一文，严词批驳国民党中宣部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恶意攻击，要求国民党政府“纠正自己的谬误”，“转变”“亡国灭种的政策”。

妇女界也奋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妇女界成立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妇女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并举行游行示威。

一二九运动后，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武力讨伐汉奸殷汝耕。十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职工，号召他们在各地、各工厂，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号召组织工人救亡会、各业工人抗日救国会，与全国各界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此后工人的斗争一直在继续。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大公纱厂日本监工打死中国工人，上海工人立即举行了反日示威和罢工。这次斗争推动了已经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十一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至十二月，先后参加罢工的共二十六个厂，四万五千余人。为了响应上海工人的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多人，在十二月宣布总罢工。上海、青岛工人的大罢工，带有浓厚的抗日性质，并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融成一体。

在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团体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基础上，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大会宣言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说：“我们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取正统，而只是要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见《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我们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而决不愿帮助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自然，对于任何当局对敌人的妥协，我们要反对的，是要严重抗争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中央当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主张，大会“在原则上完全赞成”。但大会认为国民党“一面主张精诚团结，而一面又主张暂置外侮于不顾，先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己”；尤其最近颁布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不但丝毫没有表示放弃一党专政，反而想进一步在立法上巩固一党专政的基础，加紧对异己势力的压迫。“这种褊狭的、意气用事的见解和带有权术意味的手段，和精诚二字是背道而驰。”宣言向各党各派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全国各党各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可以有不同主张”，“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他们指出：（一）蒋介石“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应该赶快设法，作抗日救国的真正准备”。希望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三件事做到后，“内”不必“安”而自“安”。随后更希望蒋介石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二）同情西南当局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但希望西南当局“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当局对立的态度”，并在自己直接统治的区域内“使人民有抗日言论及行动的绝对自由”。（三）希望华北当局“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再逮捕殴打抗日的民众”。（四）希望“握着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五）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那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纠正”“共产党里面的左倾幼稚青年的个别行动”和“宗派主义包办方式”。（六）希望一般大众了解，目前我们民族的大敌只有一个，我们只有把这共同的大敌打败以后，才能彻底解决一般民众的生活问题。所以在目前，我们“只有暂时忍耐些，迁就些，避免为了我们内部的纷争，削弱抗日救亡的力量”。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纷纷成立，救亡刊物也大量地涌现出来。据统计，全国救亡刊物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

《大众生活》，虽有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和扣压，但每期发售量达十五万份以上，创国民党统治区刊物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正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时，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在上海悍然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危害民国”。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立即举行援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压迫。北平、西安等地都举行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七年六月，宋庆龄等十七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为此发表宣言，全国各界纷纷响应。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沈钧儒等七人光荣出狱。

五 国民党“五五宪草”的公布

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兴起的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也乘机摆出拥护“民主”的姿态，表示赞同舆论界关于“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其中最活跃者为孙科等人。一九三二年四月，孙科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一九三三年一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成立以孙科为首的四十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但是“制宪”工作逐渐为蒋介石所控制，“制宪”成了蒋介石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段。“制宪”工作从一九三三年二月正式开始，到六月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接着便是根据蒋介石的意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而每经过一次修改，民主的气味就愈加减少，独裁的成分就愈加增大。首先是将初草中的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将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改为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将除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外，其余四院院长均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改为四院中的司法考试两院院长亦由总统任免（经立法院同意）。一九三四年十月，立法院对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国民党中央审核。之后，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删去了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副总统及省长的限制。这当然是为了保证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军阀对中央和地方大权的控制。同时还确定司法院长考试院长不须经立法院同意而直接由总统任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接受宪法草案。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对宪草内容又作了一些修改，特别规定了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并决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宪法草案，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宪法草案正式颁布，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宪草”。

宪草全文共八章一百四十八条。从形式上看，不无资产阶级民主的词句，但这不过是一种装饰。宪草适应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需要，在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实际规定了总统独裁制。它赋予总统以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的种种大权。除了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宣布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至于所谓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只有形式上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四种权利，它不但不能决定一切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也无权干预或监督这些方针的执行。而且，大会每三年才由总统召集一次，会期一至二个

月，又无常设机关，所以只不过是一个装璜门面的空架子。宪草以专章规定了“人民之权利义务”，但所有关于“权利”、“自由”的许诺都是虚伪的。每项“自由”规定之后都写明“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字样，就是说，国民党政府为了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可以随时抛出某种法律，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宪草对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工矿企业所有权、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权等，做了种种具体规定，给予“合法”保护。很显然，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出的宪草，体现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是一部反人民反民主的宪法草案。

国民党政府在颁布“五五宪草”之后，还进行了所谓的“国大”代表的选举。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其中规定：“国大”代表总数为一千二百名。选举分为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三种。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的候选人，分别由各县之乡长、镇长、坊长和机关职员推选，最后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按：共计一百四十人）为“当然代表”。至于选民资格则规定：年满二十岁的中华民国国民，“经公民宣誓者”才有选举代表之权。就是说，必须宣誓拥护国民党统治者，才有选举权。到一九三七年四月，立法院又对这两个法律进行了修正。其中，虽然由于人们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但同时却又规定：另设“指定代表”二百四十人，国民党候补中、监委员（按：共计六十八人）也得为“当然代表”。这样，“当然代表”、“指定代表”、“特种选举代表”（实际亦为指定代表）总计达六百余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余的为区域和职业两种“民选”代表。而所谓“民选”代表的选举，也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进行。整个“选举”活动，腐败不堪。当时舆论界辛辣地指出：“国民大会中有当然代表，这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前例”（北京《晨报》）。“国民大会代表共一千余人，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连特种选举在内）几及全数之半，……再加上国民党之被选代表，则国民大会几成为清一色的政府派”了（天津《益世报》）。“自选举以来，金钱之活动，权势之滥用，形形色色，日有所闻，言之痛心，此种军阀官僚时代‘猪仔买卖’之丑态，若不根本扫除，则复选时之流弊将更不堪设想”（上海《中华日报》）。

这样一个由国民党一党包办、腐败透顶的选举，以及将由这样的选举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自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无情揭露。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把戏也就收场了。“五五宪草”是国民党正式颁布的一个反人民反民主维护法西斯专政的文件，它是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此，坚持还是反对这个宪草和由国民党包办产生的“国大”代表，成为以后中国政治史上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一个主要问题。

第三节 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 两广事变 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发生了两广事变。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矛盾很深。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突患脑溢血死去，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乘机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广东军阀陈济棠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联络李宗仁等人，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进行反蒋。六月一日，两广军阀组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六月二日，又通电全国。六月四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将领数十人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六月二日的通电，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出兵湖南。南京政府调集部队进入湖南防御。一场争夺权利的军阀战争又将爆发。这就是两广事变。

对两广事件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切。他们要求南京政府接受西南当局的抗日要求，同时要求西南当局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抗日诚意，希望双方和平解决。蒋介石对此事件，一面派出军队准备作战，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下。七月，粤方空军司令率飞机几十架投往南京政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南京中央。这次反蒋行动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七月十三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离开广州去香港。李白二人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接受所命职务。但不久蒋又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调李宗仁到南京军委会任职。李白复电说：“殊难遵命”。蒋又电李白，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为军军委常委，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桂局善后。李白仍表示难以从命。蒋即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方面也全体动员，十余万军队准备作战，内战一触即发。全国上下对此一致反对，蒋被迫收回成命。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广州会晤，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这次蒋桂军阀准备打内战，受到全国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强烈反对。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一种表现。这次内战得以避免，是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起作用的结果。

一九三六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五月又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组织伪蒙古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八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协助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开始侵扰绥远。十一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王英等部向绥远大举进攻。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后又收复大庙。

绥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从城市到乡村，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团体都尽其所能声援绥远抗战。一九三六年冬形成援绥热潮。北平学生募集万件皮衣，各地女校赶制丝棉背心，上海学童捐助买早点和糖果的费用，穷苦同胞也节用汗血微资援助绥远抗战，据统计全国捐款达一百二十余

万元。绥远抗战和绥远运动是抗战形势高涨的一种表现。

二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争取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

驻在陕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即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因为东北沦陷，退入关内，备受歧视，被蒋介石调到陕西进攻红军。西北军也同蓄意消灭异己的蒋介石有矛盾。这两支部队对蒋介石借内战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他们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什么前途。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深感家乡沦亡的痛苦，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渐高涨。

共产党鉴于东北军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绪，对这支部队采取争取他们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红军将领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同年四月九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取得了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具体成果。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有重要的意义。

共产党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开始得还略为早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亲笔信派汪锋去找杨虎城。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四月，王炳南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到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

在对张杨等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共产党和红军对其部队下层也展开了积极的统战活动。如释放俘虏、双方前沿部队友好往来等。由于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就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共的常驻代表。在张杨实现与共产党联合的过程中，张杨之间也实现了团结。这样，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

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一九三六年十月，两广事件刚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飞到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同时，紧张地部署“剿共”军事，将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纷纷北调，在平汉路、陇海路一带集结数十万军队，待命向陕甘进发。还调动了一百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战场。

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发表谈话，声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主动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于十月三十一日，颁发对红军的总攻击令。红军多次退让，最后被迫应战。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这是结束国内战争的最后一仗。

十二月初，蒋介石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蒋调集的部

队纷纷开赴潼关，嫡系重要将领陈诚卫立煌等也陆续来到西安。战云笼罩了西北。蒋介石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进攻红军。中央军则在后面接应督促。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就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并借机搞掉张杨的军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对抗日青年进行逮捕和屠杀。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反对，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

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十二月七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蒋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至此，张学良只得硬干，准备实行“兵谏”。十二月八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抗日。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蒋介石听到消息，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制止，如学生不听，就派军警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劝阻学生回去。请愿学生向张悲愤陈词。张大受感动，当即保证，一定抗日，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十日和十一日两天，张杨加紧进行扣留蒋介石的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张杨下令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陈诚、卫立煌等十多人也被拘捕。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发出后，张杨又采取了若干重大军政措施。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种势力都从各自的国家或阶级、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事变作出不同的反应。

在国际：德、意、日帝国主义，是一向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的。特别是日本对事变更加关切，起初它得悉事变由主张抗日一派将领所发动，颇为惊恐。但又觉得既然蒋介石是亲英美的，未尝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扶植亲日派何应钦上台，更便于它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它竭力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趁火打劫。十九日，日本外相约见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表示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一定强硬反对。日本政府一再声言，要南京政府不得做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并支持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与何应钦组织亲日的政府。英美早已不满日本得寸进尺地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它们非常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使它们在华的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害。所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以便维持住蒋介石的统治。它们看出张杨通电的中心是抗日问题，所以主张蒋和张杨妥协，反对南京政府讨伐张杨，并一再声言愿意进行调解。苏联在事变后，《真理报》、《消息报》均发表社论和评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因此“切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但又说张杨的举动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甚至怀疑有日本人的策动。

在国内：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有野心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力主“讨伐”。这一派的主张开始时占了优势。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南京政府决议

“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立即调派大批军队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扬言要轰炸西安。一些汉奸和伪军头目如李守信也发表通电，声言愿与南京合力讨伐张杨。一时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南京政府中以英美为后台并与蒋有密切关系的宋氏家族和孔祥熙等人，坚决反对何应钦等“讨伐派”的主张。他们认为“讨伐”西安，势必置蒋于死地。蒋介石一死，英美派就会失去重心，亲日派可能上台，将严重损害英美派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当时，在南京的冯玉祥等，也主张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冯玉祥曾电劝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宋孔这一派的主张很快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上风，最后决定着手营救蒋介石。他们找到端纳（澳大利亚人）这个代表英美利益并先后作过蒋介石与张学良顾问的人，先飞西安进行试探。

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多数都不表示支持张杨。只有广西的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比较明确支持张杨，主张西安事件“用政治解决”。绥远抗战的领导人傅作义，也是支持张杨的。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曾表示支持张学良逼蒋抗日，但事变发生后，他却致电责问张杨，并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他掌握，想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宋哲元、韩复榘等表面拥护国民党中央，实际主张杀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中间阶级是一个“晴空的霹雳”。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大多数人谴责张杨，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内战”。“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即恢复蒋先生自由，和中央割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事变后，张杨部下将士和西安人民，多数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元凶。张杨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张自始就抱定主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杨却倾向于惩办蒋介石。由于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变变的明确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的歧异，看到讨伐派气焰的嚣张，看到全国许多舆论的谴责，感到非常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因此，他们盼望中国共产党赶快派代表团来共商解决变变的办法。

当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传到陕北时，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兴奋极了。近十年来，蒋介石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不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恨之入骨，全国觉悟的群众和爱国军人也是一腔怒火。因此绝大多数人主张杀蒋。但不少人担心内战再来，也忧心忡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肯定了变变的进步性质。同时又根据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

大规模内战，“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为实现第二个前途，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目的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十二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西安。代表团在西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西安谈判。经过两天谈判，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蒋介石被迫答应履行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但蒋介石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张杨同意了他的要求。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

二十五日，张学良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完全歪曲事实的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并背信弃义地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宣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保证实行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蒋介石必须做到他声明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实行他在西安允诺的六项条件。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介石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介石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介石以去。毛泽东的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全国形势也迫使蒋介石不能再继续采取十年内战的反动政策了。

四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及其《根绝赤祸案》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

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提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二月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在这次全会上，汪精卫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在讨论这个草案时，除少数亲日分子为汪案辩护外，许多人表示反对。经过斗争，这次国民党全会终于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全会发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但宣言同时又诬蔑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以暴动手段危害民国”。恶毒地说：“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这说明国民党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这次全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对共产党大肆诬蔑一番后，胡说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向国民党“输诚”，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主张是允许共产党“自新”。该案说“赤祸必须根绝”，而“根绝”的“最低限度之办法”有四点：“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由武力“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这是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国民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根绝赤祸”则是它的根本方针。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国民党这个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根绝赤祸”的办法，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方式。

五 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斗争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不得不开

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但是，它的政策并没有彻底转变，它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新外相佐藤虚伪地表示要改善对中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对日本大使表示说：“本人热望调整中日邦交，对佐藤外相演说，至堪钦佩，愿在事实上努力促其具体化。”国民党政府在国内继续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和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坚持其法西斯的“五五宪草”和钦定的国民大会代表为有效，用以抵制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要求。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苏州对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进行审判。压制上海等地的反日罢工斗争。强令东北军东调至河南和安徽，隔离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并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迫使杨虎城去职出国。在国共谈判中，企图使共产党放弃独立性和对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并继续围攻共产党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达到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他们的“武力统一”的反革命内战政策破产以后，又在抗日的幌子下打出了“和平统一”的旗子，提出了“统一救国”、“统一抗敌”诸如此类的口号。他们说“统一决定一切”、“统一为民族和民主的关键”。他们的所谓“和平统一”，一是统一军队，二是统一政权，三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实质上就是你交出政权，交出军队，我给你“和平”和“民主”。企图以此实现消灭共产党、红军和人民革命力量的阴谋。

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的。但是他们只看到当时蒋介石集团拥有统治全国的政权和几百万军队，认为抗日主要应当依靠国民党。他们对蒋介石抱着很大幻想。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反对独裁，要求民主；一方面又主张以“国民党为中心”，主张“无条件地统一”，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取消斗争。

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主张“无条件统一”，甚至为了“统一”，主张取消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张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北平学联。

上述情况说明，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抗战，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但必须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作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而且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展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分子，争取动摇分子，反对亲日分子，以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更大转变。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及时地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并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新口号。

共产党认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告全党同志书》的发表，为召开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做了准备。

六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及时防止投降主义，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分析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把中国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也把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推入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这种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国家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毛泽东根据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具体情况，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民主，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共产党内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这时，党内有“左”倾观点的人，否认国民党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清除这种倾向，才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则以民族斗争来否定国内的阶级斗争。他们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只讲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与民主对立起来。这也完全是错误的。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

抗日战争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就不能实现，也不能胜利。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他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些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毛泽东在结论中还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治政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号召全体干部和党员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为造就大批最好的干部，加强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苏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政治路线，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呢？他提出：（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内的民主；（四）不要在思想斗争中随便打击同志，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应用说服、讨论的方法去消除；（五）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应该建立党团；（七）把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结合起来，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八）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九）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刘少奇号召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才能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

这次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制定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对发展党的白区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七 “两个口号”的争论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文艺界许多作家自发地提出了种种抗日救亡的口号，如“革命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战争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一九三四年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呀”。这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从一九三五年春起，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从报刊上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和王明的发言，看到了《八一宣言》。由此知道党的策略方针已经作了重大改变。八月十一日左联在莫斯科的代表萧三给左联一封信，转达王明的意见，建议解散左联，“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使文学运动“符合”“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五五——七一页。

企（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线”的要求。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文化界联合抗日的要求更加迫切。十二月，周立波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他说：“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面，除汉奸和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以外，都是战友。而“国防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的”。一九三五年底，共产党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其后，周扬等进一步提倡国防文学。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一文说：“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中之最中心的主题”。

正当一部分革命作家大力提倡国防文学的时候，鲁迅同刚从延安回来的冯雪峰商量，“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在五月初间让胡风写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胡风在文章中指出：这种文学主张“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它正是现实的社会要求在文学上的集中的表现；然而，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这种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

随后就展开了关于文艺的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主张国防文学的文章主要有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现阶段的文学》（六月二十五日），郭沫若的《国防·污地·炼狱》（七月十日）等。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主要有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八月十五日）、茅盾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八月十日）、冯雪峰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九月十五日）等。

在争论过程中，有些主张国防文学的文章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右的错误的表现是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例如，新认识社发表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认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甚至有的文章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

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个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

立波：《关于“国防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二六五、二六六页。

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二九页。

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五三二页。

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二六页。

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鲁迅并且强调这个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的口号，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这“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

郭沫若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但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茅盾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我们所希望的是全国任何作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但在创作上需要有更大的自由”。

经过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文艺界逐渐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代表新旧各派的作家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丏尊、张天翼、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冢壁、黎烈文、鲁迅、谢冰心、丰子恺共二十一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认为“言论的自由，急应争得”，“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八 抗日民主思想运动的开展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文化思想上存在着一股相当大的反动逆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制人民大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极力推行愚民政策，热衷于封建文化的鼓吹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主张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提倡迷信、崇佛、独断、盲从。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役中国人民，也极力利用中国文化的封建糟粕，大肆宣扬纲常名教，大搞尊孔读经、旌表孝子、褒奖烈女，在它势力所及的地方建立佛寺和许多光怪陆离的佛教团体，用以麻痹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的斗志。上述情况，要求开展一个抗日民主的思想运动，以抗击文化思想上的逆流，推动整个抗日运动的深入开展。

同时，由于共产党“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文化思想界还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一些人站在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上，拒绝成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五九——五九一页。

郭沫若：《国防·污地·炼狱》，《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三三八、三三九页。

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三四九、三五一页。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三、四三一页。

文化界的统一战线。这也需要开展一个思想界的统一战线运动，以适应党的策略方针的要求。

一九三六年秋，共产党人首先提出开展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启蒙运动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广泛的响应，很快形成了群众性的讨论。一九三七年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后，这一讨论达到了高潮。在北平，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以后，进步的文化人和救亡团体，到处讨论着怎样重新评价五四运动，怎样批判地接受“五四”未完成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口号：“纪念‘五四’，要开展新启蒙运动”。在“五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北平的许多报刊都出了“五四”纪念特刊，对“五四”进行重新估计和阐发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和内容。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召开了许多纪念座谈会，热烈讨论提倡科学民主，反对迷信愚昧和封建思想等问题。五月中旬，吴承仕、张申府、张友渔、黄松龄等成立了专事研究和推动新启蒙运动的启蒙学会。

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攻击和诬蔑。五月二十日，反动教授杨立奎，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次日又通电全国声讨，接着又在各报上发表书面谈话，攻击新启蒙运动“反对礼教”，“狂悖荒谬”。

但是反动派不能阻挡进步潮流的前进。除少数反动文人以外，文化界的各派人物，尽管具体意见不同，但都认为目前有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运动的必要。汉夫、周扬、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征农等人经过集体讨论，写成《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文，这是一篇论述比较全面的纲领性文章。文章说：“为了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势力，都在一个大前提下，精诚的团结起来”。“思想界的团结，亦足以打破箝制，更可以迅速的肃清一切不利于民族的思想，启发民智，唤醒民众，早入真理和光明的大道”。文章认为思想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以民主主义为中心。反对公式主义和教义化，提倡认真研究的精神，开展思想的批判，反对思想自由的压迫”。开展这次思想运动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对参加这个思想运动的各思想不同的个人和派别，并不要求其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在讨论争辩中，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优点。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二）“批判应该是为了真理的追求”。批判的对象，应是对方的学理的真理。批判的标准，要从是否有利于民族出发。（三）“在思想运动中反对封建，是反对封建思想”。对于有这种思想但反对异族奴役的人，“应采取宽容态度”。

根据当时的讨论，关于当前思想运动的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个运动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自由主义或说是民主主义的，是理性主义的。开展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主主义的发扬，也是为了追求真理。后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指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传播和研究。因此主张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决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这一点，在文化思想界工作的共产党人，许多人是明确的。但也有人产生了模糊的认识。

这个思想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但又与五四运动不同。它的发生固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但又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它是由共产党人倡议，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为主导思想。这次思想运动的广泛开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不久全民抗战就爆发了。这样，思想运动就被抗战的政治军事

实际行动所代替。这个运动对宣传抗日、科学、民主，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九 《实践论》和《矛盾论》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即将到来。在这革命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重要关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路线觉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先后写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深刻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系统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接着又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发表了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全面地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为了说明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的原理，毛泽东阐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得到感性认识。社会实践的继续，感性认识的东西就会在人们头脑里发生认识过程的突变，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们脱离具体实践，轻视感性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不调查，不研究，只凭主观想象或从本本出发，去指导革命，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把革命引向失败的道路。经验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拘守于感性的、局部的经验，看不见革命全局，结果也使革命受到损失。

毛泽东又指出，认识由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认识运动并未完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运动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重大。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实践，检验和发展认识，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可能在一次认识过程中完成，而是需要经历多次的反复。同时，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过程也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

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指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思想落后于实际，不但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而且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王明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总之，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基础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的《矛盾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从世界观的高度，彻底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以及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首先指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为了扫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否认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生搬硬套外国经验的错误，毛泽东着重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带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没有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没有矛盾的普遍性。因此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分析矛盾和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而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失败。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时，毛泽东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特别提出来加以分析，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加以正确处理，其它次要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同时，每个矛盾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不平衡的，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位置，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一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对于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他指出：所谓矛盾的同一性，就是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互相转化。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存在着斗争，并促使这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种“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论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矛盾的这两类斗争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特别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用“过火的斗争”解决党内属于非对抗性矛盾的错误。

毛泽东的伟大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根源，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展，为革命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这两篇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原则，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两篇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 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一 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广西。

一九二二年春，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领导农民进行反地主豪绅的斗争，曾经攻占县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在梧州开始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九二五年冬到一九二七年韦拔群等在东兰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数百人。农民运动在右江流域，随后在左江流域都开展起来。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党组织在广西受到极大摧残，转入地下。一九二七年冬，桂系军阀以四个团的兵力，对右江地区进行“围剿”，韦拔群领导右江地区的革命群众，转入东兰、凤山山区，坚持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干部到广西，恢复了党的工作。六月，在广西贵县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恢复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委。一九二九年夏，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来到南宁，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九月，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百色起义后，成立了有汉、壮、瑶等民族参加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田东县平马镇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壮族）、陈洪涛（壮族）和韦玉梅（瑶族）等担任委员。一九三〇年二月，在左江地区举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后作战失利，并入红七军。

一九三〇年五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为了增加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苏维埃政府还公布了《共耕条例》，推广互助合作办法。

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七军离开广西北上，韦拔群、陈洪涛领导红七军二十一师，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

一九三一年初，桂系军阀以七万余人的兵力，向右江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师改编为右江独立师，在河池和东兰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三二年九月，国民党调集了两个军的兵力，向以东兰西山为中心的右江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实行野蛮的“四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铲光）。仅东兰、凤山一带，被烧民房一万多间，被杀群众两万多。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十月，韦拔群和陈洪涛先后英勇牺牲。但是，红七军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人民一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西各地建立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学生组织了广西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进行爱国宣传。绥远抗战爆发后，成立了抗日援绥后援会，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募捐运动。

二 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蒙古族除主要聚居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余多居住在东北三省、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在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师生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吸收了多松年、李裕智等先进分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政变后，

共产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了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欢迎孙中山北上及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

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大革命风暴，推动了蒙古族人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一九二五年，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了工作委员会，在张家口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会。为了更广泛地开展蒙汉各族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运动，同年还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统一战线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和蒙古族的王公扎萨克，是蒙古人民的压迫者。主张撤废王公专制制度，实行民选制度；召开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王公扎萨克等所有土地均移交民选机关；土地利益之保护，民选机关执行之；废除蒙古地方现行一切虐政等。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热、察、绥三特别区广泛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豪绅恶霸、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著名的孤魂滩事件。一九二六年春，绥远都统衙门在呼和浩特城设立清丈局，企图利用所谓“大照”来剥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和搜刮清丈费；同时勒令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供他们取利。反动统治者的掠夺行为，激起蒙汉各族农民的坚决反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蒙汉各族人民在呼和浩特城南的孤魂滩，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反对军阀政府清丈地亩，反对强迫种植鸦片。会后进行示威游行。示威的群众涌进城内，捣毁了县政府和清丈局。第二天，党又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到绥远都统衙门示威，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取消清丈局，免去土地执照费。斗争取得基本胜利。

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曾在热河配合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攻下经棚、林西、赤峰等地；并和国民军配合，对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合势力进行过多次战斗。在伊克昭盟地区，党领导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转战各地。这支军队由接受党的教育的锡尼喇嘛指挥，屡次打败数倍于自己的陕西军阀部队，粉碎了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动武装。锡尼喇嘛还在乌审旗领导“独贵龙”运动，废除了封建王公统治制度，并在十九个“嘎查”（乡）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这是国民革命时期内蒙古牧业区规模最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蒙古地区的国民党右派也叛变了革命，成立了所谓“清党委员会”，封闭了中国共产党设在呼和浩特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解散工会、学生会，取消农牧民协会。一度打着革命幌子的国民党分子白云梯，投靠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镇压革命运动，出卖民族利益。蒙古族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多松年、李裕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牺牲的。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仍然坚持着革命斗争。由锡尼喇嘛指挥的革命军队，在乌审旗一带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一年多的时间。一九二九年春锡尼喇嘛被杀害，革命斗争受到挫折。

一九二九年，在内蒙东部地区，展开了以嘎达梅林为首的反对达尔罕王出卖蒙民土地的斗争。起义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由八十余人发展到一千余人，到处打击“清丈局”、“安垦局”，使蒙古王公和军阀十分惊恐。起义虽然在一九三一年春被镇压下去，但却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垦荒”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内蒙古东部各盟，随后又向热河、察哈尔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在它占领的地区网罗蒙奸、汉奸，拼凑傀儡政权和伪军。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求得民族的解放，蒙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一年共产党派王若飞等到绥远，加强了党对内蒙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二年，在绥远成立了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在热河、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一九三三年，蒙古地方武装加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打击了侵察的日寇。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企图迅速占领绥察地区。蒙古族的败类德穆楚克栋鲁普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年底，沦亡大祸迫在眉睫的绥远地区，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绥远各界人民联合组织了民族自卫委员会绥远分会，展开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在伊克昭盟设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同年七、八月，又分别成立中共乌审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以伊盟为中心，有计划地领导蒙古族的抗日运动和开展民族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八月，日本指使伪蒙军进攻绥远。中国守军傅作义部奋起抵抗，这就是绥远抗战。由此掀起了全国的援绥运动。

三 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少数民族。全国大多数的县、市都有回族居住，而宁夏、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地，回民较多，居住比较集中。

五四运动中，许多回族群众和爱国人士参加了斗争。天津的回民积极参与了抵制日货运动。回民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济南的回民组织救国十人团和国民外交后援会，进行爱国宣传活动，还砸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报馆。回族青年郭隆真等参加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他们参加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后来成为共产党早期的党员。

一九二三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中，都有回族的先进分子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有从华北、西北来的回族学员，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中，也有回族人民参加。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回族进步人士立即组织了回族沪案后援会，号召各地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捐款救助伤亡。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回民协会。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在城乡回民中也开始建立和发展。一九二六年党在宁夏建立了组织，领导这一地区的回汉人民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在河北的沧县、盐山、南皮及山东的庆云、无棣等县的回民村中都有了党的组织活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陕甘以后，共产党和红军同回族人民有了更多的联系。一九三六年五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宣言“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在回族区域建立回民自己的政府。帮助回民发展武装，建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生活，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回民政治文化水平。宣言号召“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这个宣言公布了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为回族人民的解放指明了道路。

四 藏族人民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

藏族分布在西藏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

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公开策划“西藏独立”。一九一三年十月至次年七月，中英举行了有西藏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这是英国勾结西藏反动派进行分裂活动的一次会议。英国不但企图成立一个在其卵翼下的“西藏国”，而且妄图侵占西藏与印度毗连地方的大片领土。英国同西藏地方卖国分子私行签订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一九一九年九月，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情势下，公布了西姆拉会议的部分内容，并停止了所谓西藏悬案问题的中英交涉。一九一九年十月，北京政府指令甘肃省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西藏，与十三世达赖进行联络。西藏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地方政府立即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直接联系。甘肃代表团的访问，改变了辛亥革命后几年间西藏对祖国的不正常关系。

英帝国主义为了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派遣贝尔率领使团入藏。贝尔除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外，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建议扩编藏军，聘请英国教官帮助训练，向印度购买军火以及由英国人来西藏采矿、办学校等，并建议继续增税，充作扩军费用。贝尔的活动引起了西藏各阶层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九二一年藏历春节，拉萨市民数千人聚集街头示威，并贴出招贴，号召僧俗人民将英国奸细逐出西藏。寺庙喇嘛向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质问，要求查办勾结英人的反动分子。三大寺的喇嘛提出要消灭英国奸细。最后迫使贝尔返回印度。

西藏广大人民和地方当局把贝尔赶出西藏以后，英帝国主义支持擦戎等亲英派反动分子阴谋组织政变，从达赖手里夺取政权。达赖及时发觉了这个阴谋，革去擦戎的噶伦职务，其党羽也被免职。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此后又逐渐地密切了起来。一九二八年达赖主动派遣代表和南京政府联系。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先后派人进入西藏。同年二月，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三月，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南京召开蒙藏会议，西藏当局派遣僧俗官员参加；达赖喇嘛即委命代表常驻南京，一九三一年正式成立了办事处。

英帝国主义极力破坏西藏与祖国关系的改善。它利用掌握着西藏军权的亲英反动集团，向西藏运输军火，帮助亲英派组织“新军”，并派英人担任顾问指挥。作了这一切准备后，英帝国主义就唆使亲英集团，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在自利地方向康、青等地内犯。一九三一年，藏军攻入青海的玉树地区。一九三二年占据苏莽等地。藏军入犯康、青，遭到西藏僧俗群众的强烈反对，拉萨三大寺僧及地方居民当时几至哗变。达赖被迫对亲英派上层加以约束。同时，内犯藏军也由于军事失败，分别与西康、青海的地方军队签订了停战

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世达赖逝世，西藏地方政府当即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入藏致祭，并颁布册封达赖命令。西藏地方的爱国僧侣向国民党政府代表表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愿望。经过双方代表的商议，决定在拉萨筹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增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

在下一世达赖继任以前，国民党政府根据西藏僧俗官民的推举，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任命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职权，管理地方政教事务。热振的任职，是西藏赞成祖国统一势力的胜利。

热振摄政以后，打击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亲英派的势力，发展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一九三四年末，西藏地方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驱逐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势力。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开始采用藏语对西藏广播。同年，国民党政府修正了《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规定该机构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公布了《管理喇嘛寺庙条例》，由蒙藏委员会监督有关事宜。

五 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从一九一二年六月到一九二八年七月，新疆地方政府一直控制在杨增新手中。杨增新军阀政府承袭清政府的统治政策，保留了腐朽的封建王公制度，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杨增新力图在新疆实行长期的封建割据，不参与内地军阀间的混战，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外国实行保持相安无事的政策。在杨的统治时期，新疆的局势比较稳定。

新疆是民族关系和国外关系十分复杂的一个地区。一九二一年白俄匪军对新疆的窜扰，曾给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一九二二年二月末，白俄匪军一万一千多人和随同的“难民”六千多人，窜入我国塔城。六月，经过动员白俄官兵四千多人回国。同年五月，又有一股白俄匪军二千多人窜入塔城。新疆省军和进入新疆的苏俄红军联合会剿，这股匪帮逃至北疆阿尔泰地区。一九二一年在布尔津、承化被打败，残部退往外蒙。一九二一年一至五月，窜入伊犁的白俄匪军和“难民”有五千多人，首领是阿连阔夫。经动员回国的有三千多人。以阿连阔夫为首的白俄匪军，由新疆省政府遣送东去，准备分批送往内地。走到奇台的时候，阿连阔夫发动暴乱，但被制止了。由于新疆省政府处置得当，俄国白匪的窜扰，没有造成多大损害。

一九二八年七月，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被他的属下樊耀南刺死，随后民政厅长金树仁捕杀樊耀南，自任主席，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军阀金树仁承袭了杨增新的反动统治制度，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更加沉重的盘剥和民族压迫。

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哈密地区爆发了由和加尼牙孜领导的武装暴动。金树仁政府派军队镇压。和加尼牙孜一面将主力撤往山区，一面派人去河西走廊向回族军阀马仲英求援。马仲英为了乘机向新疆扩张势力，率军进入新疆。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的联合打击下，金树仁军节节败退。一九三三年春，和加尼牙孜和马仲英的部队进到库车、阿克苏等地，直逼南疆重镇喀什。

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正加紧进行侵略新疆的活动。一九三三年二月，

正当新疆局势日益恶化的时候，英帝国主义策动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墨玉县发动武装叛乱，随即攻陷和田，宣布建立所谓“和田伊斯兰教共和国”。四月，伊敏联络和加尼牙孜所属铁木耳部合击喀什，五月铁木耳部攻占疏附（喀什回城），马仲英部攻占疏勒（喀什汉城），伊敏陷莎车。

这时，金树仁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全省局势的能力。一九三三年四月，金树仁政府中的一部分青年官员，联络驻防乌鲁木齐的“归化军”发动军事政变，赶走金树仁，组织新政府，推举盛世才为边防督办。

盛世才于一九三三年提出“八项宣言”，即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发展教育、实行自治、改良司法。一九三四年又发表“九项任务”，即彻底消灭贪污；发展经济，提高文化；防止战争，保卫和平；动员全疆人民努力春耕；便利交通；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反帝反法西斯，保障中苏永久友好；建设新中国；保障王公阿訇喇嘛的地位和权利。他以此骗取各族人民的信任和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支持，以加强他的政治地位。

这时，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新疆的混乱局面，将各种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为其所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在喀什成立。实权掌握在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大伊斯兰主义分子萨比提达毛拉的手中。这个反动政权宣布的纲领中规定，实行以伊斯兰教法典为基础的宗教与地主阶级联合的统治，投靠外国帝国主义，脱离中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效忠国民党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与马仲英联合，出兵合击盛世才。这时，盛世才的政治地位已经加强，并得到了苏联的物资援助。他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组织退驻新疆的一部分东北抗日军的武装力量，粉碎了张马的联合进攻。一九三四年春，马仲英的部队打败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控制了喀什。以后马部又退往和田，赶走了和田王穆罕默德·伊敏，统治了和田地区。接着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统一了新疆。盛世才在消灭了主要的敌对势力以后，对各地方民族势力集团实行政治上团结的政策，使动乱了四年之久的新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盛世才伪装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从一九三三年起，中共陆续派干部前往新疆。一九三五年，共产党人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年，在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成立了反帝斗争的群众性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并出版了宣传刊物《反帝战线》。此外，共产党人还担任了一些政府部门和文教宣传机构的公开职务。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和统一战线局面的出现，为以后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 苗瑶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苗族瑶族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部分地区，其余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广东和湖北等地。

一九二四年，广西大苗山的苗族人民，发动了反抗军阀压迫的斗争。不久在广西军阀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军失败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解放苗瑶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历朝外受汉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杀，内受土司酋长的严重剥削”，“长处暗无天日的世界”。农民协会必须竭力帮助苗瑶农民争取解放，“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瑶农民协会”；“援助苗瑶解除土司酋长的残酷（压迫）”；“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使苗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这个决议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苗瑶民族的关怀，鼓舞了苗瑶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夏，党在吊罗山区发展工作，同年冬在吊罗山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冬，党又在母瑞山苗族黎族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母瑞山根据地是海南岛根据地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和琼崖苏维埃政府都设在这里。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量兵力进攻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红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于一九三二年暂时退却。同时，吊罗山区的反围攻斗争也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是，海南岛的苗、黎、汉各族人民，仍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湘西地区就有少数苗族人民参加斗争。后来，苗族和土家族人民还积极参加了保卫根据地的战斗。

一九三四年五月，红二军团在四川的酉阳、秀山和贵州的松桃、沿河、印江等县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七月，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联合苗族人民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为此，要帮助苗族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屯田制度，由贫苦农民分配；帮助苗族人民建立苏维埃的自治区，建立由苗族人民组织的工农红军；发展苗族人民的文化。为实现这些任务，建立苗汉人民亲密的革命联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六军团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很多区乡政权，以及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中，都有苗族群众参加。不少苗族的子弟参加了红军。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根据地内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得到苗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不少人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滇东南的苗族，湘西的苗族，桂北的瑶族，都发动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起义，但都失败了。

七 彝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主要居住在川滇大小凉山地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川滇黔等省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西南地区的彝、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新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派遣一部分党员到云南的开远、蒙自、个旧、会泽一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在铁路和矿山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和秘密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彝族地区连续不断地爆发武装斗争，提出了“民族平等”、“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口号。一九二七年末，滇南蒙自县召开了彝汉苗壮等各族代表五、六百人参加的农协

代表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接着在蒙自一些地方建立了乡村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个碧铁路蒙自机厂的彝汉各族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示威。

一九三一年滇东陆良举行了武装起义，解除了部分地方反动军队的武装，巧袭陆良县城，处决了三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川越西彝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斗争。起义时提出打倒二十四军军阀、反对苛捐杂税、打富济贫等口号。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进入四川泸沽地区，大力宣传和贯彻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印发的布告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红军还帮助冕宁的彝汉各族人民建立了冕宁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捐军，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对凉山彝族的“人质制”，烧毁了县政府的田地粮册。

红军进入果基（沽鸡）、倮伍、罗洪等彝族家支控制的地区时，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及反动派的造谣欺骗，曾受到这三个家支的封锁和袭击。经过宣传，果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表示愿与红军友好，要求与刘伯承结盟。刘伯承接小叶丹的要求，并把一面绣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授给了小叶丹的武装。沽鸡支队护送红军通过彝区。以后，他们在红军的鼓舞下，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长征的红军在彝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彝民起来斗争。

八 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和雾社高山族人民的起义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八九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台湾人民的斗争和祖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紧密相联。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台湾。一九一九年，台湾的知识分子组织了启蒙会，一九二二年更扩大组织台湾新民会，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广泛开展反日斗争，并加强与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联系。一九二一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这是一个反日民族联合战线性质的组织，它一成立即拥有会员一千余人，并有一部分工农群众参加，其领导成分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同情工农运动。同年，从印刷工人开始，在台湾出现了第一批现代的工会组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大陆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日益发展起来。一九二五年台湾蔗农联合会成立。一九二六年台北机器工会成立。同时，成立了台湾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出现全岛性的罢工风潮。

一九二八年四月台湾成立共产党组织后，立即领导台湾人民展开抗日斗争。当年，领导农民进行反对日本三菱土地公司的斗争，年底召开了台湾全岛的农民代表大会。党还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反帝同盟和各地工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展开了对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共产党组织进行血腥镇压，一九二九年二月，动员全岛的警察特务，逮捕了革命分子一千多人。但是，并没有把台湾人民的反日怒火扑灭。到一九三三年，爆发了雾社高山族人民的反日大起义。

雾社在台中州的能高郡，地处汉族与高山族居住地区交往的枢纽。一九三一年，日本警察强迫高山族人民搬运木材，数月不给工资，监工任意鞭打民工，有的民工被毒打死去；日寇还侮辱高山族妇女。敌人的暴行激起了雾社高山族人民的愤怒，他们联合附近六个社的群众，组织武装队伍，于十月二十六日晚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日起义。起义队伍袭击山里的几个警察所，杀死日寇能高郡郡守及下属人员。接着又围攻日寇的统治机关、邮局、官员宿舍，共毙伤日寇三百三十余名。

雾社起义后，台湾共产党组织立即作出决定，领导台湾各族人民展开反日斗争，支援雾社起义。在大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声援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这次起义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苏联政府号召全世界人民支持雾社高山族人民的正义斗争。

起义人民曾占领雾社地区三天。日寇调集大量军队和武装警察进行围攻，还出动了飞机和战车。高山族人民退入深山顽强抵抗，使日寇遭到重大损失。最后，日寇四面包围山区，出动十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起义人民虽然遭到重大牺牲，但仍然尽一切办法与敌人作战。到十二月初，起义被镇压下去。起义群众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少数伤员和老弱妇孺四百多人在被捕以后，全部被杀害。

这次雾社高山族起义不仅使日寇死伤千人，而且使敌人三十多年来的反动统治与分化政策受到严重打击。起义战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着台湾人民继续战斗。